

周

与中国文化

唐 韧 仇如慧◎著

易

二十一世纪初 国学风吹遍神州大地 不少高校纷纷开设国学选修课 为适
应时势 发扬优秀传统文化 遂专选大众喜欢而又往往由于理解不周而可能
出现误区的《周易》 希望概略介绍《周易》 在中国文化中方方面的影
响 由此了解我们民族文化的源头
时下“文化热”泛滥 文化已成了一个时髦名词 什么文化什么文化

全国优秀出版社

广东教育出版社
广东教育出版社

广州

序言

C o n t e n t s

21 世纪初，国学风吹遍神州大地，不少高校纷纷开设国学选修课。在这种形势下，华农珠江学院唐韧与华农外国语学院仇如慧两位青年学者选择了大家喜欢而又往往由于不理解而容易出现误解的《周易》，希望通过介绍《周易》对中国文化方方面面的影响，让青年大众了解我们民族文化的源头。

时下“文化热”兴起，但什么叫做文化呢？有人说文化就是教养，就是文明；有人说文化是科学；也有人说文化指的是一个群体的人共同的习惯、想法和生活方式等，总之众说纷纭。在历史上，人们对文化有过不同的认识，比如在德文中“文化”为 kultur，在英文、法文中均为 culture，它源于拉丁文 cultura，意思是耕种、居住、敬神。从字源上看，这表示当时人们认为定居下来的人所从事的耕田、敬神活动就叫做文化。这自然是人类对文化最浅薄的一种认识。在古代中华民族的词库中，文化指的是文治教化，和今天讲的“文化”的概念不一样。在今天，很多学者认为，文化指的是思想学说，如政治学、哲学、教育学、伦理学、美学等，还包括文学艺术、语言文字、宗教神话、风俗习惯、文化制度、科学工艺、体育武术等，当然也有人把文化的外延拓展得更宽，然而无论怎样，我们都把文化视为一切精神的发展总和，是一个民族精神的表现。

在我们居住的这个广袤的地球上，人类已创造了数千年的文明史。文化史的学者们曾把古代的世界文化划分成几种模式，如英国已故的史学家汤因比把古代世界文化划分为中国、希腊和埃及三种模式，而哈佛大学美籍华人张光直教授则划分为古代两河（即西亚的亚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

的苏美尔文化和玛雅（在古代美洲）——中国文化两种模式。从他们两位的划分结果看，中国文化始终是世界文化中一个很重要的模式。法国学者J·谢和耐认为“中国是位处喜马拉雅山大屏障另一边的人类和地理整体的一个组成部位”^①。由于这一原因，使得中国文化独立孕育发展成为一种与众不同的伟大文化。在历史的进程中，当年灿烂的两河文化、玛雅文化已成为仅供人凭吊的陈迹，而古希腊文化也早已衰微，只有中国文化得以继承、发扬，正处在推陈出新的腾飞时期，这确实是值得我们引以为豪的。

中华民族有五千余年的文明史，她的文化悠久、丰富、灿烂，体现在很多方面，倘若我们仔细研究，可以分为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如地域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还可以按照不同的范畴细分出各种形态的文化。什么是主流文化呢？我们以为在我国从奴隶社会到漫长的封建社会，直到今天，就是统治阶级所崇尚的文化。在不同时期，分别为奴隶主文化、封建文化，也有今日大陆的社会主义文化和台、港、澳地区的资本主义文化。尽管各个时期不同，然各个时期的文化之间有继承性，存在着某方面的共同性。传统的中国文化塑造了中华民族共同的民族心理、宗教形式、思维模式。这个传统文化既有值得发扬光大的精华，也有应该摒弃的糟粕，因此对中国文化的淘金还应不遗余力地深入下去。

倘若把中国文化比喻成沧海，那么注入大海的“长江”便是儒学。儒家著作浩如烟海，其最重要的叫做经。经就是被尊崇为典范的著作，分别称为“五经”（即《诗》、《书》、《礼》、《易》、《春秋》）、“六经”（五经之外，另加《乐》）、“十三经”（《周易》、《尚书》、《周礼》、《礼记》、《仪礼》、《公羊传》、《穀梁传》、《左传》、《诗》、《孝经》、《论语》、《孟子》、《尔雅》），其中都有《周易》。《周易》是我国上古时期诞生的一部典籍，它源于远古的卜筮，是巫文化的结晶。它的形成归结于当时人类与自然界斗争的知识与人际斗争的经验。这本书与几乎所有书籍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它不是通过叙述式语言去阐述作者的方法、观点、结论，而是通过特定的数的运用，用六十四个符号（即卦形）和相应的卦爻辞概括出宇宙中的现象和基本规律。这种运用数理和符号语言反映事物变化自然出于占筮的需要，然而也成了《周易》的特色。这个特色具有一些不寻常的地方。其一，这个符号系统是在阴阳对立统一概念基础上生成的，而对立统一正是自然界和人事最基本的规律。其二，这个反映事物变化的符号系统具有最大限度的灵活性。

^① [法] J·谢和耐：《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冲撞》，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

因此，运用《周易》阐述天地人的变化不仅是说得通，而且有很大的回旋余地。于是以孔子为首的儒家便通过注释的途径来叙述哲理，他们的注释是现存文字中对《周易》最早的注释，后人称为《易大传》，又称为《十翼》。而后人又把它与《周易》经文合在一起，成为今日我们所看到的《周易》全貌。经传合一的《周易》已经是掺入儒道的巫文化著作，甚至可以说是典型的儒家经典了。在我国历史上儒家是一个积极推行政教、注重伦理，在政治生活中起到重大作用的学派，它固然也有《论语》、《孟子》等一套自己的传道著作，然光凭这些来教训人尚嫌孤弱，于是往往利用他人有影响的作品，篡改本义，生填进自家的精神，大力加以宣扬，进而冒认为本派经典，这是自孔丘开始儒家的一种惯用手法。如《诗经》，原有很多健康活泼的民歌，经孔子一修订，便充满说教味。史籍《春秋》，也是经过孔子的手，就突出了“微言大义”。当《周易》被儒家接收，尊为经典后，出现了长达二千余年从不衰减的易学潮流。儒生们前赴后继，倾心钻研，撰写成一千多种关于《周易》的著作。这在中国文化史上从来没有一部著作有过这样的殊荣。

《周易》运用符号讲变化，所以在很多人的视野中，八卦、六十四爻是一种很称手的工具，就如今天的发动机（马达）一般，装上飞机能上天，装上汽车驱四轮，装上轮船航四海。于是，一个八卦学说，在古时道家用以叙述炼丹理论，中医用以解释医道，兵家用以讲阵图，气功师用之于气功原理，天文学家用以配四季二十四节气，风水先生用来择地卜吉。在旧中国，八卦学说的确应用得非常广泛，但这并不是说《周易》能包容、揭示宇宙中万物的奥理，而是运动中的万物有着共同的基本规律，即对立统一、量变到质变、否定之否定。《周易》反映了这些基本法则，从而就有条件为各门各派的人提供了一种阐述本领域理论的方式。

随着科学的发展和对《周易》探索的深入，人们发现六十四卦符号及其系统竟然还有不少意想不到的奥秘，这便是时下人们在“科学易”热潮中津津乐道的话题。这究竟是当初创造六十四卦的哲人在意识到六十四卦的全部奥秘后才选择这个符号系统，还是造卦者无心，而探索者却越挖越有名堂呢？“科学易”热潮的出现，或许表明今人的认识水平已大大超过了古人，或者说《周易》依然是个待解的谜。

《周易》已融入中国文化的血液中，它在很多领域却得到运用，为这些行业的发展起到了作用。儒家借《周易》宣扬“三纲五常”，对国运民情有过不少影响。有的以此筑成封建精神堡垒的基石，成为阻碍时代进步的羁绊；有的以此去阐述唯物主义，如北宋张载；有的以此作为变革的理论，如

清末哲学家郑观应，他反对封建专制制度，鼓吹君主立宪。于是吸收《周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思想，提出“器可变，道不可变”。他说的“器”就是封建国家的政治法律制度，“道”即封建的纲常名教。以上情况说明《周易》在历史上是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并存的，我们对于《周易》的评估不能简单化。《周易》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其千秋功过有待于我们的正确认识，而人类对《周易》的认识始终还是不够的。自20世纪80年代起，国内外相继出现《周易》热，涌现了大批介绍、研究《周易》的著作，这股热潮至今未衰。我想，作为东方宝典的《周易》，犹如一座风光奇丽的名山，游观的人在不同的时期内会或多或少，然大山始终还是大山，易学不会失去它神秘的魅力，它的哲理光辉永恒。

唐韧、仇如慧两位青年学者对中国文化都作过比较深入研究，并愿意借《周易》弘扬传统文化。他俩叮嘱我阅后提点意见，作个序。我深知易理深奥，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唯恐有负雅托，现见他俩能提纲挈领地阐述《周易》与中国文化的联系，实属难能可贵。遂作序并祝他们日后在学术上不断上进。

仇仲谦 于戊子季夏

目录

C o n t e n t s

序言	1
第一章 初民文化与《易》的诞生	1
第一节 初民文化概述	1
第二节 《周易》的诞生	7
第三节 从《周易》看中国文化的超前性	27
第二章 《周易》占筮术	33
第一节 占筮术形成与社会心理	33
第二节 如何用《周易》占筮	36
第三节 《周易》占筮是否灵验	42
第四节 占筮与政治	46
第三章 《周易》哲学	52
第一节 《周易》哲学与古代西方哲学的横向比较	52
第二节 我国古代易哲学研究纵述	59
第四章 《周易》与治国	69
第一节 《周易》天人感应说对政治的作用	69
第二节 《周易》贯穿了哪些治国经验	79
第五章 《周易》与人生	88
第一节 反映在国民性上的《周易》的光斑	88
第二节 《周易》对华人婚姻及家庭观念的影响	94

第三节 中医诊治康复与易理的运用	101
第六章 《周易》与民俗及日用	107
第一节 《周易》与民俗	107
第二节 《周易》与日用	119
第七章 《周易》与国术、兵略	122
第一节 由太极拳、八卦掌谈易理对国术的推动和发展	122
第二节 独步世界的中华用兵术	127
第八章 《周易》与语言、文学、艺术	134
第一节 《周易》与语言	134
第二节 《周易》与文学	138
第三节 《周易》与艺术	146
第九章 易学的前景	150
后记	157

第一章

初民文化与《易》的诞生

中华文化作为世界文化中的一元，曾有辉煌的时期。当然，中华文化形成的基因是非单一的，它的根源之一可以追溯到中华民族的远古时期。《周易》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典籍，它一方面反映了远古时期的人文与自然知识，另一方面又经后世学者不断地阐发和衍申，从而成为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欧洲当代哲学家荣格说：“读世界人类唯一的宝典，首推中国的《易经》。”^①《周易》对后世中国，乃至整个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节 初民文化概述

《周易》是一本以八种符号（即八卦）循环变化出六十四个符号，并把宇宙间万物归为阴阳两大类，以此解释世界的古籍。这个八卦体系、阴阳观念萌生于史前时期。什么是史前时期呢？我们往往把夏视为文字萌生时期，商周是有文献可证的时期，而把夏之前称作史前时期。人类对史前文明的了解是很不够的。对远古文明的了解只能通过两条道路：一是神话传说，二是考古。马克思说：“过去的现实看来是反映在神话的幻想中。”^②反过来说，即幻想中的神话反映了过去的现实。传说我国的原始社会经历了“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女娲氏、炎帝神农氏、黄帝轩

^① 《〈易经〉与天外来客》，载香港《文汇报》，1990年2月6日。

^②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审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四卷，第99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

辕氏、少昊金天氏、颛顼高阳氏、啻高辛氏、尧陶唐氏、舜有虞氏、禹夏后氏”^①的漫长历程。

当今的历史学家和民俗学家普遍认为，这些传说中的英雄大都是古代部落的首领，同时也代表着社会进步的阶段，如有巢氏是代表史前初民为避免野兽侵袭而居住在树上时期。之后燧人氏，进入了用火时代。发展下去，到伏羲氏，相传他教民结网，开创了渔猎畜牧，传说他制作八卦，与女娲氏兄妹为婚。后来人们禁止兄妹通婚，制定婚礼，反映了原始社会由血缘婚进步到族外婚。相传神农氏时代，已经用木制作耒、耜，迈进农业社会。神农亲尝百草，开创了医药事业。到了黄帝时期，中华民族有了长足进步，出现了养蚕、舟车、文字、音律、算数等。在尧舜时期，中华大地上已经存在了很多部落。《尚书·尧典》有“协和万邦”之说。“万”字是表示很多，从古籍所举来看，有“少典、有熊氏、蚩尤、阪泉氏、共工氏、风后、力牧、西陵氏、苍林、岐伯、雷公、缙云氏、九黎、三苗、鬼方氏、蜀山氏、陆终氏、昆吾氏、参胡氏、大彭氏、朱氏、熊氏、后羿、閼伯、散宜氏、曹魏氏、丹氏、商氏、巴氏、樊氏、郑氏、四岳、尹氏、俞氏、莱夷、岛夷、和夷等”^②。“氏”字古意为岸，是近水的高土堆，便于汲水、避兽害，是初民集居的理想处所，从而亦以氏指称聚居一处的部落。大禹死后，他的儿子启建立了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从此宣告了原始部落社会的结束。这个重大转折发生在公元前21世纪。当时世界上仅有埃及、巴比伦、印度、希腊、玛雅等处亮起文明曙光，其余还沉沦在野蛮和愚昧之中。

今天日趋进步的考古事业正在不断揭示史前中华民族的生活和文化状态。有一种说法：“人类始祖自帕米尔高原繁衍，然后各奔一方，有迁移欧洲成雅利安人或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有去了非洲的，有去了亚洲的。亚洲的蒙古人又有渡过白令海峡成为印第安人的。华夏民族在上古之时逐水草而居，进入黄河中下游。他们在这里战争、合并、退却，然后又战争、又迁徙、又合并，最后有了今天的中华民族。”^③这数十字就是一部无与伦比的民族简史。然而介绍的稍微详细一点，则华夏史前文明存在于四大区域：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长江下游的太湖地区、珠江流域的粤北地区以及东北的辽西地区。

① 欧阳询：《艺文类聚》卷第十一章帝王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② 柯昌济：《中国上古国族考》。

③ 斯超：《神圣的幽思》，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

中原地区的文明突出表现在黄河中下游的仰韶文化、上游的马家窑文化、下游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仰韶文化产生于公元前 5000—前 3000 年，1921 年首次发现于河南渑池仰韶村，属于以农业为主的母系社会，以磨制的石器为工具，能生产彩陶。马家窑文化产生于公元前 3000—前 2000 年，1923 年首次发掘于甘肃临洮马家窑。亦以农业为主，使用磨制的石器，生产黑色花纹的陶器。大汶口文化形成于公元前 4500 年左右，1959 年首次发现于山东宁阳堡头村，在遗址中发现氏族公共葬地，各墓间的随葬品多寡不一。公元前 2500 年前后过渡为龙山文化，从而进入父系氏族公社时期，出现了城堡。城堡内发现用人奠基或祭祀现象。每个奠基坑都埋有儿童或成人骨架，少者两人，多者七八人。出现有卜骨等文物。

太湖流域文明反映在河姆渡文化和良渚文化。1973 年在浙江余姚河姆渡村发掘出新石器时期遗址，遗址分四层，其中以三四层为主。经碳-14 法测定为公元前 4800 年，与仰韶文化的早期相当。遗址发现木构建筑遗迹、人工栽培的稻谷、稻壳、稻秆、稻叶的堆积物（其中有的已碳化）以及多种动物的遗骸，以鹿、龟最多，亦有人工饲养的猪、犬、水牛、羊等。出土骨、木、石等数百件原始工具，其中第四层有骨耜 76 件。之外还有丰富的装饰品及原始工艺品。良渚文化产生于公元前 3300 至前 2250 年，1936 年首次发现于浙江余姚县良渚镇，有相当发达的农业。一些富有墓主的墓中有玉制的璧、斧、钺、琕等礼器性葬品。1987 年在余姚安溪乡发现良渚文化的祭坛，祭坛总面积为 400 平方米，中心部分是一个边长近六米的红土坛。

珠江流域的文明主要反映在粤北石硤文化上，其墓葬中发现有大量的生产工具和玉器。之外，近期在佛山市高明区发现古椰贝丘文化，该文化属于新石器时期晚期，出土了大量的包括橄榄、酸枣、坚果、瓜类等植物种子以及野猪、鹿、牛、狗、亚洲象、龟、鳖、鱼等动物骸骨，更为重要的是出土了三件木器（木锤、船桨、烤食物用的棍）与遗留在密封胶土层中的 20 粒完好如新的稻谷。这些文物不仅表明当时人类的食物来源、结构，还表明他们已经懂得种植谷物和使用火。而深圳大鹏咸头岭遗址也出土了距今 7000 年的 40 多件文物，包括陶尊、陶碗、石斧、石镞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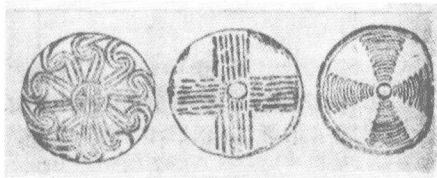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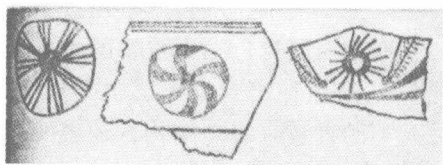
辽西文化发现于 1979 年后，相继在辽宁朝阳市喀左县东山嘴和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郊区凌源和建平县交界的牛河梁发现了约 3000 年前的祭祀遗址。东山嘴遗址长 60 米，宽 40 米，南部有圆形祭坛，台基有 20 多件陶塑人像残块，包括裸体小型孕妇像和大型女性人物坐像。中部有方形祭祀遗址。牛河梁祭祀遗址位于山丘顶，称为女神庙，为一平台形，南北长 175 米，东西 159 米，遗址在平台南侧下的平缓坡地上，出土有彩塑陶人像和神

化的猪龙像。附近山梁上还发现了7处积石冢群，呈圆形，面对着河川、太阳与女神庙。冢中以最大的石棺为中心，环绕小型石棺，为数十人列棺而葬，这是否表现着葬者身份的尊卑贵贱，群棺上皆覆石块，随葬物中有彩陶器和精美玉器。

华夏民族的史前文明以中原地区处于先进地位。整个黄河流域从仰韶文化至龙山文化时期，都出现了少量的铜器、锄耕农业、制陶业和可能是汉字前身的刻画符号。尤其是仰韶文化陶器上刻画的符号有几十个，其中有几种在百里内通行。这自然地为《易》在中原地区的孕育提供了理想环境。

史前的华夏文明有自己的特点。首先从处于欧亚大陆东端的地理位置看，华夏初民东南面临浩瀚的太平洋，北部是寒冷的草原、西伯利亚大森林和干旱的戈壁沙漠，西部是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山脉。他们无力越过这些障碍去沟通外部文明。很长时间来，外部世界的文明只有通过狭长的河西走廊以及经缅甸、云贵的路线，从这两条充满险阻的道路，才断断续续地传播到这块大地。客观环境致使华夏文明循着自己的道路成长，形成了独特的语言文字和文化。这就是八卦土生土长、不染一丝洋味，具有丰富的民族风格的根源。

其次，神话传说及考古发现告诉我们，华夏初民约一万年之前就进入了以农业为主的社会，这是由于黄河流域的温带气候和肥沃的土壤适宜于农业的发展。农业经济的靠天吃饭促使初民很早就形成了崇尚天地的概念，这表现在初民对日神和土神的崇拜。在中国新石器时期器物的装饰图案中常见到一种太阳母题饰纹和太阳光的变形，即十字或类十字的符号（见图1-1-1^①）。



甘肃马厂型日纹 屈家岭残片日纹 大河村残片

日月星图案

A 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太阳母题饰纹

B 太阳光变形（十字或类十字符号）

图1-1-1

考古学家德·爱尔维拉（D·Alviella）在其所著《符号的传播》中把这

^① 何新：《十字图纹与中国古代的日神崇拜》，载《百科知识》，1985年第8期。

类图案解释为太阳，认为“太阳不正是在宇宙空间光芒四射的吗”？

另一种为卐字图案，在西方百科全书中被称为“戈麦丁”（Gammadion）。过去认为，中国的卐字（戈麦丁）图案是随佛教由印度输入的。然考古发现，甘肃、广东、青海以及内蒙的新石器遗址中，出土器物上有卐字图案（见图 1-1-2^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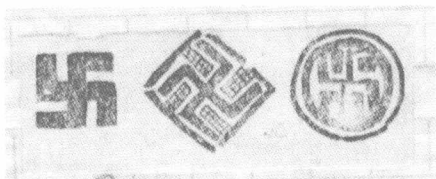


图 1-1-2



图 1-1-3 大汶口陶器纹

这些文物距今有 6000—7000 年，卐字图案也是日光的象形。

之外，如大汶口陶器的纹饰是太阳光辉四射的另一种绘画（见图 1-1-3^②）。

在山东、四川、内蒙、广西、云南等地，考古学家发现了许多新石器时期岩画遗址，其中都有太阳神像。如 1979 年连云港将军崖一处岩画遗址，就是对太阳和星宿的模画（见图 1-1-4^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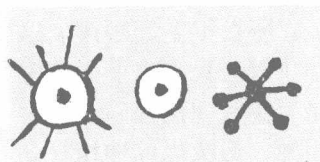


图 1-1-4 连云港将军崖岩画



图 1-1-5

又如麻塘坝狮子岩岩画和麻塘坝九盏灯岩画，可以看到十字形太阳和其他式样的太阳高悬在人和动物的头上（见图 1-1-5^④）。

① 何新：《十字图纹与中国古代的日神崇拜》，载《百科知识》，1985 年第 8 期。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同上。


古代的巫师即从事祭日神的人。(见图 1-1-6^①) 图中手持十字, 站立在太阳下的就是巫师。商周甲骨文中巫字写成.



图 1-1-6

特别明显的是出现在青铜器铭文中, 更体现了巫的职能。(见图 1-1-7^②)



1-1-7 青铜器铭文

祭土神的仪礼称郊祀。相传尧(伊耆氏)帝时有一首《蜡辞》:“土反其宅, 水归其壑, 昆虫毋作, 草木归其泽。”^③ 辞意是祝来年生产顺遂。这是现存最古老的祭土神之歌, 或以为是巫师的咒语。华夏初民在农业生产中逐渐了解天与地的本质, 认识到太阳的光亮、温暖是万物滋生的保障, 而大地则是万物赖以生存的基础。于是以乾为天, 以坤为地, 形成以乾坤相对立的主卦, 进而演变为八卦, 又从八卦衍生出六十四卦, 推演出周密的“易”的体系。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巫筮活动在当时的盛况, 在良渚文化、石硖文化、辽西红山文化等遗址均发现祭祀遗迹, 特别是龙山遗址中卜骨的出土, 更说明了新石器时期巫和占卜术的存在。《尚书·吕刑》中说, 颛顼帝“乃命重、

① 何新:《十字图纹与中国古代的日神崇拜》, 载《百科知识》, 1985 年第 8 期。

② 同上。

③ 引自《礼记·郊特牲》, 见孔颖达:《十三经注疏》, 中华书局, 1979 年。

黎，绝地天通”。重、黎是传说中颛顼时期的人，重为南正，司天；黎为火正，司地。实际上他们就是当时的巫师，是掌管沟通上天与下民之间信息的人。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张光直先生在《美术、神话与祭祀》一书中说：“公元前三千年中国北方的居民，是最先使用动物肩胛骨占卜的氏族。”《周易》作为占卜的经验汇集，自然是史前巫文化的绵延。

史前文化的内容是广泛的，其中从新石器时期遗址中的随葬品来看，出现了反映尊卑等级的礼器，具有原始美学的价值，同时也出土了反映生殖崇拜的文物等，这些在《周易》中都刻下了深深的痕迹。

第二节 《周易》的诞生

《周易》是一部充满神秘的书，它究竟作予何人？兴于何时？仍然是一个古老而悬之未决的谜。其实笼统地谈这个问题是说不清楚的，我们今天看到的《周易》可分为经和传两部分。经由卦、爻和卦爻辞组成；卦则先有八卦，八卦相重，才有六十四卦。八卦、六十四卦、卦爻辞以及传，它们的形成时间是各不相同的。下面分别给予介绍。

（一）八卦的产生年代和爻的象征意义

《周易》的基础是八卦。传说八卦在遥远的伏羲氏时代就形成了。《周易·系辞下》说：“古者包牺氏（即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然《周易·系辞上》又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河图、洛书是古代传说，说古时在黄河中出现了背上有图形的龙马，洛水出现了背上有图形的神龟，伏羲由此得到启示，画出了八卦。八卦究竟是模仿天象、鸟兽之文，还是受河图洛书的诱导，在《周易·系辞传》上下篇中互相牴牾。然而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八卦出自伏羲时期。

《史记·三皇本纪》说：“太皞庖牺氏，风姓，代燧人氏继天而王。母曰华胥，履大人迹于雷泽，而生庖牺氏于成纪，蛇身人首。”相传伏羲是河南省淮阳人，其地今尚存他的陵墓和画卦亭，并塑有手持八卦、头上长角的伏羲像（见图1-2-1）。

传说中所描绘的头上带角而下身为蛇尾的人在实际生活中自然是不存在的。头有角而蛇尾岂非龙的形象？或许他是以蛇（龙）为图腾的部族？其实，从他的取名就很有意思。伏羲又称庖牺，羲通牺，是古代祭祀用的牲口。庖，就是厨房。伏羲或称庖牺，就是命名能驯服牲畜，把它作祭祀用品



图 1-2-1 伏羲像

或下厨烹食的人，指处于渔猎畜牧时期的史前初民，也用以兼称他们的部落首领。而这个时期的部落首领往往是巫师，他们集族权、神权于一身，大都是才智高出常人，从事祭祀、卜筮。由于职业需要，筮法的推动，他们逐渐创造出八卦。因此说，八卦并非出自一人之手，亦非一时之作，当为史前巫师们的共同杰作。伏羲时期正是我国史前新石器时期，已懂得结网，进入渔猎畜牧社会，这与考古发掘出的仰韶文化中半坡地区文化极为相似。

在西安半坡遗址出土了鱼纹彩陶（见图 1-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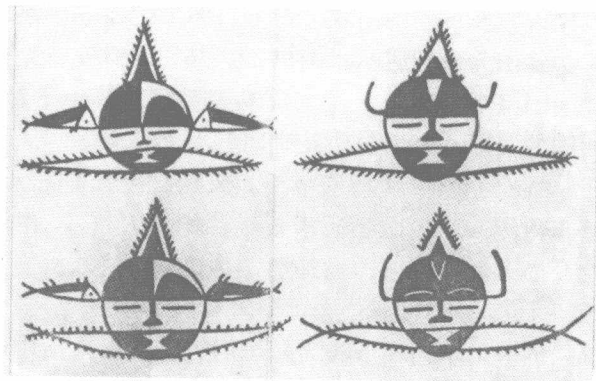


图 1-2-2 人面鱼纹

中国社会科学院赵国华先生对这些彩陶鱼纹进行了研究，发现半坡彩陶鱼纹具有表示鱼的数量的含义，即分别表示一至九条鱼。他将半坡彩陶的几乎全部抽象鱼纹，包括人面鱼纹，都作出了识别，找出了抽象鱼纹运用三角形、菱形、斜线、平直线表示鱼的数量的方法和演化规律。进而发现八卦的八个符号是从半坡彩陶抽象鱼纹直接演化而出。在半坡晚期，☰乾、☲离、☵坎三个符号的演化已经完成，☴巽、☳震、☶艮三个符号的实质部分，即表示数字义的“线上段”和“段上线”的演化也已经完成，☱兑、☷坤两个符号也已具备雏形。而且还发现八卦符号表示数字义的方法及所用密码，与半坡抽象鱼纹表示鱼数量意义的方法及所用密码完全一致。

美国《易经》考古学会宣称，数年前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出土的一件印第安人彩钵上所刻的七个表义符号，表现出中国《易经》的卦形，与“复卦”内容相符，因而推断为受七千年前中国古代《易经》影响。这件高7厘米、宽14厘米的彩钵，钵体有7个成车轮状排列着的表意符号，与复卦的卦形不谋而合，也与中国仰韶文化西安半坡遗址出土文物上的符号相近。因此，美国《易经》考古学会推断，早在七千年前，中国半坡氏族的后人已辗转移居美洲大陆。^①

又有一则消息：河南开封一带出土的六七千年前的彩陶壶上刻有三爻、四爻、五爻、六爻之形及太极图、河图等。^②

由上可见，历史上的传说在考古上得到印证，二者紧密吻合。八卦并不是伏羲一人所为，而是伏羲时期，即新石器时期华夏初民的杰作。

八卦中有阳爻“—”、阴爻“--”，这两个符号究竟代表什么呢？这个问题有很多种解释。笔者以为“—”代表男人，也象征古人观念中所有阳刚之物。而“--”表示母带子。一短划指母性，另一短划指子女群。一个男性往往比一个母亲和她的子女还要有力量，因此“--”反而象征柔弱的阴性之物。史前初民通过对自身（父母子女）的认识，推广而了解天地万物的奥理。比如，太阳给人和大地以热力，地犹如母性孳生万物，于是自然分出天阳地阴。鸟兽就不必说。《周易·系辞下》讲八卦的形成是“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当然也可以理解为阴爻阳爻符号的形成是人类观察自身的结果。

历来对阴阳爻的解释众说纷纭，似乎都有些道理，下面介绍有代表性的几种观点供大家思索。

（1）男根女阴说。郭沫若先生说：“八卦的根底我们很鲜明地可以看出

① 载《工人日报》，1986年6月3日。

② 刘正：《当代易学研究的困境》，载《哲学研究》，1989年第4期。

是古代生殖器崇拜的孑遗。画一以象男根，分而为二以象女阴，所以由此而演出男女、父母、阴阳、刚柔、天地的观念。”^① 近代章太炎先生亦持此观点，不过他是从玄学角度去阐发阴阳两种性质的观念。

当今，赵国华先生也视八卦的根源在于史前初民对生殖的崇拜。他把半坡彩陶鱼纹和各地出土的彩陶纹样作对比分析，指出半坡彩陶鱼纹具有女性生殖器的象征意义，半坡母系氏族公社流行以鱼为象征的女性生殖器崇拜，举行鱼祭以祈生殖繁盛。他推测半坡母系氏族公社鱼祭场为模拟女阴的圆形。半坡鱼祭经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用实物鱼，祭场中央摆五条（尚五，以五为极数），祭场圆周一摆十二条鱼，分为六双（用双鱼象征女阴，以六为二）；第二阶段用实物鱼鱼头，祭场中央摆五个鱼头，祭场圆周一摆三十六个鱼头（合三为一，三个鱼头等于原先的一条鱼）；第三阶段仍用实物鱼鱼头，然而从鱼头陈列的疏密不一中发现了今传洛书式的奇异数学现象，鱼祭改制，祭场中央摆五个鱼头，外围用四十个鱼头，分为八堆，南九、北一、西三、东七、西南四、东北六、东南二、西北八、从此确立了半坡母系氏族公社鱼祭场地的布局；第四阶段用鱼纹彩陶为祭器，共用九件，上绘分别表示一至九条鱼的鱼纹，绘有表示五条鱼的人面鱼纹彩陶盆居祭场中央，其余八件依上述今传洛书式的格局陈列。（后世的九鼎为祭器、神器，盖源于此）赵国华先生提出，八卦起源于半坡鱼祭，其关键是将半坡鱼祭场地布局中两两相对鱼纹表示数的记录转化成两两相邻符号的记录。半坡彩陶上的刻画符号是表示一至九的九个自然数（见图1-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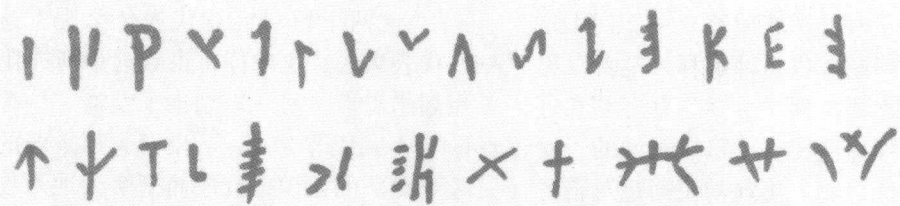


图1-2-3

这种带有抽象数字意义的刻画符号彩陶，逐渐取代鱼纹彩陶为祭器，表现了史前初民由崇拜女性生殖器过渡为崇拜男性生殖器。

以上所说的把阴阳爻看作女阴男根，反映了华夏初民对生殖的崇拜。法国著名的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曾说过：“另一些同样惊人的事实，又证明了原始思维在绝大多数场合中不同于我们的思维，原始思维的趋向是根本不

^①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23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

同的，它的过程是以截然不同的方式进行着。”由此可见，从性角度去解释爻符号意义尽管与我们今天的道德观念大相径庭，然于史前或许是可能的。

(2) 竹棍说。高亨先生说：“我认为八卦原来也是供占筮之用，占筮用竹棍，所以筮字从竹。竹棍有两种，一种是一节，用来象征阳性，‘一’象一节竹之形；一种是两节，用来象征阴性，‘--’象两节竹之形。这和奇数为阳，偶数为阴的概念分不开的。三个竹棍摆成一个经卦，六个竹棍摆成一个别卦，爻和卦都是象竹棍之形。”^①然而他又说“一”、“--”这两个符号，本是对天与地最简化的形象模拟，“以一象天，以--象地，盖古人目睹天体混然为一，苍茫无二色，故以一整画象之，地体分为水陆两部分，故以两断画象之。”^②

(3) 图画文字说。范文澜先生认为：“八卦出于图画文字。”^③郭沫若先生也认为“八卦是既成文字诱导的。”^④以为先有坎、坤、震、兑等古文字，减省笔画，改变方位，演变为八卦符号，刘师培先生指出：“乾坤坎离之卦形，即天地水火之字形。”^⑤

乾为天，今天字草书作，象乾卦之形。

坤为地，古坤字或作，象坤卦之倒形。

坎为水，篆文水字作，象坎卦之倒形。

离为火，古文字作，象离卦之形。

梁启超先生也说：“八卦是古代的象形文字，却很可信。”^⑥他亦举坎离卦形与篆文“水”、“火”二字的渊源为例。其实，以上诸君的观点雷同于宋人王应麟《困学纪闻》所引《乾坤凿度》的材料。事实上，今考古上发现八卦符号的萌生要早于文字。

(4) 日月之象说。乌恩溥先生提出：“‘一’阳爻渊源于日象，‘--’阴爻渊源于月象。古代的人们将☉象的圆圈展平拉直，就构成了‘一’阳

① 高亨：《周易杂论》，第4页，齐鲁书社，1979年。

② 《周易大传通说》，见高亨：《周易古经今注》，中华书局，1984年。

③ 范文澜：《群经概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④ 郭沫若：《青铜时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⑤ 《论〈易经〉与文字之关系》，见刘师培：《经学教科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⑥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十二卷，见《古书真伪及其年代》，第73页，中华书局，1984年。

爻，将 D 象的两画平列连画起来，就构成了‘--’阴爻。”^①

(5) 结绳说。李镜池先生认为：“八卦的构成当在结绳之后。结绳用来记事，改结绳为书契时，如以‘一’代表一大结，以‘--’代表两小结。三大结(☰)为乾，六小结(☷)为坤……后来占筮者借用结绳记事的方法表示占筮之数，从而衍化为八卦。”^② 台湾陈道生先生亦主张结绳说，只不过以‘一’表示有结，‘--’表示无结，他所提出的八卦与结绳的对应如下(见图 1-2-4)^③。

卦名 卦形 →原形 →每段结绳形 →整段结绳形

乾	☰	☰		
坤	☷	☷	---	---
震	☳	☳	-	-
坎	☵	☵	-	-
兑	☱	☱	-	-
艮	☶	☶	-	-
离	☲	☲	-	-
巽	☴	☴	-	-

图 1-2-4

① 乌思溥：《周易——古代中国的世界图示》，第 13 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 年。

② 李镜池：《周易通义》，第 6 页，中华书局，1981 年。

③ 载（台湾）《孔孟学报》，1966 年第 12 期。

刘司斌先生说，八卦根源于史前的渔猎生活，卦本指捕鱼结网的结，后来结绳方法发生变化，由结上的小棍发展为筮占，于是出现了爻象，爻辞，原先结绳的痕迹便不易发现了。^①

(6) 模龟兆说。冯友兰先生以为八卦由模仿占卜的龟兆而来。^②

(7) 土圭测影说。土圭是古代一种测量日影的工具。《周礼·大司徒》就有记载。刘钰先生说：“八卦是根据土圭测影制作出来的，卦画就是日影。”^③

(8) 月象盈亏说。蔡介民先生说：“最初易卦之由来，完全由于古人观象于月之结果。盖月行空中，于一月之间最能表现阴阳。有光则阳，无光则阴，或缺或盈；或上弦，或下弦；古人虽不明其理，而能观其象。当月之十五也，月盈而全光，其绘为图（以一代表有光处，--代表无光处）则成☰，为乾……八卦之来，实由古人观月之盈缺阴阳而起，初无任何意义也。”^④其实，月于一月之中由月生至月盈而月亏，而日于一天之中又何尝不是由日出（阳光弱）至日中（阳光强）而日入（阳光弱）？一年之中，有冬至（日短）至夏至（日长）而又转为冬至，周而复始，无休无止。人类也随此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春耕夏耘，秋获冬藏，天道与人事的循环正是与八卦符号系统所体现出来的时间上的周期性和空间排列上的周环性相一致的。因此从月象盈亏来解释八卦的形成不能说是完美的。

(9) 八索之占说。于省吾先生说：“易卦起源于原始宗教中巫术占验方法之一的八索之占。古也称绳为索，八索即八条绳子，金川彝族所保持的原始式八索之占，系用牛毛绳八条，掷诸地上以占吉凶。《周易·系辞》称庖牺氏始作八卦，乃指八索之占言之。八索这一名称，最早见于《左传》、《国语》。八索之占是八卦的前身，八卦是八索之占的继续和发展。”^⑤

(10) 数字说。以为八卦卦画的基本符号—（阳爻）--（阴爻）是由原始筮法中的筮数演变出来的，《汉书·律历志》说：“自伏羲画八卦，由数起。”此说上千年来无实物印证，遂使旁说蜂出。近年来地下考古发现一些




① 载《学习与探索》，1983年第5期。

②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78年。

③ 刘钰：《关于易经卦画起源之研究》，载《求真杂志》，1946年12月第一卷第8期。




④ 蔡介民：《周易源流考》，载《国民杂志》，1941年8月第一卷第8期。


⑤ 尚秉和：《周易尚氏学》，见《周易尚氏学·序言》，中华书局，1980年。

新材料，如1977年陕西岐山出土的周原卜骨，同年安徽阜阳双堆一号汉墓的《周易》残简。1973年湖南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周易》，以及1978年湖北江陵天星观战国楚墓出土的“卜筮卦象记录”残简，这些文物上的卦都由数字组成。周原出土的甲骨上刻有一、二、三、、 (×)、

(Λ)、十、等数目字，如周原卜骨第七号，原文，释文，经卦

 坎
 离

，别卦即济。安徽阜阳竹简和长沙马王堆帛书《周易》的卦画都由一、六数字构成。如临卦，马王堆帛书作，阜阳竹简作，今本《周易》作，于是张政烺先生受到启示，结合公元1118年湖北孝感县出土的

“安州六器”之一中鼎的铭文，肯定那是古代的数卜记录，是八卦符号的前身，他认为易卦的阴爻（--）源于古数字Λ（六），代表偶数，阳爻（—）源于古数字一（一），代表奇数。另外，从周原卜骨到马王堆帛书《周易》、阜阳竹简，可以看到多个筮数简化集中于“一、六”两个筮数的现象。当今易学界以为八卦中的阴阳爻由数字演变过来的人日益增多。

关于阴阳爻的来源和象征还有一些说法，在此就略而不录。

（二）六十四卦并非周文王所作

六十四卦的产生时期以及它与八卦的关系，尚是一个争扯不清的问题。传说殷商晚期演绎六十四卦之风极盛，不但男人会演算，女人也会演算。西伯姬昌（周文王）的母亲大妊在昌被囚羑里之前，就为他演算过六十四卦。但是《史记·周本纪》及司马迁《报任少卿书》则以为六十四卦出自西伯昌之手。当时是殷商之末，第三十世商王帝乙已经辞世，长子启（微子）贤惠，但因为母亲是偏妃，不得继任。于是由正后之子辛登位，这就是后世所称的纣王。纣王好酒色淫乐，荒废国政，又以酷刑待朝廷大臣，致使天怨人怒。这时殷西方的周部族正日益强大起来，他的首领西伯昌以重视贤才，施行仁政而威望渐高，诸侯与百姓大多归附他，从而引起奸臣崇侯虎的诬告，纣王怀疑西伯昌要造反，就将他拘囚于羑里。羑里即在今河南汤阴县城北4公里的地方，今有遗址为方形土台，高约5米，面积约1平方公里，存有文王庙，是明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建造的。从史书材料推测，姬昌应是一位擅长占筮的人，他被拘于羑里时，已是八旬的老人，在那儿度过了七年的漫长岁月，丰富的人生阅历，充足的时间，或许使他能潜心冥思，完

成了从八卦到六十四卦的进化。

问题就在于从伏羲造八卦到文王演六十四卦，间隔着悠悠数千年。文献指出易学史上出现过三易。《周礼·春官·太卜》说：“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卦皆六十有四。”《连山易》、《归藏易》出现在《周易》之前。有人从《左传》所引的筮辞，发现有的见于《周易》，有的出于《周易》之外，因此推断当另有易书在。桓谭《新论》说《连山易》八万多字，藏于兰台。《归藏易》四万三千字，藏于天卜。大概这两种易书在东汉时尚存世。

《连山易》以艮为首，艮象为山，反映了最早时古人由于受活动环境的局限，认为万物皆由山而出，事物如山出之云，连绵不绝。有的说《连山》是伏羲氏所作；^①有的说是炎帝神农氏；^②《周易正义·第三论三代易名》：“案《世谱》等群书，神农一曰连山氏，亦曰列山氏。”而郑玄《易赞》与《易论》说：“夏曰《连山》。”《玉海》引《山海经》云：伏羲氏得河图，夏后因之，曰《连山》。

《归藏易》属黄帝时期，^③一说黄帝亦称归藏氏。^④郑玄《易赞》及《易论》说：“殷曰《归藏》。”《归藏》以坤为首，反映当时人的意识上认为万物莫不藏于地中。这和《周易》以乾为首，认为万物之本源为天是绝不相同的。三易都由六十四卦组成，都反映了不同时期的人对物质本源认识的演变过程。三易的存在反映出把六十四卦形成的焦点集中在周文王身上是不妥的。《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之考证说：“郑康成（玄）、王弼皆以卦为包牺，神农所重，非文王之所演。”《周易正义·第二·论重卦之人》说：“郑玄之徒以为神农重卦，孙盛以为夏禹重卦，史迁等以为文王重卦。”

考古出土的文物表明，对六十四卦的起源，被郑玄、王弼他们说中了。现有考古文物资料告诉我们，六个筮数排列的卦画形式早在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已有发现。1979年在江苏海安县青墩遗址的发掘中，出土的骨角栖和鹿骨枝上有易卦刻文八个。例如三五三、三六四（艮下乾上，遁）等。而安阳四

① 《十三经注疏》，见《周礼》郑玄注引杜子春云：“《连山》，宓戏。”中华书局，1979年。

② 《三皇本纪》，炎帝“遂重八卦，为六十四爻”。《史记会注考证赴校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③ 《十三经注疏》，见《周易正义》（第三·论三代易名），中华书局，1979年。

④ 同上。

盘磨、岐山凤雏村、陕西周原等出土的殷周甲骨上刻有六个数字一组的符号，正是数字组成的六十四卦。之于《左传》、《国语》记载的卜筮活动所采用的也都是六画卦。在事实前，文王演出六十四卦之说不攻自破。当然，我们并不抹杀周文王或许在《归藏》与《周易》的变化过程中，或许在撰写卦爻辞，完善《周易》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当今有部分学者从先有单卦，后有重卦的传统前提出发，认为“早期形态的单卦符号，较普遍的在西周出现，这可能是周人占筮方法比较落后的一种反映。重卦的筮法首先出现于商，后来才推广到周，也就是‘周因殷礼’，这倒是十分可能的。”^①而有的认为先有六十四卦，后有八卦。从目前出土的原始卦画来看，资料终嫌单薄，因而对八卦与六十四卦谁先谁后问题，或者说是是否两种形式同时出现，相互交存？尚不宜急切下断语。

以上的争议局限于本星球，说得更小一点，在华夏民族的范围内，而北京大学地理系陈传康教授曾大胆假想，将《易经》与天外来客联系起来。他假定“外星人曾光顾地球，并告诉了周文王许多先进的科学知识。而周文王作为一个初民学者并不能懂得其内容，只能以卦爻推理关系记录下其形式，从而使夏易和商易的纯占卜之象数术叠加了隐含现代科学内容的义理内涵。”^②他又说：周文王演《周易》的河南姜里遗址，高出地面五米许，是一座一万多平方米的方形台地。断定它是一个人工堆土台，并非天然形成，可能就是当时外星人飞碟的降落台。^③

陈传康先生说：“现实宇宙存在着反物质和正物质，由正质子和负电子等基本粒子构成的世界是正物质世界，我们的地球便属正世界。由负质子和正电子等基本粒子构成的世界是反世界。正物质与反物质相碰就会发生爆炸湮没，转变为光辐射。”陈教授推测，天外来客可能正是来自反世界。^④把《周易》的起源归于外星人，这一假想自然是很潇洒，也很迷人。然不知是先知者走得太远，还是后觉者落伍甚遥，总之给人们留下了大片空白和迷茫。

（三）卦爻辞作者和定型时期

倘若我们把周易比作完美的人体，那么六十四卦犹如骨架，卦爻辞便是

① 张亚初，刘雨：《从商周八卦数字符号谈筮法的几个问题》，载《考古》，1981年第3期。

② 《〈易经〉和天外来客》，载香港《文汇报》，1990年2月6日。

③ 同上。

④ 同上。

血肉。六十四卦及其占筮方法产生得很早，但是还不能看作是完整的易，只有当它和卦爻辞结合成一体，才可以认为易真正地诞生了。那么卦爻辞是何时产生，如何产生的呢？可以肯定，卦爻辞经历了长期摸索的阶段，逐渐演变为定型化的文字记录，这一转变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为易学打开了一个崭新局面。它一方面使占筮者能依靠它，在占筮活动中达到规范化的、简便的效果，加深了筮的神圣性；另一方面又使后世学者能从易的文字中去探索，并可阐发天文、历史、哲学和人伦的大义，从而对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都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人们往往把与六十四卦相对应的卦爻辞的完成看作是易最终成籍的标志。从易学发展史上看，有人把这一时期称之为符号、文字两个系统结合的《周易》的定型期。

那么周易卦爻辞究竟何时才达到定型化呢？目前学术界尚有争议。《周易·系辞下》说：“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又说：“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因此西汉以前的传统说法以为卦辞爻辞都是周文王姬昌所作，近代尚秉和先生也坚持这一说法（评见《周易尚氏学·总论》）。到了东汉，王充、马融、陆绩之流根据爻辞的内容，认为有些事出现在周文王之后，于是提出卦辞为文王所作，爻辞由周公姬旦作，唐代孔颖达、南宋朱熹也都赞同这种说法。其实，以上说法皆无可可靠的根据。司马迁《史记》也只是说：“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并没有提到文王作卦爻辞。近人也大多以为文王和周公并没有作卦爻辞。

由于对卦爻辞作者的未定，引起了很多易学研究者的兴趣和遐思。近世有一本《周易阐微》，提供一个出人意外的说法，以为卦辞、爻辞，乃至十翼，统统出自乎春秋时晋国人中行氏（名明、字光）之手。他奉使出行，中途失道，被俘于狄。狄在晋东北。据《春秋》所记，当时晋人掌握《周易》筮法，遇事辄以《周易》问卜。因而中行氏被俘时，不得已才把这“神秘之术”书写下来，献给虏主，以保生命。并借此书把自己的姓名和经历，东露一鳞，西露一爪地掺在《周易》经文之间，希望被本国人看到，借此知道他的遭遇和下落，好去救他。据说他的目的达到了。^① 郭沫若先生根据《周易》爻辞中有几处出现“中行”字样，就认为此二字指的是晋国的中行氏荀林父。^②

我们以为，卦爻辞不是某一个人的创作，而是上古时代巫师共同的创

① 阙角如：《今人读易》，第9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

② 《周易的制作年代》，见郭沫若：《青铜时代》，人民出版社，1978年。

造。商周时期，遇事都要用龟甲占卜吉凶，巫（即卜官）则根据兆纹下断定语，这个断语就叫繇辞。繇辞与龟兆当有一定的对应关系，也就是说，在龟兆相同的情况下，繇辞是会一致的。在这一点上，后起的占筮就与此相仿，即当占得某一卦爻时，就有相对应的卦爻辞。另外，当时巫史不分，巫往往把繇辞汇集起来，与史实相印证。这一点与卦爻辞中富含历史资料的事实是如出一辙。可以断定占卜活动及繇辞对占筮有一定的启示作用，使处于口头的不稳定的卦辞、爻辞过渡到标准化和公式化，从而使占筮时只要从筮得的卦和爻去查阅公式化的卦辞、爻辞，就可以断定结果，这就简便多了。

周易卦爻辞的定型化完成于西周初年，这是从它的内容判定的。所谓卦辞，往往是对一卦的总结判断。而爻辞就是以生活中的实例去给卦辞作补充说明，这些事例具有真实性和典型性。卦爻辞的作者对其所不知必不能言；其所未言，也不能铁定其不知；然其所言往往是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尽管它可以反映以前时代的内容，包括古代的诗歌、谚语、格言、故事等，也可以反映同时代的生活，却不可能出现未来时代的史料。因此我们可以从卦爻辞中所提及的历史事件去判断作品所处的临界时期。如：

《大壮》六五爻“丧羊于易，无悔”。《旅》上九爻“丧牛于易，凶”。易，即狄，古族名，居于黄河流域以北的地区。这两段爻辞是叙述在殷之先王亥时期，曾遭狄族骚扰侵掠。第一次被掠去羊群，而人无伤。第二次人被杀，而牛群也被掳去。^① 亥是在成汤前的商族首领，其事迹屡见于殷墟卜辞。

《即济》九三爻“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未济》九四爻“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鬼方是殷周时期活动在今陕西西北地区的一支部族。殷高宗武丁曾联合周族，与鬼方发生三年的战争，方取得胜利。《既济》与《未济》卦中所指的即是此事。

《泰》六五爻“帝乙归妹，以祉元吉”。《归妹》六五爻“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几望，吉”。帝乙是指殷纣王之父。据历史记载，帝乙曾把女儿嫁给周文王。《诗经·大明》：“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倪天之妹。文定厥祥，亲迎于渭。造舟为梁，不显其光。”诗中的大邦即指殷商。周文王曾亲自到渭河边，用船迎接他那来自殷商的新娘。

《升》六四爻“王用亨于岐山”。岐山在今陕西省宝鸡市东部，是周民族的发祥地。用亨就是享用祭品。王指的是周文王姬昌。姬昌生前为西伯。他被追加溢号为文王，是姬发（周武王）克殷以后之事。

^① 顾颉刚：《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见《古史辨》第三册，第14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明夷》六五爻“箕子之明夷，利贞”。箕子是殷纣王的诸父，曾劝谏纣王，纣王不听。《史记·宋世家》说：当时有人劝告箕子逃亡。箕子说，为人臣下，劝谏不听就离去，岂不是暴露了君王的罪行，自己讨好于人民，我不能这样。于是就披头散发，假装癫狂，沦为奴隶。明夷，就是自辱其身而表明其德行。历史上箕子被囚为奴隶，是发生在周武王观兵之后。

《晋》卦辞“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康侯，周武王弟，名封。初封于康，称康侯或康叔。此卦辞是叙述周初康侯出征异国，俘马甚多，以献于王。其战，曾一日三胜。^①后，武庚叛乱，周成王平叛后，徙康侯至卫。卦辞中称康侯而不称卫侯，说明它记述的是西周初年的事。

从卦爻辞的内容看，它涉及的大多是殷周时期的社会生活与历史事件。迄今尚未发现有关春秋之后的史料。因此卦爻之辞的作者必然是殷末周初的巫师。倘若是春秋之后的人，必然要取近身之大事以为例。因此，既无此类事例，自然也说明了作者所处的时代。同时，我们认为，既然商周的甲骨文时期已有六十四卦，那么卦爻辞随之出现也是很自然的事。如“1956年丰镐遗址张家坡出土的两块卜骨上各刻有两组符号，则是筮卦无疑。周原出土的85号卜骨上，除了六个数字一组卦，还有卦辞‘曰其无咎既鱼(吉)’”^②。倘若卦爻辞要拖至几百年后才有，这有悖于事物发展的情理。再说《左传》昭公二年：“春、晋侯使韩宣子来聘，且告为政而来见，礼也。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这段话表明，韩宣子以为他所见到的《易象》应该是周公时期就有了的，这个《易象》在其他诸侯国已失传，而鲁国却保存了下来。《左传》上这段话也表明《周易》经文当成于西周初年。

然而，有一些学者认为先秦无《周易》。如顾颉刚先生说：“例如《易经》放在孔子时代自然错误，但放在汉初就可以见出那时人对于《周易》的见解，及其对于古史的观念了。”^③我们以为先秦无《周易》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周礼》、《左传》、《国语》等古籍中都有占筮的记载。如《国语·晋语》中说，晋公子重耳（即晋文公）有一次占筮，得贞《屯》悔《豫》。有人却把这类例子硬看作是一种占筮活动，认为它不说明有已经定型化的卦

① 顾颉刚：《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见《古史辨》第三册，第14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② 韩仲民：《帛书〈周易〉六十四卦浅说》，载《江汉论坛》，1984年第8期。

③ 顾颉刚：《古籍考辨丛刊》第一集（序），中华书局，1955年。

爻辞。换句话说是有占筮行为而未有《周易》一书。这种论断是十分勉强的。还有一些书籍中也提到《周易》。如《荀子·大略》曰：“《易》之《咸》，见夫妇，夫妇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咸，感也，以高下下，以男下女，柔上而刚下。”《仪礼·士冠礼》、《礼记·礼运》、《礼记·深衣》等都引用《周易》。秦始皇时期，曾发生焚书坑儒的浩劫，《汉书·儒林传》上说：“及秦禁学，《易》以筮卜之书独不禁。”这说明《周易》是很顺当地从先秦流传到后世。

晋太康二年（公元281年），曾在汲郡（今河南新乡附近）古墓出土了数十车竹简，是战国中期魏襄王的殉葬品，其中有《周易》上下篇，与今正同。别有《易繇阴阳卦》与《周易》略同，繇辞则异。^① 这个材料说明战国时期已有《周易》，并存在另外的易书。1973年12月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帛书，其中有《周易》以及解释《周易》的书共五部。张政烺先生指出：“从字体观察，此卷盖写于汉文帝初年，约当公元前180—170年。”^② 从这些帛书可以清楚地知道，西汉初年并不是《周易》经文的初创期，而是已经形成了《周易》学术研究的第一个高潮，出现了解释《周易》的著作。

在先秦无《周易》论的队伍中，有一些人认为孔子时代根本没有《周易》，甚至连后起的孟子也不曾见过《周易》。持这一观点的人主要是对《论语》中的两段话提出质疑。

《论语·述而》：“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上说：“《释文》出‘学易’，云‘鲁读易为亦’，今从古。案《鲁论》作‘亦’，连下句读。惠栋云：‘外黄令高彪碑，恬虚守约，五十以敦。’以此《鲁论》‘亦’字连下读也。”康有为、郭沫若等人根据这一条指出《论语》中没有提到《周易》一书，于是推论孔子也没有见到过《周易》。其实，康、郭这样理解是失之缜密的。首先，陆德明《经典释文》说：“易，如字，鲁读易为亦，今从古。”陆德明指出，《鲁论》谈的只是一个读音问题。惠栋未曾见到《鲁论》，仅以外黄令高彪碑上“五十以敦”，就肯定是引自《鲁论》，这种判断也是很勉强的。再说即使《鲁论》中“易”写作“亦”，能否意识到是笔误或通假？难道大学问家孔子是五十岁以后才学，才能无大过吗？很明显，这是和孔子的学历不相符的。何

① 黄寿祺、张善文编：《周易研究论文集》第一辑，第280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

② 张政烺：《帛书六十四卦跋》，载《文物》，1984年第3期。

况孔子读《周易》一事在很多古籍中提到，应该是确凿的。如：

《庄子·天运篇》：孔子见老聃，说：“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

《庄子·天下篇》中又说：“其明而在度数者，《诗》、《书》、《礼》、《乐》，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

以上两篇尽管出自《庄子》外篇，为庄子门徒所作。然也说明庄子之徒认为《周易》在孔子时代已经完成。秦汉时期的著作中，提到孔子和《周易》关系的地方就更多了，如：

《吕氏春秋·慎行论》：“孔子卜，得《贲》。孔子曰：‘不吉’，子贡曰：‘夫《贲》亦好矣，何为不吉乎？’孔子曰：‘夫白而白，黑而黑，夫《贲》又何好乎？’”

《淮南子·人间训》：“孔子读《易》至损益，未尝不愤然而叹曰，益损者其王之事与，事或欲以利之，适足以害之；或欲害之，及反以利之。利害之反，祸福之门户，不可不察也。”

《说苑·谨慎篇》：“孔子读《易》至于损益，则喟然而叹。子夏避席而问曰：‘夫子何为叹？’孔子曰，‘夫自损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叹也。是非损益之征与！吾故曰谦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韩诗外传》八：“孔子曰：‘《易》先《同人》，后《大有》，承之以《谦》，不亦可乎？’”

《史记·滑稽列传》：“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

以上这些记载说明孔子时代已有《周易》，而且孔子曾深入钻研过，而先秦无《周易》的说法是有误的。

《论语·子路》中有一章，“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郭沫若先生以为是《周易》恒卦引用了《论语》中的辞句。但是我们既然肯定了孔子是看过《周易》的，那又未尝不可能是孔子在引用《周易》的原文呢？

（四）孔丘的弟子们作了《易传》

从科学的观点看，周易乃占筮术之一种，只需包括六十四卦卦名及其卦辞、爻辞，因为它们就已经具备了易的功能。然而事实上我们今天所看到和研究的《周易》全文还包括传部分。传部分有彖、象、系辞、文言、说卦、序卦、杂卦七种。彖、象、系辞又各分为上下两部分，于是成为十篇。汉代

人称之为“十翼”。翼，有在旁、辅佐的意思。取名“十翼”，就表明它是《周易》的解释说明部分。当时也称之为《易大传》。《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引司马谈《论六家要指》中说：“《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司马谈（？—前110），西汉史学家、思想家。由上可见，《易大传》在公元前2世纪就已出现了。刚开始时《易大传》独立成篇，不与经文相杂。至两汉时，古文易学的开创者费直以《易传》解释经文，从而把《彖》、《象》部分列于六十四卦，《文言》分列于乾、坤两卦，《系辞》、《说卦》、《序卦》、《杂卦》仍独立成篇，列于经后，从而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周易》的面貌。^①一说这种编列法是东汉古文经学大师郑玄所完成的。

《周易》传的部分和经文部分（卦名、卦爻辞）在内容上、功能上有很大的差别。经文是占筮所必需的，卦爻辞的内容仅说明所占得卦爻的吉凶，这是第一性的。它当然具备哲学的、道德的内涵，但那是第二性的，而且是非单向性的，不同学派、不同学识的人可以对它作出各种解释。传部分却并非占筮所必需。如其中《彖传》共六十四条，释六十四卦之卦名（包括卦义）及卦辞。《象传》共四百五十条，释六十四卦卦名、卦义者六十四条，未释卦辞；释三百八十六爻辞者三百八十六条。《文言》是对乾、坤二卦卦辞和爻辞的解释。这些《彖》、《象》、《文言》丝毫不表明、不影响占筮结果，只是对卦爻辞作哲学上的诠释，从而把卦爻辞中富含的多方位的哲理固定为单家的说法。因此说经和传作者的出发点是不一致的，经的作者为了充分发挥占筮的灵验而力求保持经的圆活性，而传的作者则借经以宣扬本派宗旨。

那么《易传》的作者究竟是谁呢？《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辞》、《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日本泷川资言先生考证说：“崔述曰：《世家》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辞》、《象》、《说卦》、《文言》。由是班固以来诸儒之说《易》者，皆谓传为孔子所作，至唐宋咸承其说。”^②我们认为孔子作传的说法是错误的，然而它却提供了一条线索。前面介绍孔子钻研过《周易》，可以肯定，他对《周易》必有许多评述，并曾经向其弟子宣传过。孔子作为我国古代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其教授方法上的一大特点是“述而不作”，即选用当时社会上的成名之作，以自己的哲学观、道德观去诠释，变

^①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周易大传通说》，第2页，齐鲁书社，1998年。

^② 《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第116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其本意而为己用。他对于《诗》、《书》、《礼》、《乐》等名著皆持这种态度，所以想来对《周易》也不会例外。再说历史上也没有像他这样做的人，老子、庄子、墨子等都不屑于这样做。因此有心要为《周易》作传的人就是孔子。但这并不是说孔子就是作《易传》的人。他只是启示者，引导者，真正动笔的是他的弟子们。

于豪亮先生曾说：“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周易》分为三部分。其中有一部分是六十四卦。这是通常被称为‘经’的部分，共约四千九百余字。另有一部分是六十四卦卷后的佚书。除了很少一部分见于今本《系辞下》外，此书的其余部分都是不曾流传下来的佚书，内容是孔子和他的学生讨论卦、爻辞含义的记录。估计这部分原来约有一万一千余字，因帛书残破，现存约九千余字。”^①出土文物说明孔子及其学生既然有过一个对《周易》的讨论稿，自然也会存在就此基础上撰写《易传》的可能性，从而也表明《易传》的产生年代应稍晚于孔子，在春秋末。这一点与张岱年先生的判断是相近的。张岱年先生指出：“《易大传》的年代应在老子之后，庄子之前。”^②

认为《易传》非出于一人之手的疑点提出得很早。北宋欧阳修《易童子问》卷三曾指出《文言》解释乾卦卦辞“元亨利贞”时，既说：“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又说：“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贞者，性情也。”这二说互不统一。又如在解释八卦之源时，《系辞上》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而《系辞下》又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而在《说卦》中却说：“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从而在八卦起源上出现了三种说法。另外《十翼》各篇中经常有内容重复之处。如：

《乾·彖传》：“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始终，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

《乾·文言》：“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六爻发挥，旁通情也，时乘六龙，以御天也，云行雨施，天下平也。”

很明显《彖传》文字简练自然，《文言》是由《彖传》衍生而来，倘若是一作者，就不会产生这种累赘现象。

① 于豪亮：《帛书〈周易〉》，载《文物》，1984年第2期。

② 《论〈易大传〉的著作年代与哲学思想》，见《张岱年哲学文选》，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

以上例子说明《易传》或者是汇集了众人之说，或者是多人之作。

《易传》中《彖传》是最早产生的，它解释六十四卦与其卦辞。而《象传》则出自另一人之手。《彖传》作者以为卦辞是一卦之总纲，于是从纲入手，只释卦辞。而《象传》作者因《彖传》在前，为了避重，就把重点放在释爻辞而不释卦辞。然而《象传》作者又往往不顾《彖传》释义，讲出不同的见解。如：

《同人》卦彖传：“柔得位得中而应乎乾。”而其六二爻象传：“同人于宗，吝道也。”

“得位得中”象征贤君或贤臣在位而处顺途。柔应乎乾表示阴阳相和。《彖传》以为《同人》是一个预示着和谐顺当的吉卦。而六二爻《象传》却以为是同党相偏私，是一种贪鄙的行为。很明显《彖传》和《象传》不是一个作者。在《礼记·深衣篇》引用了《坤》六二爻《象传》之文：“故《易》曰，‘《坤》六二之动，直以方也。’”《礼记》相传是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三传弟子等所记。这说明《象传》应作于战国初，《彖传》则稍前。

《周易·系辞传》也大致作于战国初。我们不妨把《礼记·乐记》中一段话和《系辞上》首段作比较：

《礼记·乐记》：“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大小殊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则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则礼者天地之别也。地气上齐，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备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如此则乐者天地之和也。”

《系辞上》：“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

把两段话对比，可见《礼记·乐记》之辞语不如《系辞上》之顺畅，而略显得牵强，足见它是仿《系辞上》之作。《乐记》是孔子再传弟子公孙尼子所作，故《系辞传》应成于公孙尼子之前。

上述《文言》是由《彖传》衍生而来，然而它又要早于《系辞传》。有一个很明显的证据是，《系辞上》中“‘亢龙有悔。’子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这一段话出于《乾·文言》。另外从作于战国晚期《荀子》的一些篇章看，与《文言》有很多相近处。如：

《荀子·勤学篇》：“施薪若一，火就燥也；平地若一，水就湿也；草木

畴生，禽兽群焉；物各从其类也。”

《乾·文言》：“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

《荀子·不苟》：“庸言必信之，庸行必慎之。”

《乾·文言》：“庸言之信，庸行之谨。”

从上述可以看出，《文言》应作于《系辞传》前，在战国时期已经流行，并对荀子的著作产生了一定影响。

《说卦》是阐述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八经卦之象。而《象传》既然要依象立说，那么《说卦》必然要在《象传》前。估计应成于春秋末。《晋书·束皙传》说：“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其《易经》二篇，与《周易》上下经同。《卦下易经》一篇，似《说卦》而异。”看来《卦下易经》就是《说卦》的变体。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形是反映了历史上《周易》未定型时期的多样化。1973年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周易》经文中六十四卦的顺序以及《系辞传》的内容与今通行本有较大出入，这说明在西汉初之前，世上流行的《周易》尚未定型，因而《说卦》存在变体也就很自然了。而且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周易》的《系辞传》部分包括了今《说卦》的一段，这也说明《说卦》的存在是很早的。^①

由上类推，解释今通行本《周易》六十四卦顺序关系的《序卦》或者也可能出现在战国时期，否则就要在《周易》定型后，总之是在汉初后了。《淮南子·缪称训》有引述《序卦》的文句。^②则《序卦》当形成于公元前2世纪前。

《杂卦》的出现是最晚的。王充《论衡·正说篇》说：“孝宣皇帝时，河南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奏之，宣帝示博士，然后《易》、《礼》、《尚书》各益一篇。”今人张岱年先生以为“王充所说增益一篇是正确的，这一篇当是《杂卦》”。我以为然。

其实，对《十翼》作于何时这一议题，众说纷纭。由于缺乏更丰富的古文资料，也就难以判断正误。不过大家取得一致的有两点：一是《十翼》不是出自孔子；二是多人撰写。

总之，我不赞成盲目肯定《十翼》的某篇为某人所写。有人根据《史

① 黄寿祺、张善文编：《周易研究论文集》，第404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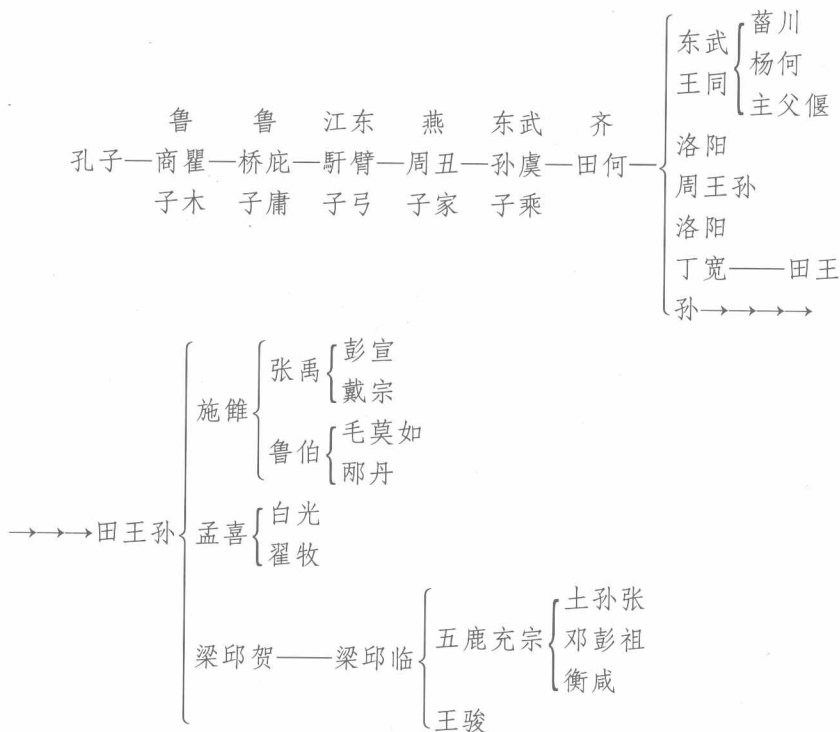
② 同上。

记·仲尼弟子列传》或《汉书·儒林传》孔门传授《周易》的系列表（见下），以为《十翼》之作者必然是出于这个世系。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商人 楚人 江东人 燕人 淳于人 齐人 东武人 菑川人
孔子—商瞿—駢臂—矫疵—周豎—光羽—田何—王同—杨何
子木 子弘 子庸 子家 子乘 子庄 子中

《汉书·儒林人》



如郭沫若先生以为似《说卦》而异的《卦下易经》一篇恐怕就是馯臂子弓著的。^① 这种说法论据不足，纯系推测。《隋书·音乐志》引沈约曰：“《礼记·中庸、表記、坊记、缙衣》皆取《子思子》。”而《表記》、《坊记》、《缙衣》引《周易》之处颇多，说明子思及其弟子亦长于易学，因此这一派弟子也未尝不能作《易传》。我以为，易学尚未是儒家一派专长，精于易理，长于谈易的大有人在，焉知《易传》又非出自旁门。

其次，我也不赞同一味凭思想来谈归属。那样做看起来很深刻有理，其

① 郭沫若：《青铜时代》，见《周易之制作时代》，人民出版社，1978年。

实，一方面某哲人对某命题提出某观点，就不能保证说他再不可能具有另一观念，另一方面有些自然常识以及社会常理，并非一派先提出而其他人就无从产生或无法运用。因而单凭《周易》的经或传中对某个观念的解释就断定它的生成期，往往是会有误的。

第三节 从《周易》看中国文化的超前性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是宋代著名诗人苏轼《题西林壁》中的名句。它反映出人们往往对自身了解的不足，而在旁人却洞若观火。也许我们对于《周易》的了解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众所周知，国旗上的图案都具有深刻的含义，体现了一国民众对它的崇敬，而在这幅员广大的地球上，韩国是我国的近邻，在习俗和国民信念等方面，曾受到中国文化的强大影响。于是在确定其国旗图案时，就选择八卦太极图。这表明它充分认识到易理在国民生活中的重要性，祈望以易道去治理国政，启迪民心。其实，《周易》的影响不局限在我国及邻近地区，而是越出了洲界，漂洋过海。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丹麦杰出的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内尔斯·玻尔（公元1885—1962）在研究中发现《周易》阴阳概念和量子物理学中的互补性概念是十分接近的，于是在自己的衣袖上印上了《周易》太极图的图形。这表明了《周易》的伟大之处，它不仅在生活中，而且对现代新科技也有着魅力。比利时著名科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伊·普里戈金教授说：“中国文明对人类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关系有着深刻的理解。因此，中国的思想对于那些想扩大西方科学的范围和意义的哲学家和科学家来说，始终是个启迪的源泉。”^①从上可以看到，国外学者对《周易》的认识达到了很高的境界。而我们自己呢？尽管不少学者对《周易》的研究也达到极高的水准，然在算命摊上、道袍上也不乏《周易》的踪迹。它表明了我们中的很多人依然在最低的档次上利用《周易》的价值。因此我们有必要深入研究，挖掘并介绍《周易》丰富而深沉的内容，不仅希望提高阅读者的易学水平，同时也可以加深对本民族自身的了解。

《周易》有许多奥秘尚未为人所知。从已知内容看，它有两方面显得很突出。第一，卦的形成反映了我国古代数学的成就。第二，六十四卦符号及其数理关系是认识这个世界的最佳模式之一，它具备了永恒的价值。

^① 伊·普里戈金，伊·斯唐热：《从混沌到有序》，第1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

法国著名哲学家、数学家笛卡儿（公元1596—1650）曾这样说过：“我苦思冥想，终于悟出了万物都可以归结为数学的道理。坦率地说，我坚信它（数学）是迄今为止人类智慧赋予我们的最有力的认识工具，它是万物之源。”笛卡儿的这段话尽管不是针对《周易》说的，却对一切都适宜。数学也同样是《周易》之源，远古时期的人类在与大自然作斗争的过程中，观察天地间的一切事物，发现事物间存在着一种量与量的关系，认识到空间形式的性质，于是便产生了数学。在甲骨文时代，就懂得十进的记数法，^①发现并采用了干支记日法。这是我国最早的排列组合数学的运用，并懂得运用规矩（校正圆形和方形的两种工具），甲骨文中就有“规”和“矩”二字。这说明我国的数学起步极早，因而在此时期产生八卦完全是在情理中。传说伏羲画八卦，在山东嘉祥县汉（公元129—147年间）的武梁祠石室就有伏羲氏手执矩，女娲氏手执规的造象。

八卦体现了古人在排列组合上的知识，卦爻用“—”（阳爻）和“--”（阴爻）两种符号表示，也称作两仪，“—”指天，“--”指地。当把一和--各与一、--排列一次，就由两仪得到四象：☰、☷、☲、☵，再把一和--与四象各配一次，就由四象得到八卦：☰、☱、☲、☴、☵、☶、☷、☳，把八卦的每一卦都和八卦相配一次，就得到六十四卦。形成四象、八卦、六十四卦的方法就是数学的重复排列法，即假设有n种不同的物件，每次取r个，按不同形式排，就有 n^r 种排列法，其公式为：

$$n^r = \overbrace{n \times n \times \cdots \times n}^r$$

假设阴爻和阳爻为两种物件，每次取两个，计算得 $2^2=4$ ，就是四象；每次取三个，即有 $2^3=8$ ，就是八卦；每次取六个，即有 $2^6=64$ 就是六十四卦。

八卦所包容的排列法的知识在数学史上是居于领先地位。外国对排列组合的研究起步很晚，在古希腊的著作中很少看到，古罗马时代的哲学家、数学家布依西斯（A. M. Boethius 约公元475—约524）在《算术入门》中曾讨论过N个物体每次取两个的组合数。而印度直到公元12世纪才由数学家婆什迦罗（Bhaskara 公元1114—1185?）提出。他在《丽罗娃提》（Lilavati）问：“湿婆神（Sambu 或 Siva）的十只手拿着十件东西，绳子、钩子、蛇、鼓、头盖骨、三叉戟、床架、匕首、箭、弓，如果将这些东西交换，共有多少种不同的方式？正像哈利神（Hari）四只手交换拿着的狼牙棒、铁饼、莲

^① 《甲骨文字研究·释五十》，见《郭沫若全集·考古篇》，科学出版社，1982年。

和贝壳一样。”^①

《周易》反映了我国在数学上的领先地位，同时也反映了古人运用数学手段去探索世界的尝试。正如《雕菰楼易学·英和序》所说的，《周易》是“生于数、积于数、成于数、变通于数”。然而古人们持着先进的思维方式却走进了神学的胡同。人类对数自古就存在着一种迷信。如龟卜时灼龟视兆，或许就是视裂纹的多寡奇偶而定吉凶，与占筮是一脉相通的。在国外也是如此，古希腊杰出的思想家毕达哥拉斯（公元前580—500）的追随者们把关于在认识自然中数字关系重要性的正确观念绝对化，认为数字“实际上是神”，竭力在数字关系中寻求秘密和启示。从历史的眼光看，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古人企图把蓍草按照一定的方式排列起来，从而去探测吉凶。那样做显然是荒谬的，然而却是上古时代自然科学的萌芽和宗教神学紧密缠绕的一种普遍现象，后人却往往能在这奇妙的结合体上发现古代科学的闪光点。

八卦传入欧洲后，引起德国数学家莱布尼兹（公元1646—1716）的兴趣，给予他一种启示，从而导致了二进制的诞生。他说：“我之不可思议之新发现，就是对于理解三千余年前中国最初的君主且为唯一的哲学家伏羲之古代文字的秘密的发现，对于中国人实在是深可庆幸的事情，应该允许我们入中国吧！因为这包藏着不可思议的神秘（Mystie chbalistgue）的中国人，已经丧失了他的三千年前传说的文字秘密，可是现在居然发现了从未试用的计算办法。”^②当我们观察八卦时，如果把一和--用记号1和0代替，那么八卦分别表示为000（坤）、001（艮）、010（坎）、011（巽）、100（震）、101（离）、110（兑）、111（乾），这正是二进制记数法的0、1、2、3、4、5、6、7，而六十四卦相当于二进制记数法的0到63这64个数。二进制是电子计算机所采用的主要进制。

古代中国的数学以实践为长，偏于应用而未能及时进行系统性、抽象性的总结，从而得出公式定理之类，以致使人们往往忽略了数学核心，这在八卦中是很明显的。倘若我们把阳爻和阴爻视为数学上的正和负，那么八卦中的四象即是近代数学中直角坐标系的四个象限（见图1-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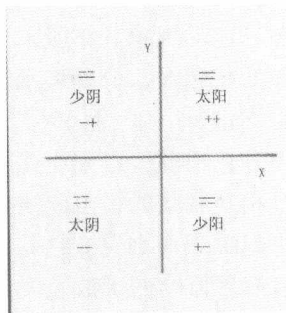


图1-3-1

① 梁宗巨：《世界数学史简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

② [日]五来欣造著，刘燕谷译：《儒教对于德国政治思想的影响》，商务印书馆，1938年。

如果将八卦的上、中、下爻分别表示三维空间直角坐标系的 x 、 y 、 z ，那么这八个卦正好代表立体解析几何中笛卡儿空间坐标的八个卦限（见图 1-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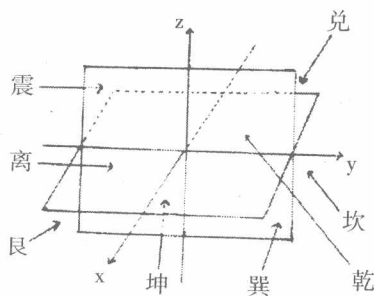


图 1-3-2

又《系辞上》：“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段话就包含等比数列，1、2、4、8。从上可以看到《周易》中蕴含着不少数学的内涵。

《周易》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它认识世界的方法，这是基于对事物的正确认识而形成的一种以数为推衍工具，以象为表现方式，以哲理为内容的三位一体的思维方式，它具有客观性、广泛性、永恒性三大特点。

远古初民在生活和生产实践中，逐步认识了众多的自然现象和它们的运动变化情况，从而在当时的认识条件下去探索宇宙的奥秘，去解释物质的本源和运动规律。在殷末周初所出现的八卦的认识方法是产生在对世界物质认识的基础上，分别表示天（乾）、地（坤）、水（坎）、火（离）、风（巽）、雷（震）、山（艮）、泽（兑）八种自然物。在这八种自然物中又把天地看作是总根源，以阳爻代表天，以阴爻代表地，这八种物质既是相互对立，又是相互联系的，由此演化出宇宙万物，这就是我国古代的宇宙观、阴阳说和物起源于八物说，它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在探索世界本源、解释自然界万物的形成、发展和运动的课题上，《周易》中所表达的关于物质结构的理论和古希腊自然哲学家在这一课题上的哲学猜测虽然不同，却又十分相似。公元前 7 世纪古希腊伊奥尼亚学派的思想家泰勒斯（约公元前 624—前 547）以为“水为万物之母”。而阿那克西曼德（约公元前 610—前 546）以为万物产生于空气。赫拉克利特（约公元前 530—前 470）则以为源于火；恩培多克勒（约公元前 490—前 430）把火，空气、水和土归结为万物离合形成的基源。所以我们可以说诞生于公元前 11 世纪的《周易》所阐明的宇宙观不仅仅是客观的，而且和古希腊学者的哲学史的地位一样，是同样崇

高。

《周易》最突出的一点是它认识世界的方法，这是一种“观物取象”的方法。古人把天、地、雷、风、水、火、山、泽视作自然界的八种基本物质，并赋以☰、☷、☳、☶、☴、☵、☲、☱、八个符号，命名为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又把它们划分为阳刚、阴柔两大范围，从而使这八个符号超脱了具体的物象。具有多样性和多义性，如乾，可指天、君、夫、马、首、刚健等，具有更高更普遍的意义。在古人的观念中，整个世界就是在“阴阳变化”、“刚柔相摩”中“化生万物”，这是含有着朴素的唯物辩证的精神，其中蕴含着真理的颗粒和天才的猜测。尽管在上古时代人们的认识只局限于祭祀、征伐、生产、商旅、婚姻等社会生活范畴，然而这些取材于当时华夏民族日常生活的平凡事例融进观物取象的模式中，就产生了高而玄虚及包容量极大的特性。随着历史的进程，人们从《周易》的卦爻辞中去揭示万物运动和生成的规律，又去阐述人生哲理。正如《四库全书总纲目提要》所说：“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援易以为说。”因此《周易》所揭示的方法比方法所产生的作品更为重要。这正是《周易》中思维方式被广泛应用的伟大意义。《周易》对一切事物的亲和力使它的价值已越出了其作者的预想，这一点是世界公认的。F·卡普拉《物理学之道》一书中说：“可以把《易经》看成中国思想和文化的核心。权威们认为它在中国二千年来所享有的地位，只有其他文化中的《吠陀》和《圣经》可以相比。”

德国数学家莱布尼兹说：“易图是流传于宇宙间科学中之最古的纪念物。”^①它是古代中国人民智慧的结晶，它那阐述宇宙奥秘的特异方式，使它既有科学性，又有神秘性，因而能在人际和代际广泛长久地流传，而越来越受到当代科学工作者们的重视。这一点我们将在下文讲述。当代社会上存在相对立的两种文化，即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

两种文化之间存在着相互不理解的鸿沟，而《周易》的认识方法正是达到了圆满解决这两种文化之间沟通的作用。因此当代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指出：“《易经》可以说是一部事物规律的‘代数学’，”^②“六十四卦、三百八

① [日] 五来欣造著，刘燕谷译：《儒教对于德国政治思想的影响》，商务印书馆，1938年。

②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二卷，第335页，人民出版社，1978年。

十四爻及其卦辞、爻辞可以代入事物的一切规律。”^① 有人就循着这个路子，由《周易》所提供的模式，去研究心理学，生产管理，甚至放眼宇宙，提出“宇宙全息统一论”。由此我们可以说，《周易》中所提出的认识方法是永恒的。

人类的有史文明已走过了约八千年的历程。在认识自然史方面看，无论是数学，还是认识方法，从《周易》反映出在公元前 11 世纪之前，中华民族的先人都居于前端，毫不逊色于古希腊。然而为什么希腊文化对近代科学的兴盛起到了良好的作用，相反易学却长时期未能走出其神秘的幽谷，这正是科学史上的重大问题，也是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

^①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二卷，第 336 页，人民出版社，1978 年。

第二章

《周易》占筮术

毫无疑问，《周易》经部分（六十四卦及其卦爻辞）是兴于占筮，用于占筮。它的这一原始功能，至今犹如花枝招蝶，吸引着广大民众，不少人企望能探其秘术。其实，筮术是神秘外衣下迷信与科学的混杂物。我们介绍《周易》，很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要拨开这层玄虚的迷雾，阐明科学，使大家懂得正确预测的方法。

第一节 占筮术形成与社会心理

占筮是巫术的一种。信仰巫术是远古时代民众共同的现象，以往我们总是把这一切归结为生产力低下而产生的对自然力的屈从。其实这样解释是不正确的，至少是片面的。因为随着人类科技水平的提高，占筮术并没有消亡，而是水涨船高，出现了以科技工具为辅助手段的新占筮术。因而对《周易》筮术的形成必须从心理学的角度去分析，可以认为是人类崇拜欲和征服欲结合所造成的。

今人的愚蠢莫过于以为古人愚蠢才进行占筮。事实相反，远古人类生活在大自然中，经过长达数万年的奋斗，他们的智能达到一定高度，积累了不少科学知识。正如卢卡契所说：“在人类存在的最原始阶段，必然产生过对现实的一种粗略的接近于意识的把握，否则他们既不能维持存在，也不可能

向更高的阶段发展。”^① 然而又必须意识到，远古人类的认知是极有限的。对于他们，世界是模模糊糊的背景，只有对他有用的东西才会被认知。宇宙中还有很多对他们说来生疏的事物。人类从一开始就把外部世界看成是自身的对立物，他置身于外部世界，与其朝夕相处，却不能制约它。如日月星辰的运行、洪水、风暴、闪电、干旱、疾病等，于是对这个强大有力而又变幻莫测的自然界充满着崇敬，只能凭着自己的理解力和想象力，认为它们是有灵性的。这一神灵的形象便是人的品性和自然力的糅合。《左传》昭公元年：“山川之神，则水旱疠疫之灾，于是乎祭之。日月星辰之神，则雪霜风雨之不时，于是乎祭之。”他们在生活中清醒地意识到，人可以掌握本身的一半命运，而另一半则全凭神的意旨。因而他们无论从事什么工作，如祭祀、生产、征伐、行旅，乃至生殖、生死，都需要占筮，以感应神的旨意，去获取工作的信心。英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公元1884— ），通过对新几内亚东北的梅兰内西亚土人园艺活动的观察，发现他们熟悉种植物的天然条件，一方面靠经验从事生产，另一方面奉行巫术。因为经验告诉他，不管怎样小心谨慎，或许在某因素作用下，会获得意外丰收，或许在另外因素作用下，会遭旱涝或虫灾。其他活动也一样，无论是战斗还是生产，他们既具有一定的知识，并谨慎地应用着，然而又意识到存在着各种不测的意外，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各种偶然因素，所以需要占筮。这就是万古恒一的占筮心理。占筮是人类在行为活动中对不可知部分（偶然因素）的一种预测。占筮不同于宗教信仰，占筮的目的是一定的，具体的、直接的，每个占筮者都知道自己问的是什么，而宗教信仰的目的是空泛的。

利用民众求神占筮的心态而达到其政治目标，这是古代巫师的目的。在公元前21世纪，我国已进入奴隶制社会，出现了国家政体，君王除了采用强制力量（法律、军队）和自身的道德威望之外，还必须垄断神权来维系本身的政治权威。他们利用民众对天的崇拜心态，声称上天和祖先是知识和权力的源泉，而自己的政治地位是神授，本人即是天之子，是勾通天人之意的中介人。占筮即是替天行道，是一种征服民众的手段。只有这些控制着沟通手段的人，才能成为民之主。因此，远古时代的部族首领其实都是巫师。如《史记·夏本纪》指出，“禹为人敏给克勤……身为度。”后人这样解释，当年大禹因治水而患足疾，所以他行巫术时那种特有的步法被其他巫师所模仿，流传下来，称作禹步。又如史载，商汤曾祭天求雨，甲骨卜辞中有商王

^① 卢卡契：《美学》第一卷（审美特性），第19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

卜问风雨、祭祀、征伐、田狩或占梦求雨的记载，有“王果曰……”的文句，均与天气、疆域或灾异、疾病之事有关。表明当时商王是能“代天立言”，能假借神意以行事，所以说商王即是巫师。之于周文王能演绎八卦，自然是巫师，无须详说。

从上古的部落首领到其后的君王诸侯，不少是自己扮演巫师角色，同时也豢养不少宗教助手以巩固神权。如《国语·楚语》中说：“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天地通。”黎即远古时期颛顼氏部落的一名首领。上古有许多巫师都是身居要职，如巫咸，为商王太戊的大臣。其子巫贤，任商王祖乙的宰相。《尚书·君奭》说：“在太戊……巫咸又王家。在祖乙，时则有若巫贤。”古代的巫师能卜筮、圆梦、降神、驱邪、治病，尤其是降神时哼唱蹦跳，既玄且乐，对民众造成一种可畏又可娱的感觉，能深深地攫获住民心。

经验又告诉我们，精神力量虽然是无形的，却有着意想不到的神奇作用。这种力量在现代人中也不乏奏奇效。事实说明在某种力量暗示下，在任何人心里都能激起某种潜在的意念。激起希望看到奇迹的憧憬之怀，因而往往能凝精聚力，出现超常的发挥。反之，也会使人斗志涣散，毁事亡人。这就是民众于事前要占筮问吉凶的原因，乃至古代统治者除了要利用这种精神力量外，还要利用民众崇畏上天的心理。因为民众的一切道德，一切团结力，一切心灵的安慰都来自他们对上苍的信仰。在众目睽睽之下，在威信无边的氛围中，庄重宣告神的旨意，是驾驭民众的最妥善的方法，公元前16世纪，商王朝的开拓者成汤起兵讨伐夏王桀，在河南安邑摆开战场。战前，他占卜问卦，并向部众说：“格尔众庶，悉听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①于是全军将士在“天意”的号召下，斗志昂扬，席卷敌军，消灭了夏王朝。再看世界范围，在上古时代，无论是希腊、印度、巴比伦、埃及，还是中美洲的玛雅人部落，一直到非洲的土著民族，都设有祭司。他们的职能都是祭天，并代表天意，都拥有很大的权力，在一国一部落之内，都是政治领袖的左右臂。近代学者认为，占筮不仅出于对神的崇拜，而且是一种特殊行为状态，一种以理性、情感、意志为基础的实用态度。它既是行为状态，又是信仰系统；既是社会现象，又是个人经验。今天筮风未绝，当然它的政治作用已极衰微，而物的因素却大大地膨胀起来了。

^① 《尚书·汤誓》，见孔颖达：《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79年。

第二节 如何用《周易》占筮

在人类文明史上，占筮并不只意味着迷信，而是表示人从无知到渴求有知的一种举动，是理智的尝试。表明人在指导自己行动之前，增加了一个比较、选择的过程。因为占筮所得而用以类比的卦爻辞，其实多为人的经验和历史知识。当人类出现占筮时，曾有过多种形式，如《周礼·太卜》说：“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传说《连山》是伏羲时期（一说夏代）的易书，似不可信。然《归藏》确是殷代的易书，《周易》是周代的易书。《归藏》现已失传，其筮法和《周易》不同。《周易》占九六，《归藏》筮法占七八。据《周礼》记载，筮法多到九种。《史记·龟策列传》说：“蛮夷氏羌，虽无君臣之序，亦有决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国不同俗。”可惜古代花样繁多的筮法大多已经失传，只有《周易》的筮法完整地保存在《周易·系辞上》中，能够让后人了解到当时的风貌。

占筮分两大步，首先要先占得卦爻，其次判断吉凶祸福。占筮的工具是蓍草，一说是竹签，从占筮的起源来看，当以草为先。蓍草，是一种多年生的草，一本多茎，随处皆有，因而很容易得到，分别以奇偶来判断吉凶，这是很自然的事，也可能是占筮的萌芽，至于巫师故弄玄虚，规定蓍草（后亦用竹签）的数量和占筮的程序，那是后起的事了。占筮程序如下：

用五十根蓍草（或竹签）表示“大衍之数五十”，先取出一根，始终不用，以象天地未开之前的太极。

将余下的四十九根任意分为两部分，握于左右手中，表示“分而为二以象两”。两，即天与地。

从分为两部分的蓍草中拿出一根，放在一边，形成三部分，表示“挂一以象三”。三，指天、地、人。

分别数左右手中的蓍草，四根一组，表示“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四时，春夏秋冬。

数到最后，其左右手蓍草的余数必然是四或三、二、一。把它挟在手指间，表示“归奇于扚以象闰”。扚，手指间。闰，就是余数，也指历法上的闰月，以上是第一变。这时蓍草就剩下40或44根。于是又按照上述“分二、挂一、揲四、归奇”四个步骤进行第二变。其结果有三种：①40根、②36根、③32根。

第三变则以第二变所余蓍草演示，其结果有四种。

①余 36 根。四根一组，为九揲已数。九是奇数，阳爻，九为老阳，是可变的阳爻。

②余 32 根，八揲之数。八是偶数，阴爻。八为少阴，是不变的阴爻。

③余 28 根，七揲之数。七是奇数，阳爻。七为少阳，是不变的阳爻。

④余 24 根，六揲之数，六是偶数，阴爻，六为老阴，是可变的阴爻。

以上三变可得出—爻，为卦中最下的一爻，称初爻，同时应该在旁加上记号九八七六，表示其为老阳，或少阴，或少阳，或老阴。再演五次，即可得到其他的五爻。即二、三、四、五、上，并分别标明记号。这样就产生—卦，叫本卦，也称复卦。因此《系辞传》说：“十有八变而成卦。”

倘若阳爻皆七、阴爻皆八，就是不变之卦。占者可根据本卦的卦形、卦德、卦象、卦辞来推测吉凶。倘若复卦爻画旁的记号有九六，那就可能会出现变爻。遇变爻时，是九（阳爻）就应变成六（阴爻），是六就应变成九。如何确定哪—爻是变爻呢？占者应查看复卦六条爻画旁的记号，将九、八、七、六这样的数字加起来，其和必然在 36~54 之间，这个数字称为营数。再用天地之数 55 减去营数，其差必然在 1~19 之间，再由上二数之差可以推算出哪—爻是变爻。推算时将余数从初爻往上数，再由上往下数，循环而数。如果余数是一，就定位于初爻。余数是八，则定位于第五爻。然后又要看所定位之爻是九或六，则变爻为六或九，占事者就要按所变爻的爻辞问吉凶。倘若七或八，就不存在变爻，占事者就按本卦卦辞问吉凶。例如：

(1) 当筮得䷗^九，升卦。六爻皆不变，当以升卦卦辞占之。

(2) 当筮得䷗^六，井卦。其营数是 47，用 55 减去 47，余 8。从下往上，从上往下数爻，至五爻而 8 尽，故五爻为变爻。五爻恰巧是九，就变为六，成为䷗^六，升卦，称作“随井之升”，占事者以井卦九五爻推测吉凶。

(3) 当筮得䷗^七，睽卦。其营数是 46，用 55 减去 46，余 9。依法数之，至四爻而 9 尽。四爻为可变爻。而四爻为七，不变，用睽卦卦辞占事，这叫做“遇睽之七”。

(4) 当筮得䷗^七，姤卦。其营数为 43，用 55 减去 43，余 12。依法数之，至初爻而 12 尽。初爻是变爻，初爻为六，就变为九，成为䷀^九，乾卦，这叫做“遇姤之乾”，用姤卦初六爻辞占事。

(5) 当筮得䷗^六，困卦。其营数为 49，用 55 减去 49，余 6。依法数之，至上爻而尽。上爻为八，不变。又因本卦中可变之爻少于不变之爻，用

本卦卦辞占事，这叫做“遇困之八”。

(6) 当筮得䷗ 屯卦。其营数为48，用55减去48，余7。依法数之，至上爻而爻7尽，上爻为八，不变之爻。然本卦中初、四、五皆为变爻，可变之爻与不变之爻相等，则变屯之九为六，六为九，得䷏ 豫卦。这叫做“得贞屯悔豫”。表示贞悔相争之卦，以两卦卦辞合占事。

(7) 当一卦中可变之爻多于不变之爻（如有4爻或5爻为九六），而又处于非宜变之爻位置时，则变九为六，变六为九，得出之卦，主要以之卦卦辞占之。如当筮得䷏ 艮卦。其营数为44，用55减去44，余11。依法数之，至二爻而11尽，二爻为八，乃不变之爻。于是就是变艮之九为六，六为九，得䷐ 随卦。这叫做“遇艮之随”，用随卦卦辞占事。

(8) 当六爻皆九、六，就不需求宜变之爻。如筮得䷲ 震卦。就将九六互变，得䷶ 巽卦。用巽卦卦辞占事。

(9) 当六爻皆九（或皆六），则变九（六）为六（九），叫做“遇乾之坤”（遇坤之乾），主要用乾用九爻辞占事。反之用坤用六爻辞占事。

筮法比较复杂，但还是有规律可循。

占筮第二步是判吉凶。当占筮得知应按某卦或某卦之某爻占事时，就面临两种选择。

(1) 按图索骥，根据卦爻辞判断。这样就必须懂得卦爻辞作用和其中的一些术语。卦爻辞一般分指示之辞和断占之辞两部分。指示之辞从举例以预示所占事的吉凶。其所举的例一般不出于下列几种情况：①采用古代故事。如《大壮》六五爻辞“丧羊于易”，《旅》上九爻辞“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就是叙述商的先王亥曾客居易部落，有一次走散了羊群，后来终被易的首领绵臣杀死，牛羊也被掠夺。②记录当时占筮后行事的結果，以作为后占之借鉴。以前占之果吉证明后占之必吉，以前事之利证后事之必利。据高亨先生认为，凡《周易》中有“亨（或享）”字之爻，都是当时人筮得某卦爻后，举行祭祀并获吉的记录。③用比喻法取某种事物以象征人事。如《井》九二爻辞“井谷射鲋，甕敝漏”。鲋生于井，象征事的险和奇，射深井中的鲋，结果反把甕射破而漏水。象征行事后果不佳，其寓意是很明显的。④直截了当地举出一个事件及成败，从而表示所占事的吉凶。如《乾》九三爻辞“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以君子的行为和结果指示休咎。

在指示之辞后一般都有断占之辞，用以表明所占事的吉凶。《周易》中

往往用“利”、“吉”、“吝”、“厉”、“悔”、“咎”、“凶”等字。吉，表示有好结果，有福祥；吝，表示将遭遇艰难；厉，表示危险；悔，亦表示将遭遇困厄而使人担忧；咎，表示灾祸；凶，祸殃。《周易》中吉和利表示将会有好结果；而悔、咎、凶都表示有坏的结果，但三字含义有别。悔是较小的困厄。咎比悔要重，比凶要轻。凶是大祸殃，咎是较轻的灾患。以卦爻辞判断吉凶的例子如《国语·晋语》：“十月，惠公卒。十二月，秦伯纳公子，董因迎公于河。公问焉，曰：‘吾其济乎？’对曰‘臣筮之。’得《泰》之八，曰：‘是谓天地配。亨，小往大来。今及之矣，何不济之有。’”以上是筮师用《泰》卦卦辞“小往大来，吉，亨”判断吉凶。

(2) 按卦象、卦位、爻象、爻数判断。现实中筮师在占筮过程中往往根据卦象和卦位、爻象、爻位来判断吉凶。因此要了解《周易》的筮术还必须熟习卦象。八卦象征八类事物，同时又触类旁通，衍生开而可以象征更多的事物。下面按物类把八卦的卦象列举如下：

卦名 卦象	阳	阳	阳	阳	阴	阴	阴	阴
基本卦象	乾	震	坎	艮	坤	巽	离	兑
	天	雷	水	山	地	风	火	泽
	君 朝廷 君子 阳气	刑	民 美德 雨	贵族 贤人 阳气	臣 小人 阴气	教令 美德 木	明察明德 日电	民 阴气
	刚健	健 刚 鹄	刚	刚	裳 柔顺	谦逊、柔	柔	柔
		动车	陷 润	止	藏	进退、入 散	依附 煊	悦
	木果	苍筤竹 萑苇 果实 在下茎叶 在上的 庄稼	恩赏 险	谷实 果蓏	吝嗇	绳直 工 不果	文、文明 绳	竹
								畜牲

(续表)

卦名 卦象 基本 卦象	阳	阳	阳	阳	阴	阴	阴	阴
	乾	震	坎	艮	坤	巽	离	兑
	天	雷	水	山	地	风	火	泽
	马 老马 瘠马 驳马 首 父 圆 玉 金 寒 冰 大赤	龙 正东 足 长男 决躁 大途 寡 玄黄 春	豕 正北 耳 中男 加忧心病 沟渎 弓轮 赤血卦 隐伏 矫糅 曳 月 通 盗	狗 东北 手指 少男 闾寺 小石 黔喙之属 鼠 经路 门阙	牛 母牛小牛 腹 母 柄 布 釜 文 均 大车 众 黑	鸡 股 长女 躁 白 长 高 臭 利事三倍	雉 目 中女 甲胃 戈兵 乾 鳖蟹 螺蚌龟	羊 口舌 少女 巫 妾 毁折 附决 地硬而 碱性

八卦的卦象可像多种事物，乃至可像宇宙间一切事物。除了基本和常用的卦象稳定外，其他的卦象很灵活，往往由占筮者从一卦的基本卦象及其性质生发开来，附会衍用。从而在不同地方谈的卦象会出现牴牾。如《左传》昭公五年解《周易》“纯离为牛”，而《说卦》“坤为牛”。六十四卦为八卦相重，六十四卦的卦象在八卦卦象的基础上产生的，当同卦相重时，仍像一种事物，或表示重复的意义；当异卦相重时，表示两种事物之间的联系，占筮者可以卦象判断吉凶。如《左传》闵公二年：“成季之将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又筮之，遇《大有》䷍之《乾》䷀（《大有》五爻变），

曰：‘同复于父，敬如君所。’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这个例子中《大有》上卦是《离》，变成《乾》。《乾》卦象为父为君，《离》变《乾》，有向往父、君之象。所以“同复于父，敬如君所”是根据卦象分析而下的判断，并非爻辞。

古称八卦为经卦，六十四卦为别卦。别卦所重的两经卦的位置，称做卦位。卦象相同而其位置不同，也就表示两种事物出现新的联系，如《泰》䷊，下乾上坤，卦象上地下天，表示天气下降，地气上升，天地相交，所以万物生长昌盛。其卦象又为上臣下君，表示君情下达于臣，臣意上达于君，君臣同心，所以国家昌盛。因此《泰》卦就表示吉祥。相反《否》䷋，下坤上乾，卦象为上天下地，意味着天气不下降，地气不上升，天地之气不相交，所以万物难以生长。其卦象又为上君下臣，象征君王高高在上，旨意无法传递到臣下，臣情也不能达于上，君臣隔阂，国家的前途就凶险了。因此《否》卦就是凶卦。从《泰》、《否》两卦可以看到，即使卦象相同，它的位置不一，所含的意义也不同。

占筮者亦往往根据所占据某卦某爻的爻象、爻数来判断吉凶。爻象分阴、阳两种。阴爻的符号为--，《周易》用“六”标阴爻。阴爻象女、象臣民、象无才德的小人、象少而少力的人、象柔顺之德、象柔软的物体。阳爻的符号为一，《周易》用“九”标阳爻。阳爻象男、象君王、象有才德的君子、象强而多力的人、象刚健之德、象坚刚之物。爻数也称爻位，是《周易》中各爻所居的位次。每卦六爻，顺序由下而上，称初、二、三、四、五、上，爻位中要特别注意几种情况。①每卦中以五爻为君位，又称天位。四是近臣的位置；三是不太与君接近而又高的地位；二臣位，处不太高的地位，对君位有侧应责任；初表示刚处世；上表示事物的终了。②每卦中初、三、五爻为阳位，二、四、上爻为阴位。阳爻居阳位，阴爻居阴位叫做当位。当位在人事上就意味着德才与职位相称。金景芳先生说：“如果三、五是阴爻，以阴柔处三、五阳刚之位，有危险。如果三、五是阳爻，以阳刚处三、五阳位，就可以胜任而不危。”③复卦中三、五爻分别为内卦（下卦）、外卦（上卦）的中位，叫做“得中”，象征人有中正之道。④六爻之间有比、应、承、乘的关系。两爻相邻叫比，如初与二，二与三，三与四。相邻的两爻间，上爻对下爻称乘，下爻对上爻称承。内卦的初、二、三与外卦的四、五、上各是同位关系。如果初与四（或二与五，三与上）为一阳爻、一阴爻，称为正应，简称应。表示志愿相同。如果都是阳爻或阴爻，就

① 金景芳：《周易讲座》，第25页，吉林大学出版社，1987年。

不相应。六十四卦共有 386 爻，每爻的爻象和爻位都结合成一个整体，又各不相同。占筮者常凭此而释爻辞，断吉凶。例如《左传》昭公十二年：“南蒯之将叛也，枚筮之，遇《坤》䷁之《比》䷇（《坤》五爻变），曰‘黄裳元吉。’”（《坤》六五爻辞）以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尝学此矣。忠信之事则可，不然必败，外强内温，忠也；和以率真，信也。故曰黄裳元吉。黄、中之色也；裳，下之饰也；元，善之长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饰；事不善，不得其极……筮虽吉，未也。’”上述那次占筮，根据爻辞断为吉，然子服惠伯根据爻象与爻位，以为凶。他以为《坤》五爻为变爻，意味着不忠（“中不忠，不得其色”），二爻未能与五爻一起变为阳爻，意味着失去同伴（“下不共，不得其饰”），上爻亦未能变为阳爻，象征事未尽又不能出现转机（“事不善，不得其极”），所以他指出“筮虽吉，未也”。这个例子说明根据爻象爻位判断占筮的吉凶是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第三节 《周易》占筮是否灵验

当前，很多人对《周易》存在着一种错误认识，以为占筮就是骗术，是没有科学根据的，所以不灵验。然而英国人克利斯朵夫·巴克特就不这样看，他在《易经——第一号成功预测》中说：“当你面对使人犹豫不决的选择时，《易经》可以帮助你清醒头脑，作出正确决策。虽然书中的有些内容比世界上任何书都古老，但可以说，每一次打开它，你都发现蕴藏在其中的新的富于启发性的思想。它确实是一把经过时间考验，打开幸福和成功之门的钥匙。”^①巴克特先生的这一席话真可以使人耳目一新。倘若我们在研究《周易》之后，再品味一下，就会觉得他说的不是毫无道理的。

其实，大家都很清楚，在“优胜劣汰”的竞争原则下，有无数典籍在历史长河中被淘汰，湮没，不被人所闻。而《周易》倘若不具备某种科学性，那就无法想象一本谎言连篇的书籍可以在文明社会中绵延数千年，并尊为经籍之首，引起数以千计学者的潜心钻研，直至当代在国内外还掀起易的热潮。倘若筮术完全是骗术，也很难在这么长的时间内，在这么广泛的范围中获得为数不少的信徒。这就有点像气功，倘若气功没有一点神奇的作用，就不会如此深入人心。然而要把气功的作用说成能呼风唤雨，包治百病，先天

^① [英] 克利斯朵夫·巴克特：《易经——第一号成功预测》，第3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

预知，那也是把牛皮吹得无边了。但我们还是要承认，气功是科学的。由此我们也可以说，占筮也有蛮多学问。

占筮从数学角度看是一个概率学问题。1654年法国密尔爵士走进巴黎赌场，看到赌客在和庄家打赌，以连掷四次，骰子均未出现六点为赢，假如出现六点就算输。密尔爵士由这一情景想到更深一层，骰子六点一面出现的几率是多少呢？要连掷多少次，才能使赌客和庄家输赢公平呢？他通过计算，并就教于数学大师帕斯卜和费尔马，得出了概率理论上首次成果之一，认为投掷骰子的公平点是25次。从此，数学史上把密尔爵士走进赌场的那一天，看作是研究概率的发端。

概率论中提出两个观念：一是某事发生的几率，就用某一事件成功的可能数除以所有可能出现事件的可能数；二是独立事件的几率与上次发生的事件无关。举投掷硬币猜正反面为例，后一次投掷得正面的几率仍然是50%，与上一次投掷无关。当我们用概率观念去观察占筮术，就会通情达理地认识到，不管几率的大小如何，占筮者归根结底都是在概率上做文章，并非放的都是空炮。

当然，筮师对所占事的预测并不仅仅立足于自然条件下成功的几率。事实上，现实生活中的筮师大多是一些走家串户，与各阶层人士广泛接触，既有丰富阅历，又善察言观色，能善辩应答的人，在长期的职业训练下，会总结出一些符合规律的正确的心得体会。同时，他们养成了一种职业习惯，往往能在求筮者身上观察到为一般人忽略的各种现象，经过思维、归纳、对比、推敲，因此他们的判断并不是无的放矢，而是本人经验与所占事件比较的产物。这种经过思维而形成的判断成功的几率就大于无思维状态下的几率。这样的事例是很多的，比如说，解放前曾有一位算卦先生到某村为村民算卦，有人指一坟说：“请说坟中埋的是男还是女？”算卦先生手占一卦后，嘴里还反复念：“男子阳气通青天，女子阴气平地穿。”接着说：“坟里是男的。”村里人都承认他说对了，这个坟里埋的正是个老汉。随后，村里人又另指一坟请他推算，算卦先生还像刚才一样重复了一遍之后说：“坟里是女的。”大家又承认他说对了。这时村里一富户不服气，请算卦先生到家，说“寒舍上下女子共四十名，我把她们招到这里，你能算出哪个是我夫人”。一会儿，算卦先生面对着那四十名妇女，装模作样算了一阵，口中念着：“夫人端庄有福气，一只花蝶头上飞，凡夫俗子见不到，只有老夫算得对。”说完，就指着一名头戴金钗的妇女说：“此位便是尊夫人。”富人心悦诚服，立刻赏给他不少银两。但是在上述活动中，只要我们认真分析，就会知道算卦先生使用了转移注意力的小伎俩，在猜坟中是男还是女时，当说到“男子

阳气通青天”，凡遇到人抬头望天，就知道理的是男的；当说到“女子阴气平地穿”，而有人弯腰看地下，就知道理的是女的。同样道理，当说到“夫人头上花蝶飞”时，人们都不约而同地朝夫人头上望去，由此就知道谁是夫人了。从上例我们可以知道，算命先生在判断坟中男女性别和夫人身份时，他面临的几率只是50%、50%和2.5%，然而当他在掌握心理学规律的情况下，他的预测就全部获得成功。同时，我们认识到，筮师所掌握的知识，如同计算机储存的信息，他所占的事物，如同计算机接收的外部信息，计算机要经过识别才能作判断，同样，筮师也只有在他已认知的范围内，才能获得正确的预测。

历史上的一些杰出人物，他们善于总结历史经验，对周围的一切（从君王性格，宫闱秘事，到君臣关系，派系倾轧，国家财力，军力以至民心等）又十分留心。于是在一些大事面前，能审时度势，用占筮的形式发表意见，常常获得成功，这是很自然的。例如：公元前636年，周天子襄王的弟弟王子带与王后隗氏通奸，被周襄王发觉。王子带勾结周朝大臣颓叔、桃子二人谋反，借邻国翟的兵力把周襄王驱逐到郑国，周襄王就派大臣简师父向实力强大的诸侯国晋国求救。晋文公征求大臣狐偃的意见。狐偃说，从前齐桓公能召集诸侯，成为霸主，全凭尊王这一条。今天假如我们能帮助天子，讨伐叛臣王子带，那就是继承了晋国先君文侯辅助周天子的事业，而向其他诸侯表明自己的信义。晋文公就叫太史郭偃用龟板占卜。郭偃说：“吉，此黄帝战于阪泉之兆。”（传说黄帝在阪泉战胜炎帝，卜得此兆，就意味着胜）晋文公又命令用蓍草算一卦，得《大有》之《睽》（《大有》三爻变），占筮的大臣说：吉，遇公用亨于天子之卦。战必胜，还会受到天子的款待。于是晋文公就放心地出兵，帮助周天子平叛复位，占筮中的预测和事实吻合。这个历史故事与其说是证明占筮的灵验，倒不如说是占筮的大臣们看准了王子带乱伦反叛而不得民心的处境，看准了要当霸主就必须实行尊王攘夷的形势，因此才借占筮以巩固晋文公出兵的信心。

筮术在人的心目中觉得灵验的另一个因素是它所指示的卦爻辞都是一些微妙的语言，其涵义有很大的包容量。《周易》六十四卦覆盖了生活中的很多方面和发展变化的各个阶段，因此它能同任何一个特定的具体环境联系。清代易学学者陈梦雷就说过：“《周易》立象以尽意之旨，占者随事而思其义可也。”^①这种随事释义的机动性就往往为筮师开脱失误提供了方便。同时，《周易》对所占事的回答并不是直接的，而是多维的，是从另外一个层

^① 陈梦雷：《周易浅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次上去进行回答。这些答案可能贴切，也可能很遥远，或者神秘深奥。它仿佛智慧之光投射在混乱之中，需要一种弹性的敏捷的思维，才能让人清楚即将到来的前景是什么。这里就要谈到一个心灵感应问题。很多决策者、发明家都非常清楚这个事实，许多浮光掠影的思想来源于直觉。它们的突然出现并不是逻辑推理的结果，而是一种潜意识。1847年赫歇尔曾说：“科学发现依赖于某些有运气的思维，我们并不能追溯它的起源，某些智力的投射是超越于一切规则的，不存在必然导向发现的格言。”^①由此我们可以说，我们当然不会相信五十根蓍草能给我们找出一个正确的答案，但是占筮过程中卦爻辞、卦象往往会激发人的主观心智联系，从而把某种特定的环境、时间、事件联系起来，显示出某种解决方法。这种灵感的出现正如有人在梦中发明了缝纫机和发现汽油结构分子，并不是没有可能的。

最后，我们还是要说明，占筮也是有中有误的，举下面历史故事为例。

刘伯温（公元1311—1375），名基，浙江青田人，元末农民起义领袖朱元璋的军师。朱元璋做皇帝后即为明太祖。有一天，明太祖在内殿吃烧饼，刚咬一口，忽报国师刘基进见，太祖用碗覆盖住烧饼，才召刘基进来。行礼后，太祖就问：“先生深明数理，可知碗中是何物件？”刘基算了一卦，回答说：“半似日兮半似月，曾被金龙咬一缺，此食物也。”打开一看，果然是烧饼，这是民间流传的烧饼歌的原委。

又如公元前11世纪，正值殷末周初，周文王辞世，武王继位，武王将要伐纣，用蓍草龟壳筮卜出兵的吉凶。结果，皆不吉利。这时暴雨骤至，群臣惊惧，武王吓得不敢出兵。然姜太公毅然把蓍草推向一边，将龟壳踏在脚下，对武王说：“枯骨死草，何知吉凶？”经过他的劝告，武王才决定出兵，并取得胜利，消灭殷王朝，建立周朝。

以上两则例子，刘伯温这一卦猜对了，而周武王那一卦却失误了。无论是对还是错，都符合概率论原则。只是在现实生活中，筮者失误时往往诡言巧辩，推诿责任。清代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中就有一个故事：

清朝乾隆年间，河北沧州有一个姓郝的老妇会算命，平时又会拉拢、结交丫环、老嫗，为她探听各种小道消息，因此十分熟悉他人隐事。有一次，有一孕妇问所怀男女，郝答以男。后生女，少妇前来责问。郝巫瞪眼说：“你本应生男，某月某日，你娘家送来20个饼，你只把6个交给公婆，藏下14个，自己吃掉了。老天爷怪你不孝，因此转男为女。你难道还不醒悟

^① 钱时惕主编：《重大科学发现个例研究》，第1页，科学出版社，1987年。

吗？”少妇不知道这件事早就被郝巫探听明白了的，于是恐慌起来，认错回去了，而周围的人也都觉得郝巫真是神极了。

由上所述可见，凡世上的卜筮，既有良言，亦有骗术；时而中，时而误，某些时候人们不妨把它视作一种心理咨询，既可信，亦可不信，这或许是比较公允的态度。

第四节 占筮与政治

几千年来占筮融贯于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尤其引人注意的是，政治也一直处于筮的磁场而未能摆脱其引力。一方面古人出于本心，对卜筮抱着恭敬顺从的姿态。从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起，他们便产生了“天人合一”的观念，他们观念中的天是具有自然义和命定主宰义的双重性格，因而天与人的关系存在着某种不确定的模糊性质，天不是人的绝对主宰，人不必对它顶礼膜拜。然人也不能征服改造天，人对天的崇拜是包含着对自然规律的适应和遵循，也意味着对命运被动的顺从。因而占筮的结果在古人的心目中象征着天意，会得到他们的尊重并执行。另一方面，他们也常从政治角度考虑，当发现筮得的结果与现实不符合时，就会逆反而行。可以说，几千年来占筮一直是政治舞台上一股强大力量，不论是统治者，还是叛乱、起义者，他们都没有忘却筮术的魅力，往往聘筮师为军师或参谋，借筮卦以蛊惑、把握人心，以逞其目的。

传说史前黄帝与炎帝为了争夺水草丰美的中原地区，曾在河北涿鹿之野发生一场大战，临战前，黄帝令巫咸占了一卦。^①这件事可以说是占筮在政治斗争中发挥作用的最早记录。

到殷末周初，相传被俘的殷太师箕子曾和周武王有过一次谈话。其中说：“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②意思是说，当你遇到大的疑难问题，可以由自己郑重地思考，也可以向大臣们，进而向平民们征求意见，还可以通过卜筮找出处理方案。这又是占筮在古代政治中发挥作用的明证。

春秋时，中原混战，华夷也战火不熄，晋献公攻破骊戎部族，掠夺了该部族一名美女。归国后对她十分宠爱，称作骊姬。到公元前658年，献公就想立骊姬为夫人，用龟壳、蓍草卜筮，结果是卜不吉而筮吉。占卜的大臣考

^① 《太平御览》七九引《归藏》，中华书局，1955年。

^② 《尚书·洪范》，见孔颖达：《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79年。

虑到晋国内诸王子并立，不希望看到一名外族女子专宠，使已经复杂的嗣位继统大事变得更加错综复杂，因而就推托说，占筮的时间短，占卜的历史悠长，不如采用占卜的结果。然晋献公色迷心窍，固持己见，立骊姬为夫人。不久晋献公逝世，骊姬要立少子为君。于是晋国内相继出现了长达十九年的争夺王位继承权的斗争。从晋国占卜大臣和晋献公的行为我们可以看到，古人对占筮的态度有时也是暧昧的。

历史上有很多英雄豪杰利用占筮宣传发动群众，举义旗，创大业。公元1世纪前后，佛教传入中国。2世纪初，沛国丰（今江苏丰县）人张陵糅鬼神、迷信和道家哲学于一体，仿佛教的仪式和教主等诸佛的形象，创建道教，尊黄帝和老子为教主，突出《周易》的占筮功能和卦象体系（这一点与儒家突出《周易》的伦理、哲学内容是截然相反），把《周易》作为道教主要的经典（因此后世道袍后幅中心有八卦太极图形），创立了一个人员众多的宗教组织，秘密从事反对汉王朝的活动。他们在汉中建立了一块自治区域，规定入道者交纳五斗米，在各地设立义舍，存放义米、义肉，过路者量腹取食，并设祭酒，管理地方政治，人犯法，可以原谅三次，然后用刑，这种含有原始民主的政治措施获得了百姓的拥护。这个政权一直延续到公元215年，才屈从于曹操强大的军事力量。此后以占筮、巫术招徕群众，借道以掩护反抗的宗教组织层出不穷，一些组织成为抵抗异族、反抗朝廷的中坚力量。如：

南宋倡兴的白莲教，固然有佛教、摩尼教等影响，但亦有道教成分。之后由该教衍生出八卦教，分八卦组织群众。这些教派在流传过程中，有不少巫师参加进来，他们运用降神、占筮等巫术，往往迅速成为躬代神位的教派首领。清乾隆三十九年（公元1774年），山东阳谷县人王伦的八卦教起义，震惊朝廷。

20世纪初，发生在北方大地上的义和团运动就是和八卦教等民间宗教团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清中山知府支碧湖指出：“义和拳匪即始发难于山东沂州之十八团，遂及曹州，蔓延直隶，夤缘而入京师。其术分八卦为八门，名八卦教，乃白莲教遗孽。”^①义和团的成员崇信五行八卦，上阵作战都带八卦肚兜，执八卦旗。义和团运动是中华民族近代史上发生的一个重要事件，对当时社会的思潮及之后社会的发展有过深刻的影响。

八卦教的另一个派生组织叫红枪会，其内部成员称之为离教，以河南商

^① 支碧湖：《续义和团源流考》，见中国史学会：《义和团》第4册，第44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

丘郊外的一小镇为据点，拥有数千名教徒。该教采用《周易》八卦中的离卦（☲）为标志。离卦的方位为南，卦象为火，所以红枪会徒统一携带红缨枪，口号是“离教在南边，有梯登上天，教神掌天门”，以气功、武术和巫术吸引群众。

在历史上有很多擅长占筮的人都担任过帝王的卿相等要职，决策国事，为推动历史前进作出过一定贡献。我们姑且不举上古的巫咸、姜尚以及汉代张良等，以中古后为例。

三国时魏国管辂（公元209—256），字公明，山东平原西南人，幼好天文，及长，精通《周易》和占筮。当曹操统一北方，位列三公，威慑汉天子时，自然引起汉王朝保皇臣僚的不满，他们在暗中策划政变，伺机消灭曹氏集团。而管辂通过筮术预言了这个阴谋。当时蜀汉张飞和马超领兵进攻汉中，曹操准备亲自迎战。管辂占了一卦，预言来春许昌将有大灾。于是曹操留居邳郡，派大将守边，又令兵马巡视许昌，以应付变乱。到第二年正月十五夜，果然有耿任等五人趁元宵灯节举事。由于曹操事先准备，顺利消灭乱党。曹操统一北方，发展生产，拯救黎民于战火，奠定了三国一统的基础，在历史上有一定的进步作用。管辂以占筮协助曹氏平叛，其历史意义也是不言而喻。

蜀国的诸葛亮（公元181—234）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一个成功的筮师，据说他在赤壁之战中，曾筑起方圆二十四丈、九层二十七尺高的土坛。第一层东南西北四方按二十八宿插旗，第二层按六十四卦分八位而立，插黄旗。诸葛亮沐浴斋戒，跣足散发，焚香祭风，招东风而火烧赤壁，大败曹军八十三万，从此割江而治。赤壁大战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版图，初步奠定了魏、蜀、吴三国鼎立之势。此后，诸葛亮担任蜀国丞相，率蜀兵七出祁山，力图统一中国，终因力有不逮而未能实现大志。《三国演义》中描写他临终前，在军营中点起七星灯，披发仗剑，踏罡步斗，以祈延寿，可惜未获成功。他曾写过卜卦、兵法和政策方面的著作。《三国演义》描写了他的无数奇计妙策，很多就是占筮术的灵活运用。《三国演义》作为历史题材小说，人称七实三虚，人物形象与情节故事固然有虚构的成分，然大部与其原型相隔未远。诸葛亮为蜀汉政权的建立和蜀地开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千秋万代敬仰的人物。

葛玄（公元164—244）是与诸葛亮同时代的又一位著名筮师，今江苏丹阳句容人，曾跟左慈学道，后来在道教中被尊为葛仙翁，又称太极仙翁。葛玄的从孙葛洪则继承先祖的衣钵，在东晋元帝时期任丞相。

隋末唐初，瓦岗寨农民起义军中有一名军师叫徐世勣（公元594—

669)，屡出奇计，后随李密降李世民，为创建大唐帝国东征西讨，立下戎马功劳，封英国公，任兵部尚书，赐姓李。史书称他“每行军用师，颇筹算，临敌应变，动合事机，与人图机，识其臧否”^①。在话本《说唐》中徐世勣是个精通兵法韬略，又善星相占筮的云游道人。

史载宋代有一位精通易理的道士叫陈抟（？—989），先后隐居在武当山、华山，传授八卦先天图，宋史上记载了他的两个故事。其一，陈抟有只大瓢，一向挂在壁上，道士贾休复很想要它，却一直没有明说。有一天贾道士到陈抟住所，陈抟就说：“你来没别的意思，是不是想要我的大瓢。”说完，就叫身边的人取下送给他。贾道士心中十分惊讶，以为陈抟有通神的本领。其二，有一天，华阳人郭沆到华山云台观访问陈抟，当夜就寄宿在观中。半夜，陈抟叫他起床，马上回家，郭沆犹豫不决。过一会儿，陈抟又说：“行了，可以不用回去了。”第二天，郭沆回家，才晓得自己母亲在昨日半夜突然心绞痛，差点死去。没多久，却缓解过来。^②这两件事究竟是陈抟凭占筮预知还是有特异功能，实难考证。陈抟在世时，得到宋太宗的优待，有和皇上属和诗赋的宠幸。

在蒙古军营中的道士丘处机（公元1148—1227，号长春真人），得到了成吉思汗的重视，被尊为神仙。他利用自己在成吉思汗心目中的地位，经常劝说成吉思汗在征战中不要屠戮百姓，以敬天爱民为本。他假借打雷，说：“雷，天威也。人罪莫大于不孝，不孝则不顺乎天，故天威震动以警之。似闻境内不孝者多，陛下宜明天威，以导有众。”^③成吉思汗接受了他的劝告。

明代最有名的筮师便是刘基，字伯温，民间传说刘伯温占筮灵验如神。例如，有一次朱元璋正准备处罚囚犯，他就上去问明理由。朱元璋就告诉他自己做的一个梦，说受梦的启示要处罚囚犯。刘伯温听后，忙说：“不对，梦中所示正是将要扩大土地，增加民众的好预兆，应停止刑罚。”过了三天，果然有海宁县守将前来投降。于是朱元璋真的把那些囚犯都释放了。刘伯温的故事在民间流传很广泛。直到清代，百姓起义，还从地下挖出刻着刘伯温预言的碑石，借他的名头，以扩大号召力。历史上真正的刘伯温是个络腮胡子，身长貌伟的汉子，疾恶如仇，感情容易冲动。他生前获得朱元璋重用，被看作是汉初张良、三国孔明一般的智囊人物。史书上说“世所传神奇，多

① 《旧唐书·列传十七》，中华书局，1972年。

② 《宋史·隐逸·陈抟传》，中华书局，1972年。

③ 《元史·丘处机传》，中华书局，1972年。

阴阳风角之说”^① 其实并不是他的主要方面，但民间传说亦自有其所本。

宋献策（？—1645），外号宋矮子或宋孩儿，是个地道的算命先生，后来成为明末农民起义军首领李自成的谋士，被封为军师，为推翻明封建王朝出生入死，后被清军俘杀。

随着《周易》影响的扩大，历史上精于卜筮之术的人不计其数，他们无论是在朝廷内，还是在野，都在政治上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当然，中华民族没有像西方国家而出现一个教王控权、教会势力严重干涉朝政的时期，然而我们丝毫不能低估卜筮迷信对执政者精神上的作用，这正是卜筮者能长期发挥政治影响的根源。

古代筮师干扰政治，有时出现负作用。如汉武帝时期的戾太子事件。戾太子又称卫太子，为人仁厚文静，本是汉武帝中意的皇位继承人。当时，方士和神巫多聚于京师，往往用埋木人祭祀而厌胜之术惑众。而汉武帝疑心有人持此术针对自己，于是派江充收捕巫师。这就是震动汉帝国基石的巫蛊事件。江充旧时就和太子不和，趁此机会挟权逼反太子。彼时汉武帝已人近晚年，昏蒙而不辨真情，终于演出了一场父子相残的政治悲剧。

后世在笃信方术、祈求长寿方面能与汉武帝并驾齐驱的有明世宗朱厚熜，他赐道士邵元节、陶仲文、顾可学等人以尚书官衔，凡有国家大事则依靠他们占筮扶乩，任凭这些人胡说八道。明世宗不过问朝政，反而严厉处罚正直大臣，并听信方士的话，对宫女施行性虐待，以为由“采战之术”而可以长生。明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杨金美等十六名宫婢联合起来，趁明世宗熟睡时，要把他勒死，她们用绳子勒脖，抹布堵嘴，差点叫皇帝断气。可惜慌乱中绳子打了个死结，收拢不紧，时间一长，被人发觉，十六名宫婢全部被杀。明世宗在位长达四十五年，由藩王而继大统，起初亦锐意改革朝政，后来因迷于筮卜巫术而未能有所作为。他临死前也醒悟到这一点，在遗诏中说“祇缘多病，过求长生，遂至奸人诬惑”。

筮卜之士能佐君立业，亦能败国毁家，有时亦能借天意来阻止逆行。如郭璞（公元276—324），东晋时期的文学家、训诂学家，又是著名的精通阴阳卜筮的人。曾担任大将军、荆州牧王敦的记室参军。当时王敦手握重兵，驻扎在武昌，日夜阴谋篡夺司马氏政权。东晋太宁二年（公元324年），他趁明帝病危，企图进兵建康，就叫郭璞占筮。郭璞据筮结果，说是凶卦。并劝告说：“从卦象看，你要举兵，不久必然有祸。倘若住在武昌，那你的寿命就很长了。”王敦听后大怒，就问：“你算你的寿命是多少？”郭璞回答说：

^① 《明史·刘基传》，中华书局，1972年。

“我算自己的寿命只到今天中午。”就在这一天，郭璞被王敦杀掉了。^①《史记·日者列传》上宋忠、贾谊曾讥讽司马季主说：“夫卜筮者……虚高人禄命以悦人志，矫言鬼神以尽人财。”郭璞可以说是筮卜史上为数不多的耿直刚烈之士。

综观历史，占筮干预政治的事例是举不胜举。其实，占筮只是巫文化中的一个部分。《后汉书·方术列传》说：“仲尼称《易》有君子之道四焉。曰‘卜筮者尚其占’。占也者，先王所以定祸福，决嫌疑，幽赞于神明，遂知来物者也。其流又有风角、遁甲、七政、元气、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专、须臾、孤虚之术，及望云省气，推处禅妖，时亦有以效于事也。”巫文化又是道教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儒、道、佛是环生于中华大地上的三大宗教，儒文化、巫文化、佛教文化长时间地深深扎根在华夏民族的心灵深处。三大文化往往是此消彼长，又互相滋养，它们是影响中华民族历史的重大因素之一。从这一点看，以往我们对于巫文化影响历史进程方面的作用研究得委实是太少太浅了。

^① 《晋史·郭璞传》，中华书局，1972年。

第三章

《周易》哲学

要了解我国古代哲学，必须到古代史籍和诸子百家学说中去探索。那些典籍尽管大多没有自觉地提出哲学问题后再加以讨论，但丝毫不能说明这些著作所阐述的就不具有哲学观念。就《周易》来说，我们就可以从中探索到当时哲学家心中的奥秘和他们哲学思想上的触点。

第一节 《周易》哲学与古代西方哲学的横向比较

哲学，源出于希腊文 *Philosophia*，意即爱智慧，反映了人们对于整个世界（包括自然界和社会）的认识，因而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而胡适先生另有一种更宽的解释，以为“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① 由上面二项定义，我们自然可以从《周易》反映出的对世界的看法以及所关切的问题，归纳出其哲学要点。由于《周易》中的哲学观念受到八卦的框限，有着其特异性，因此我们不妨名之为八卦哲学。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中就注意到《周易》的哲学意义，他指出：“第二件需要注意的事情是，中国也曾注意到抽象的思想和纯粹的范畴，古代的《易经》（论原则的书）是这类思想的基础。《易经》包括着中国人的智慧（是有绝对权威的）。”^② 《周易》中反映了哲学上的很多问题，

^①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见《民国丛书》第一编，商务印书馆，1919年。

^②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第120页，三联书店，1957年。

下面我们着重谈四点：唯物论；辩证法；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时间的物质性。

（一）唯物论

对世界本原的认识和研究是古代哲学中一个最常见的命题。所谓本原即万物由此产生，最后又转化为它的一种物质，即实体始终不变，只是变换它的形态。几乎古代所有的学者都在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公元前6世纪希腊的泰勒斯认为万物的本原是水。他认为水自身是常存的物质，不会产生，也不会消失。作为世界本原物质的水，是世界统一性的基础。水存在于所有存在物中，所有存在物来自水又复归于水。它们只是水的变化的形态，因此水是大千世界的本质或稳定的方面。

与此同时，古希腊另一位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认为：“这个世界对于一切存在物都是一样的，它不是任何神所创造的，也不是任何人所创造的。它过去、现在、未来永远是一团永恒的活火，在一定的分寸上燃烧，在一定的分寸上熄灭。”^①当伊奥尼亚的哲学家们从物质世界中寻求事物的本原，把水和火作为万物的本原时，毕达哥拉斯抛开事物感性的质的区别，把共同的数量关系抽象出来作为万物的共同基础。毕达哥拉斯曾向泰勒斯求教，并得到他的指点。一天，他路过一家铁匠铺，为音色清脆、音律整齐的打铁声所吸引，情不自禁停下来，捉摸着产生这些悦耳的音调的原因，发现和铁锤的重量相关。当时铁匠铺共有五把锤子，其中四把的重量正好是12、9、8、6。他动手试锤打，发现最重的铁锤敲出的音比最轻的锤敲出的音低八度，另外两把分别发出四度音和五度音。第五把锤的重量与其他四把不成比例，正是这把锤破坏了音调的和谐，从而他发现了音调和数量之间的关系。他回家用别的乐器试验，结果完全一样。这就是他发现万物与数量关系中的一次机遇。由此他得出结论，万物的本原是数，数先于万物而存在，而万物又总是按照一定的数量关系组合。由于毕达哥拉斯认为数是客观存在于事物中，因此他的世界本原观仍具有唯物性的一面。

而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就在物质世界以外寻求事物的本原。柏拉图以为感性的具体事物不是真实的存在，在感觉世界之外还有一个永恒不变的、独立的、真实存在的理念世界。理念世界先于并且决定事物世界，而事物世界只是摹仿理念世界的复本和影子。这就是客观唯心主义的认识论。

^① 北京大学外国哲学史教研室：《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21页，商务印书馆，2004年。

当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希腊的哲学家在争论万物中本原是物质性还是意识性时，处于公元前17世纪前后的华夏民族却清楚地认识到世界的一切根生于天和地。上古时代生活在黄河中下游流域的华夏先人由于气候、土壤的适宜，技术的进步，很早就跨进了农业社会。在《山海经·大荒西经》上说：“有西周之国，姬姓，食谷，有人方耕，名曰叔均，帝俊生后稷，稷降以百谷……叔均是代其父及稷播百谷，始作耕。”《诗经》中也有很多诗篇（如《周颂》的《噫嘻》、《丰年》、《载芣》、《良耜》、《大雅·生民》、《豳风·七月》等）记载了当时农业生产情形。从事农业的民族流动性较小，而且必须更深刻地观察了解并依靠气候、天文及土地，了解天地与人事间的相互关系，因而他们认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变动莫大乎四时”^①。这段话反映了他们的世界观中世界是一个整体，这个整体叫太极。太极分为两部分，即天和地，叫做两仪。而天地存在于春夏秋冬的时间空间中，在这个时间范围中，除天地外还有其余六般物质，即水、火、山、泽、雷、风，分别用乾（☰）、坤（☷）、坎（☵）、离（☲）、艮（☶）、兑（☱）、震（☳）、巽（☴）表示。这八种物质是万物的根源，而天与地又是这八种物质的纲和本。八卦可以概括、确定人的吉凶福祸，从而决定人的大业。然而所有变化都笼罩在春夏秋冬的时间范围中。这就是上古时代华夏先人对世界的看法。

《周易》中把天、地、水、火、山、泽、雷、风看成是万物的本源，反映了其世界观具有朴素的唯物因素。同时这一个观念还具有三个特点：

（1）在低层次科技条件下单靠直观而产生的片面性。

（2）抽象性。《周易》可以观物取象。世界上所有的人、事、物都可以通过八卦的形式表现出来。如：乾，可以代表天、君、父、夫、刚健等。坤，可以代表地、臣、子、妻、柔顺等。震，可以代表雷、刑、长男、鹄等。《周易》中又应用阴阳概念将所有事物划分成阴阳两大类。用阳爻“—”阴爻“- -”的符号反映。于是阴爻、阳爻及八卦的符号不再是单一的物质性的象征，而能包容宇宙间所有的一切。因而这些符号好像数字从具体物的数量关系中演升为数学上的符号一样，具备了抽象性。这种观物取象的思维是否与泰勒斯的思维有共性呢？黑格尔曾指出，在泰勒斯命题里“感性的水并不是被当作与其他元素和自然事物相对待的特殊事物，而是被当作溶合和包含一切实际事物在内的思想——因此水被了解为普遍的本质”^②。

① 《周易·系辞上》，见孔颖达：《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79年。

②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三联书店，1957年。

所以我们说泰勒斯所说的万物为水，其实也是一种抽象思维。

(3) 混杂有唯心因素。《周易》通过观物取象以及从八卦的变化来象征宇宙人生的变化，这和毕达哥拉斯从数出发探索各种观念有相似之处，是带有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成分。这一点当然和《周易》应用于占筮相关。正如列宁所指出的，“科学思维的萌芽同宗教、神话之类的幻想的一种联系。”^①从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进程来看，《周易》中出现唯心因素是难免的。

(二) 辩证法

辩证法是研究和反映世界现象普遍联系和发展的哲学学说。它认为世界是永恒运动变化着的，而运动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自身所固有的各种矛盾发展的结果。古希腊的米利都学派和毕达哥拉斯学派都觉察到事物都存在着对立面，运动即是对立面相互转化。古希腊辩证法的奠基人是赫拉克利特。他说：“这个世界……它过去、现在、未来永远是一团永恒的活火。”^②又说：“我们踏进又踏不进同一条河，我们存在又不存在。”^③赫拉克利特用活火和河流象征事物的运动变化，并以为其变化是有规律的，这团活火“在一定的分寸上燃烧，在一定的分寸上熄灭。”^④还认为运动的根源是对立面的相互斗争转化。他说：“相反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不同的音调造成最美的和谐，一切都是通过斗争而产生的。”^⑤恩格斯高度评价了赫拉克利特提出的观念，他说：“这个原始的素朴的而实质上正确的世界观是古希腊哲学的世界观，而且是由赫拉克利特第一次明白地表述出来的：一切都存在，同时又不存在，因为一切都在流动，都在不断地变化，不断地产生和消失。”^⑥列宁称赞赫拉克利特“为辩证法的奠基人之一”。他所提出的活火这个命题“这是对辩证唯物论原则的绝妙说明”。

当公元前6世纪中叶赫拉克利特发现了辩证法规律，给古希腊哲学带来黄金般光明时，事实上在东方宝典《周易》中早就深深地留下了辩证法的足

①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第275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

② 北京大学外国哲学史教研室：《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21页，商务印书馆，2004年。

③ 同上书，第23页。

④ 同上书，第21页。

⑤ 同上。

⑥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417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迹。郭沫若先生所著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有一篇就专门论述《周易》中的辩证观念。《周易》包含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1) 阴阳观念。《系辞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周易》作者认为，自然界和社会中的事物虽然形态各一，但可以划分为阴阳两范畴，一切变化都是由阴阳两方面力量交互作用而引起的，这就是宇宙间的“道”。“道”也就是规律。阴阳观念包容着事物的互补、差异、对立三种关系，是一种完善的认识论。《周易》经部分处处表示出阴阳意识。如：

①爻的符号。《周易》用“--”、“—”两个符号表示阴阳。

②八卦为四种组合关系。阴阳爻在卦位上的不同排列得出八卦，组成天与地、水与火、山与泽、雷与风四种组合。

③八卦两两排列，组成六十四重卦。重卦中一部分上（外）下（内）卦存在矛盾关系。如即济卦，上卦卦象为水，下卦卦象为火，上下卦之间构成一对矛盾。一部分重卦的上下卦之间虽然没有明显的矛盾关系，但卦象所反映的关系同实际事物相对照就显得是反常的，因而也构成一种矛盾。如夬卦，卦象是泽在天上。本来泽与天不是矛盾关系，但泽在天上的卦象同实际情况是矛盾的，意味着不正常，因此卦爻辞中就出现“有厉”、“不胜”、“不利”、“终有凶”的警告。

④六十四重卦形成三十二对组合，一部分反映了基本矛盾。如乾坤、泰否、损益、既济未济等。

《周易》传的部分更广泛地阐述了矛盾对立的观念。如《系辞上》首起就指出“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焉。”传的作者把自然界划分为天与地（其性质为尊与卑，反映在八卦中是乾与坤）两大部分，把人类归纳为贵或贱两个档次，把变化划分为动与静两种形态；把物性判定为刚或柔两个范畴，把一切变化的结果区别为吉与凶两种类别。从而把矛盾对立看成是自然界和社会普遍存在的关系。毛泽东指出：“中国古人讲‘一阴一阳之谓道’，不能只有阴没有阳，或者只有阳没有阴。这是古代的两点论。”①

(2) 事物处于流动变化状态。《周易》是一部讲变化的书，《系辞上》说：“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爻者，言乎变者也。”“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六爻指的是卦，卦形的变化反映了三极（天地人）变化的规律，而爻辞就是反映了变化的内容。于是人可以通过占筮，从卦形变化中体会到爻辞的意义，领悟到所占事物变化的趋势。那么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20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

《周易》是如何认识并阐述世界变化的规律呢？

首先，《周易》认为天地万物都在无始无终的循环反复的变化之中。《泰》卦九三爻辞“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这里“平”可理解为发展顺当，无险阻，“陂”理解为艰难。这是说没有一种事物的变化是一贯顺当而不出现艰难，发展的趋势是从顺畅到滞涩，然最终还是回归到顺畅。这条爻辞的反命题也可以成立，即“无陂不平，无复不往”。这正反命题反映了事物发展变化的普遍性和永恒性，同时也反映了物极必反的观念。《系辞传》解释了《周易》经文中反映的观念，其上传说：“生生之谓易。”即万物新陈代谢，生生不已，这就是人们所看到的变化现象。其下传说：“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往者屈也，来者信（即伸）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这是由观察日月时辰的周而复始而推及其他事物的循环变化。

其次，量变到质变的观念。事物的发展变化是由微见著，渐进而成的。《周易》中每一卦从第一爻到第六爻都反映了变化过程，即事物从萌芽到变化的迹象显著，继续发展，进入深刻化、剧烈化，直至最后，超过了它最适宜发展的阶段，就走向它的反面。以《乾》卦为例，阳爻比作龙，象征刚健的阳气。

初九：“潜龙勿用。”潜龙，表示阳气初升。

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见龙在田，表示阳气出现在地面。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飞龙在天，表示阳气正盛，力量最充沛。

上九：“亢龙有悔。”亢龙，表示阳气过盛，到了顶，所以就会出现有悔，向衰退的方向发展。

《周易》中很多卦爻辞（如坤卦等）都阐述了“变起于征”，由渐变发展为突变的思想。

（3）交感相斥观念。恩格斯曾指出：“一切运动的基本形式都是接近和分离，收缩和膨胀。一句话，是吸引和排斥这一古老的两极对立。”^①《周易》把事物划分为阴阳两大类，它一方面看到了阴阳对立的矛盾关系，另一方面也看到了阴阳融合以及同阴（阳）交感和相斥关系。《系辞下》说：“天地絪縕，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这表明它由男女关系而推及万物，因此在《泰》卦彖传中说：“天地交而万物通”，《姤》卦彖传中说：

^①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十卷，第410页，人民出版社，1971年。

“天地相遇，品物成章也。”天地即指阴阳二气。阴阳交感而万物昌茂的观点也反映在卦爻辞中。举《泰》卦(䷊)，上坤下乾，其象为地在上，似乎与现实相悖。然而这意味着阳气在下而要上升，阴气在上而要下降，反映阴阳二气彼此吸引对流畅通，所以《泰》卦是表示吉的。与此相反，《否》卦(䷋)则象征阴阳二气阻隔，表示不顺利。其他如《咸》、《益》、《恒》、《既济》等卦都反映了阴阳交感的关系，所以都表示吉。

此外，《周易》还反映了同性相斥关系。如《小过》卦(䷽)艮下震上，外卦震和内卦艮都是阳卦，同性相斥。从卦象看，艮为山，为贤人。震为雷，为刑。从而意味着雷在山上，也象征刑加于贤人，所以是个凶卦。《周易》中交感观点反映了事物互相渗透、互相依存的关系，相斥观点则反映了互相排斥、互相分离的关系。

(三) 人的主观能动作用

古希腊哲学家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派，到斯多噶派，都曾不断思索人在宇宙中地位这一重大问题。到了中世纪，欧洲哲学家提出了“自由意志还是上帝恩典”的命题。然而在《周易》中我们的祖先一方面肯定了必须在客观外界条件许可的前提下，另一方面又充分肯定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系辞下》指出，“《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什么是人道呢？《说卦》说“立人之道曰仁曰义”。表现在每一卦中，三爻和上爻为天道，初爻和四爻为地道，三爻与五

爻为人道。如《既济》卦 ，此六爻中五二两爻最重要，凡阳爻居五，阴爻居二称作得中。这表示古人充分认识到自身的价值和作用，以得中表示人和，是逢吉的兆头。

如何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呢？《乾》卦象传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坤》卦象传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表明《周易》在突出天道健、地势坤（顺）的前提下，还强调君子要“自强不息”，要“厚德”。《乾·文言》还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这表明当时人们意识到既要加强个人德才修养，然而又不能违反自然规律，这是对人在自然界地位的一种正确的认识。

(四) 四维时空观

尽管在哲学上没有事物不存在于一定的时间中，然而在一般人看来，三维（长、宽、高）空间可以独立存在而无须依傍时间。而西方哲学家认为，

时间和空间是对立的，时间是向前变动的，空间可以静止不动。真正说明时间可以随着空间变动而变动，时空不可分离学说的是 20 世纪伟大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而在《周易》中却已经把时间融同于天地万物中。《丰》卦彖传说：“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贲》卦彖传：“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系辞上》中说：“变通莫大乎四时。”《周易》认为天地万物是循环变化，因而时间也不是抽象的直线前进，而是螺旋形发展。正如《系辞下》所说的“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当然《周易》的时空观也存在着不足的一面。如以八卦与四时八方相配。《震》卦的卦象为东方，为春天。《兑》为西方，为秋天，这种牵强附会的做法反映了当时认识上的局限性。

哲学是人类对世界根本看法的凝聚和积淀，是人类理论思维能力与水平的反映，我们从诞生于公元前 11 世纪的《周易》的哲学思想中看到古代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光辉，它那卓越的见解要领先于公元前 6 世纪前后的古希腊哲学。然而在长时期内很多人的心目中只是把《周易》视作占筮的工具，又加上其本身文字古奥艰涩，致使它在哲学上的成就如明珠蒙尘，久久未能广为人知。

第二节 我国古代易哲学研究纵述

自秦朝以来，《周易》一直受到很多人重视，并为不少学者潜心探索。我国古代很多哲学家都以《周易》为起点去阐述和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然而正如《系辞上》所说：“仁者见之谓之仁，知（智）者见之谓之知（智）。”作为固定客体的《周易》由不同哲学家从各自的角度去探索，可以编织出各具特色的理论体系。一部《周易》，可以从中窥视我国古代哲学探索的足迹。下面就按照历史的顺序把各个时代《周易》哲学研究的代表人物及其贡献简介如下。

汉代是易学发展的重要阶段，这个时期的易学后人称为汉易。汉代易学有三大派，第一派是以孟喜、京房为代表的官方易学，这一派也叫做象数派。第二派是费直为代表的义理派，多采用历史事件、伦理道德注释经传。第三派以黄老之学解释易学阴阳变化的道理。上述三派中以孟喜的象数派影响最大，可视作汉易的代表。

孟喜，字长卿，东海兰陵（今山东苍山兰陵镇）人，汉宣帝时为易学博士。京房（公元前 77—前 37），字君明，东郡顿丘（今河南清丰西南）人。曾向孟喜的门人焦延寿学易，汉元帝时立为博士。《汉书·本传》介绍，京

房精于占筮，所言屡中，得皇帝的宠幸，为尚书令五鹿充宗和中书令石显嫉妒，多方陷害，终于被杀害。孟京易学从《周易·说卦》中卦象以及爻位出发，按照重卦中上下卦象和阴阳爻位的关系去解释卦爻辞。从这个角度解释《周易》经传的通常称之为象数派。象，指卦象；数，爻数，易卦中各爻所居的位次，即爻位。在哲学上孟京易学是属于唯心主义范畴，然而也包含着辩证因素。我们说，易象和易数反映了人们对物质世界构成的认识，它和易理、易占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占筮虽然表示了人对未知世界的探索，然筮术和所占事物没有必然的联系。孟京易学突出了易的占筮功用，把简单的八卦卦象和阴阳爻象推及一切，预言人事灾变，发挥了《周易》神秘主义色彩，是唯心的。

孟京学派提出卦气说、纳甲说、八宫说等，以八卦与十二月、二十四节气、七十二物候相配，认为它们之间不单是外部联系，还存在某种内应，从而用《周易》的框架与日月星辰、四季物候、阴阳五行、人事等结合起来。这种做法开创了后世相面、风水、望气、圆梦、占星、奇门遁甲等巫术的先河，这也是唯心的。

孟京易学受西汉初今文经学大师董仲舒阴阳五行学说的重大影响。董仲舒（公元前179—前104），广川（今河北罗县西南）人。其哲学体系的核心是“天人感应说”。认为天对人间统治者经常用符瑞、灾异分别表示希望和谴责。而符瑞或灾异可分别用阳或阴表示。阳为德，阴为刑。孟京易学受此启发而提出阴阳二气说，认为“阴阳二气，天地相接，人事吉凶见乎其象，六位适变，八卦分焉”^①。又说：“从无人有，见灾于星辰，从有人无，见象于阴阳也。”^②从而把八卦与人事吉凶、灾变、星辰及阴阳联系在一起，宣扬了天人感应学说。这固然是唯心的，然而在哲学史上阴阳二气说有着一定的地位，因为它解释了世界本原及其变化规律，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变化，其基本法则即阴阳二气的运行，并反映在八卦、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中。

在汉易范畴还有《乾凿度》和《参同契》二书须特别提出。《乾凿度》属《易纬》一类。西汉时期把一批重要的儒家著作，如《诗》、《春秋》、《礼》、《尚书》、《周易》称作经书，于此相应出现了纬书。纬书是经意的衍生和解释。有《易经》，也就有相应的《易纬》。《乾凿度》作于西汉末，书名中“乾”的意思是天。“度”就是路，书名为开辟通天之路的意思。《乾

^① 文渊阁：《四库全书》，见《京氏易传》，上海古籍出版社。

^② 同上。

凿度》的哲学意义在于它不盲从《周易》“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世界模式，而提出了新的宇宙生成论。其图式为太易—太初—太始—太素—浑沦—天地—万物。太易是一种虚无寂静的状态，太初是“气之始”，到了太始阶段才有形可见，在太素阶段则已“形变而有质”。当气、形、质三者浑然一体而未分离，这就是浑沦，也叫做太极。太极一分为二，清轻者上为天，浊重者下为地。再由天地产生人和万物。在天地起源问题上，《周易》没有涉及到太极之前的状态，而《乾凿度》却提出源于太易，以及由无形到有形的一个变化过程。这一天体生成观念为后来道家 and 道教所吸收，并对宋明理学有一定影响。

《参同契》是公元2世纪时期东汉魏伯阳著的一部关于炼丹理论的书。书名中“参”即三，指易学，黄老之学和炼丹术；“同”即通；“契”即书契，篇名意思是关于三道（易学、黄老之学、炼丹术）相通的著作。此书把《周易》作为炼丹术的理论基础，反映在内容上有两大特点。①推崇乾坤坎离，以坎离为变易根源，结合炼丹，把鼎视为乾，釜为坤，水为坎，火为离。②吸收了西汉孟京易学的月体纳甲说，把日月时辰纳于八卦框架中，要求炼丹时炉火的火候要随月亮的盈虚和四时变化转移。《参同契》把易学和道教相结合，用阴阳八卦概念去阐述炼丹术，为易学另辟蹊径。

到了魏晋时代，盛行玄学，名士们崇尚清谈无为，往往以老庄思想糅合儒家经义，形成与西汉时期以阐述大义、议政为主的今文经学和侧重于义理训诂的古文经学完全不同的学风。在世风熏陶下，诞生了一位杰出的易学家王弼，他一改汉易以象数释经传的旧辙，大胆地运用老庄思想诠释《周易》经传，从而出现了一场易学大革命。王弼（公元226—249），字辅嗣，三国魏山阳（今河南焦作市）人，少年时即享盛名，才思敏捷，精于儒而又尚老庄。王弼易学具有两个特点。①用“得意忘象”的方法注释《周易》，也就是不涉及卦象而抓住其本质来谈，他在《周易略例·明象》中说：“义苟在健，何必马乎？类苟在顺，何必牛乎？爻苟和顺，何必坤乃为牛？义苟应健，何必乾乃为马。”众所周知，以八卦为框架的卦爻辞是反映人事中错综复杂关系，王弼撇开卦象去谈它的真意，这无异为《周易》的解释开辟了一个广阔的天地，这是从占筮中走出，意味着哲学和理性的胜利。因而王弼易学标志着《周易》义理学的诞生。②具有“援老入儒”的特色。举例说《坤》六二爻辞“直方大，不习，无不利”。王弼把“直方”解释为地体不动，其德至静。把“不习”解释为无为自然。他说：“居中得正，极于地质，任其自然，而物自生，不假修营，而功自成，故不习焉，而无不利。”这就是以老庄任其自然的无为思想解释爻辞的含义。在哲学上王弼易学是以抽象

的概念“无”为本体的客观唯心主义，历史上称其为“贵无派”。这个唯心主义体系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1) 世界本原为无的太极观。汉代经学大师郑玄以太极为元气，马融则以太极为北极星。然而王弼通过对筮法“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的新解释，把四十九根蓍草之数看成是天地万物，是“有”，而那不用的一根蓍草即是太极，也是世界的本原，即“无”。王弼以玄学观念解释“大衍之数”，这是既不同于汉易中以太极为原初物质的朴素唯物主义，也打击了《易纬》中的有神论，同时也是他以老庄释易理的钥匙。

(2) 王弼在解释《周易》时，把自然无为看成是最高品德，并把柔顺与虚无相提并论。他在解释《损》卦六五爻时说：“以柔居尊，而为损道。江海处下，百谷归之。”这充分表明了他以为虚无柔弱可以贯通万有的老庄哲学思想。

(3) 以静为本。王弼把静止看成是绝对的，动起于静，又归于静。他在《复》卦彖辞“复，其见天地之心乎”的注中说：“复者反本之谓也，天地以本为心者也。凡动息则静，静非对动者也。语息则默，默非对语者也。然则天地虽大，富有万物，雷动风行，运化万变，寂然至无，是其本矣。”王弼所说的“寂然至无”，从动静观上是寂然，也就是静；从有无观上是至无；从政治观上则是自然无为。

从上述可见，王弼的诠释中富含老庄义理。可惜他不幸短寿，年仅二十四岁就逝世，只注释了《周易》上下经六卷。隔了近一个世纪，遂有东晋韩伯（公元322—380，字康伯）循其路子，补充完成。韩康伯《系辞注》乃是王弼易学的发展。到唐代，孔颖达奉诏修撰《五经正义》，定用王弼注，将韩康伯注与其合在一起，名为《周易正义》，为唐代官修经籍，历宋元明清，直至今，研究者不乏其人。明末黄宗羲曾评论王弼在易学史上的贡献时说：“有魏王辅嗣出而注易，得意忘象，得象忘言，日时岁月，五气相推，悉皆摈落，多所不关，庶几潦水尽寒潭清矣。顾论者谓其以老庄解易，试谈其注，简当而无浮义，何曾笼络玄旨，故能远历于唐，发为正义。其廓清之功，不可泯也。”^①这一段话讲得十分中肯。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中一个安定繁荣的时期，文化事业得到总结继承和大的发展。这一时期出现了两部重要的易学著作，即孔颖达主编的《周易正义》和李鼎祚编的《周易集解》。

孔颖达（公元574—648），字冲远，冀州衡水（今属河北）人。初，唐

^① 黄宗羲：《象数论·序》，九州出版社，2007年。

太宗以为儒学师说多门，章句繁杂，遂命孔颖达编撰《五经正义》（《周易正义》即为其中之一）。《周易正义》基本上采王弼和韩康伯注，并为之疏，称为孔疏。然而并未排斥其他学派，如《子夏传》、《京房章句》、郑玄和王肃的注及南北朝易学家的观点，都是有选择地采纳。在体例上《周易正义》将义理和卦象结合起来以解释卦爻辞，从而纠正了王弼派鄙视取象的偏见。而且孔颖达还通过疏阐述了自己的哲学思想。他的哲学思想的关键是认为“无”为宇宙万物的本原。他说：“易之三义（简易、变易、不易），唯在于有。然有从无出，理则包无。”^①他认为易理包括有和无两方面。“无”指道的领域，是无形的。他在解释“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时说：“道是无体之名，形是有质之称，凡有从无而生，形由道而立，是先道而后形，自形内而下者谓之器也。形虽处道器两畔之际，形在器不在道也。”这种思想固然受到王弼易学的影响，但更多的是受佛学体用观的启示，与王弼的哲学终究有别。王弼从老庄哲学的角度去看，认为“无”是世界（包括易）万物的本原。而孔颖达扬弃了玄学理论，提出了以阴阳二气为核心的认识论，并认为卦画和卦爻象从属于阴阳二气及其变化的法则。由于阴阳二气及其变化是无有形体，所以说万物是从无形到有形，简称一切源于无。认为万物源于无形的阴阳二气的哲学思想为宋代易学的先导。

唐初经孔颖达用王弼本而作正义后，汉易学就荡然无复存，于是有著作郎李鼎祚感慨汉易学的废绝，亦不赞同王弼易学的玄虚，因此就汇集了子夏、孟喜、京房直至唐孔颖达等三十家易学说，编成《周易集解》，而书中主要以荀爽、虞翻、干宝的注解为多，这表明《周易集解》虽然说是采纳融合了易学中象数、义理两派之长，然又偏重于象数。同时此书不仅汇集了前人的观点，而且还掺杂了作者本人的注释和评论。作者的易学观中有两点是引人醒目的。^①继承汉唐的元气阴阳说以解释天地万物的起源。如汉《乾凿度》在解释宇宙起源时说：“乾坤安从而生，故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也。太易者未见气也，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气形质具而未离，故曰浑沦。浑沦者言万物相浑成而未相离，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无形畔，易变而为一，一变而为七，七变而为九。九者气变之究也。乃复变而为一。一者形变之始，清轻者上为天，浊重者下为地。物有始、有壮、有究，故三画而成乾。乾坤相并俱生，物有阴阳，因而重之，故六画而成卦。”李鼎祚在接受《乾凿度》观点

^① 孔颖达：《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第一·论易之三名），中华书局，1979年。

周易与中国文化

陈抟 $\begin{cases} \text{理学} \\ \text{象学} \end{cases}$ $\begin{cases} \text{穆修——李之才——邵雍} \\ \text{种放——许坚——范谔昌——周敦颐} \end{cases}$

64

据说太极图是汉朝河上公所作，原名无极图，汉末为魏伯阳所获，载于《参同契》。后为道人钟离权所得，传吕洞宾，吕传陈抟，又传至周敦颐。《太极图说》反映了周敦颐的宇宙观。这个图从上往下看，第一层无极而太极，代表万物起源。他认为太极是宇宙万物的本原，而它又是无极的，即无边际、无形、无时序。第二层是两个黑白相间的半圆，象征变化的规律。他说：“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整圆代表太极，两个半圆就是两仪，黑白相间象征阴阳、动静；半圆黑、半圆白象征动极而静，静极复动。从而揭示了事物对立矛盾而又统一的规律。第三层以五行表示构成世界的元素。第四层以阴阳二气交感说明万物形成的原理。第五层即万物化生。

邵雍（公元1010—1077），字尧夫，河南洛阳人，他建立了易学中的先天象数学，通过排列卦位，制定了六十四卦方图和圆图。方图是一分为二，再循等比级数而成（见图3-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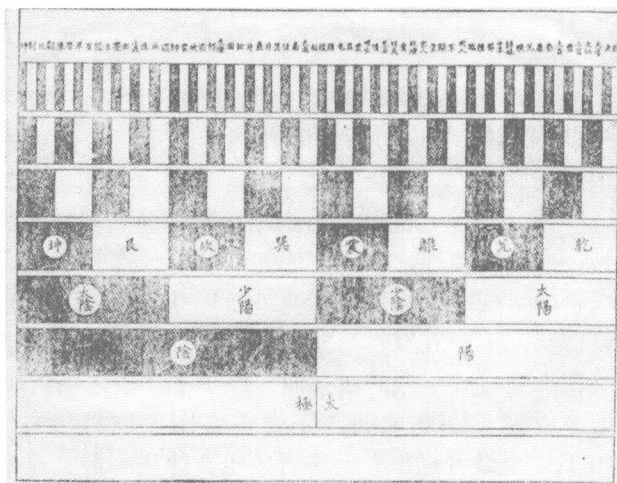


图3-2-2 六十四卦方图

圆图是将方图切断，复将两半折成半圆，合成一圈（见图3-2-3）。

为什么邵雍称上图为先天图呢？他认为文字记录的《周易》只是后天的易，而在它之前就有一部无字天书——《易》，卦图即是先天的无字的天书。邵雍的易哲学包含有辩证法的内容，他也认为宇宙的本原是太极，天生于动，地生于静，动静阴阳是对立的统一体。然而他又认为天地万物的生成变化是按先天象数的图式展开的。他的先天图是汉易卦气说的继续和发展，把神秘的数看成是一种主宰力量，去说明天地起源和万物变化的必然性，这当然是唯心的。至于先天象数从何诞生呢？他把它归之于心。说“先天之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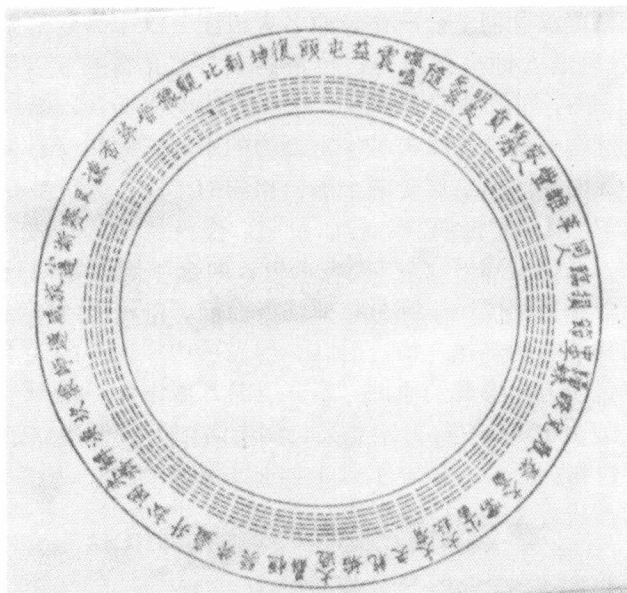


图 3-2-3 六十四卦圆图

心也”。这些主观唯心主义学说对后世陆九渊、王守仁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哲学派别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与此同时，二程（程颢、程颐）特别是小程却循义理学的路数，迥异于王弼援老庄入易，而弘扬儒理，从而使他的易学不仅在哲学上，而且在儒学史上竖起了一块新的里程碑。程颐（公元 1033—1107），字正叔，河南洛阳人，出身于官僚世家，十四五岁时与兄同拜师于周敦颐。在政治上程颐有变革之愿，却又站在王安石改革派的对立面，终于受党争之祸。1097 年被贬到四川涪州，交地方管制。在此期间，完成了名作《周易传》。他在《周易传·序》中提出了“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哲学观点。他以为事物最根本的是“理”，也就是“体”，它不会被感觉到，所以是“微”。而世间展现在人们面前的一切事物，包括八卦、六十四卦的卦画，都是“理”的象，它们由“理”派生，并为人所感觉到，所以称“用”，也称“显”。理与象，体与用，微与显是互相分裂而又互相联系的，所以说“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由此在哲学上程颐建立了一个以理为本、为体的理学唯心主义体系，视“理”为最高范畴，以“理”为世界本原。他认为道即是理，是形而上的，阴阳之气是形而下的。道不等于阴阳，而是阴阳之所以然，这表明他认为对立统一是世界形成的客观规律。程氏《周易传》的另一显著特点是把理引申到伦理道德范畴，借《周易》而大力宣传忠孝节义思想。如：

(1) 忠君。“阴，从阳者也，待唱而后和。臣道亦然。君令臣行，劳于事者，臣之职也。”（《坤》卦辞注）

(2) 君推诚以任下。“上下之志通，朝廷之泰也。”（《泰》卦辞注）

(3) 存天理，灭人欲。“人之妄动，由有欲也。”（《无妄》六三爻注）“天下之害，无不由末之胜也。峻宇雕墙，本于宫室；酒池肉林，本于饮食；淫酷残忍，本于刑罚；穷兵黩武，本于征讨；凡人欲之过者，皆本于奉养，其流之弊，则为害矣。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后人流于末者，人欲也。损之义，损人欲以复天理而已。”（《损》卦辞注）

(4) 男尊女卑。“男女有尊卑之序，夫妇有倡随之礼，此常理也。”（《归妹》彖辞注）

由于程氏《周易传》浓厚的道学气，使它在封建社会中长期受到青睐。

张载（公元1020—1077），大梁（今河南开封）人，是北宋五子之一，他是二程的表叔，然而他们的哲学观点是不同的。冯友兰先生说：“程颢代表道学中心学的一派，程颐代表道学中理学的一派。可以说张载的一派是气学。心学和理学是道学中的唯心主义，气学是道学中的唯物主义。”^① 张载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代气一元论哲学。他说：“气之聚散于太虚，犹冰凝释于水，太虚即气。”^② 又说：“气块然太虚，升降飞扬，未尝止息。”^③ 他把万物的运动变化看作是太虚，也就是气不止的“升降飞扬”，这个“气能一有无”，他说的“有无”是指有形与无形、聚与散、实与虚等形态。这表明气既是一种物质存在，然而又是“一物两体”，其另一方面即无形、散、虚。在哲学史上先秦儒家以无，道家以道为最高实体，而张载认为所谓无、所谓道都是气，从而揭示了世界统一性在于物质性、物质于运动的内在联系，建立了气一元论的哲学体系，开辟了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哲学的新阶段。明代王廷相指出，张载的“太虚即气”的理论是“阐造化之秘，明人性之源，开后世学之功大矣。”《横渠易说》尽管是张载早年的著作，却奠定了他的思想基础。到了晚年，他在尽毕生之力而著作的《正蒙》中继续发挥了以气为本的光辉哲学思想。

南宋出现了杰出的思想家朱熹。朱熹（公元1130—1200），徽州婺源

①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五编，第五十三章，第一节，人民出版社，1978年。

②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八册，《横渠易说》，第73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③ 同上书，第750页。

人。他不仅继承发展了程颐以理为最高范畴的观点，而且机械地采纳了邵雍、周敦颐运用图象的做法，并吸收、改造了张载关于世界统一于气的思想，系统地论述了理气关系。朱熹一生著作丰富，要探讨其在易学上的建树则要研究其所作的《周易本义》、《易学启蒙》和《朱子语类》中有关易学的部分。从研究方法上看，朱熹是走融合易学中义理和象数两派的路子，通过象数来阐明义理，又以义理来解释象数，互相发明，相得益彰。他在《周易本义》篇首列有“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等九个图，就是与邵雍六十四卦方图和圆图同出一辙。更重要的是朱熹认为“太极者，其理也”^①。“其理则所谓道。”^②于是把这个“理”，也就是“道”，视作万物赖以存在的本原——太极。而理存在的形式便是气，理和气是无形与有形、本性与具体的关系。他说“阴阳迭运者，气也，”^③又说“天地之间，一气而已。分而为二，则为阴阳，而五行造化，万物始终”^④。这就阐明了理必须依赖气而生成万物，而气又一分为阴阳二气，是对立而动静不息。这便是朱熹融合程颐理学说、张载气学说而构架出的新的宇宙生成理论。然而，朱熹所提出的理在气先，理是超物质的绝对的精神实体，则就陷入了唯心主义。

中国古代哲学发展到宋代，可谓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从北宋五子到南宋朱熹，是在更完全的意义上完成了儒家对《周易》的阐发。从元到清，探索《周易》者依然络绎不绝，其中杰出者有元代蒙族学者保巴，明代来知德。到了清代，主要以训诂为务，名家如惠栋、张惠言、焦循之伦，注家自然也借《易》立论，寓托自己的思想，然而在哲学上却未能如宋儒一样显示出夺目的光辉。

① 《易学精华》，见朱熹：《周易本义·系辞上》，第十一章，齐鲁书社，1990年。

② 《易学精华》，朱熹：《周易本义·系辞上》，第五章，齐鲁书社，1990年。

③ 同上。

④ 朱熹：《易学启蒙》，中国书社，2008年。

第四章

《周易》与治国

《周易》的伟大意义不仅体现在哲学上，而且还表现在政治方面。远古时代人们对于政治就已经有一定的认识，积累了一些经验。《周易》反映了那个时期人们对政治的某些看法。之后，历代学者在注述《周易》时，又不断地借此宣扬政治见解。这即是《周易》所蕴含的政治观，它对我国历代封建王朝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节 《周易》天人感应说对政治的作用

《周易》对后世统治者以最大影响的方面莫过于它的顺天应时而天人和諧，然后导致国泰民安的观念了，从《周易》一书产生的背景和功用来说，它是我国最早的研究和追求天人和諧的一本著作。在那个时期，人类处于对自然界及其规律，以至对自身都不甚了解的阶段，对天既充满着敬畏，同时又积极地观察、探索，对广瀚的星空有着丰富的想象。《诗经》中有一段：“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皖彼牵牛，不以服箱……维南有箕。载翕其舌。维北有斗，西柄之揭。”^① 这一段诗大意是说：天上有银河，它像镜子般发出亮光。银河畔有三颗星，那就是传说中的织女。她每日都在织布机旁，虽然天天不离开，却织不成布匹。再看那对岸的亮星，就是传说中的牛郎，他也没有驾牛拉车……南天上有箕星，仿佛缩着舌头把嘴张；北天边有斗星，斗柄西翘，仿佛有人握斗柄舀向

^① 孔颖达：《十三经注疏》，《诗经·小雅·大东》，中华书局，1979年。

东方。从《诗经》中的诗句反映出当时的人们把星宿都看成是有意志的，天上有着一个神的王国。《诗经》中的不少诗篇（包括上述所引）产生于西周初年，这正是《周易》萌生时期。因而也就表明，当时古人在探索易理，构筑《周易》的时候，他们就认为上天是有意志的，对天充满着敬畏，由此形成了原始的宗教观。其崇拜的对象主要就是自然界的各种事物和现象，如日、月、星辰、山、川、湖泽、风、雷、水、火等，同时把日、月、星辰、湖泽、风、雷归于天，把山、川、湖泽归于地。认为宇宙中有天道、地道、人道三大范畴，天地间自然界各类物的运动和世事的变化发展是相应的，而且前者显示着天意，倘若人违背了天意，不能与之同步，必将一事无成。这就是《周易》所宣扬的天人感应说。所以《周易》中提出“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这说明了《周易》主要在于概括并反映天地之道。其《系辞上》说：“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其《系辞下》又说：“《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这些话同时指出《周易》反映了天、地、人三道的变化，其《系辞上》说：“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三极，即天、地、人。其《系辞下》又说：“天地设位，圣人成能。”意思是说，圣人循照、效法天地之道，以成就并发挥其才能。因而《周易》最初的功能就是运用八卦去探索天道，领悟天的旨意，以为只要“自天佑之，吉无不利”^①。

《周易》中天人相应、天人和谐的观念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呢？首先表现在“天道至尊”。《周易》六十四卦以乾卦为首，乾即天之代指，其卦辞说“元亨利贞”，就是在赞美上天有善、美、利物、贞正之德。其彖辞又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这一段彖辞也是对天的热情歌颂。翻译过来，其意是：伟大啊，天德之善，万物有了它才有始源，一切都归属于天。天上有云行雨降，万物在它的滋润下，始能在宇宙间运动变化。太阳在天空中东升西没，由此才能确定上下四方和昼夜时辰。上天会有种种变化，而万物（包括人）都受到天道变化的支配，须适应天道的变化而运动。因此保持和促进天道的正常、调谐，乃能普利万物。从某方面来说，由天而始生万物，有万物才能使人类得以生存，也就是使万国都安定下来。这就是乾卦彖辞的大意。《周易》经与传中有关尊天的辞句还有很多。仅从六十四卦以乾为首的次序以及乾卦辞、彖辞的内容来看，就能清楚地体会到《周易》以天道为主的尊天意

^① 孔颖达：《十三经注疏》，《周易·系辞上》，中华书局，1979年。

识，正如其《系辞下》所说“乾坤，其易之门邪”。

其次，《周易》肯定了天道的客观存在，同时又肯定了日月星辰的运行以及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是无形的天道在变化中给人类所显示出来的有形的表现。遗憾的是《周易》经文中没有描绘出一幅天国的图象，然而这一点欠缺正好被《尚书·尧典》中的一段话间接地补上了。《尧典》说：“舜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遂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山川，遍群神。”马融注：“上帝太乙神，在紫微宫，天之最尊者。”这说明在舜前后时期，已经出现上帝太乙神的形象。关于六宗，《古尚书》说：“天地神之尊者，谓天宗三，地宗三。天宗日月星辰，地宗岱山河海。”通过《尚书·尧典》这段话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人们对周围世界的认识。我们知道，《周易》在上古时代用于巫士祭天祀祖或狩猎征伐等大事前祈求上苍的旨意，其祈求的对象正是《尧典》中所介绍的诸神。这表明《周易》天道的背后有着一个神的世界。

最后，《周易》宣扬了天人和谐的观点。古人对日月星辰和山川河海的信仰反映了他们对人间福祸休咎的宗教观。《左传》昭公元年说：“山川之神，则水旱疠疫之灾，于是乎禘之。日月星辰之神，则雪、霜、风、雨之不时，于是乎禘之。”古人把一切灾异看作是天意之所为，是对人间的示警，因而人就应该改革政治和修身治家。人类对自身的这种控约称之为人道。只有人道适应天道，才能使国家治理安定，上面介绍的乾卦彖辞就清晰地阐明了这一点。其《系辞上》也说：“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而《系辞下》又说：“天地之道，贞观者也。”意思说：天地之道，是以其规律显示给人。以上两句话明确地指出，天与人是相沟通的，是应该和谐的。

几千年来，《周易》的天人感应说一直为后世的封建统治者所迷信、宣扬，他们利用来源于原始社会的对天体的自然崇拜，以及由此形成的民族心理积淀，以此证明其政体制度是以天体模式为榜样，其一切行为都是替天行道。正如德国人类学家恩斯特·卡西尔在他著名的《人论》中所说的“为了组织人的政治的、社会的和道德的生活，转向天上被证明是必要的。似乎没有任何人类现象能解释它自身”。要借助于“天”这种“充满魔术般的神圣的和恶魔般的力量”。他还说：“如果人首先把它的眼光指向天上，那并不是为了满足单纯的理智好奇心，人在天上所寻找的乃是他自己的倒影和他那人的世界的秩序。”恩斯特·卡西尔的这一席话道破了天人感应学说的政治实质。在我国历史上历代统治者就是这样，往往借天象作为改朝换代的借口，或作为平治天下的依据。数千年来，统治者都称自己是“真命天子”，竭力证明君权神授，以维护君权的神圣性。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翻开史籍，会发现几乎每个开国君主都有着神奇的履历，似乎他们的登基都是天意所归，

是冥冥中注定的。据《史记·周本纪》，周天子的先祖后稷名弃，他的母亲叫姜嫄，是有邰氏之女，为帝喾的元妃。（帝喾是传说中上古的三皇五帝之一）有一次，姜嫄到野外，看到一个巨人的脚印，心中突然涌起一股激动，不由自主地去踩了那个脚印，之后就感到腹中动了一下，好像怀孕似的。过了一周年，果然生下一个男婴。当时以为生得不明不白，很不吉利，就想把他扔了。谁知丢到小巷中，牛马走过时都绕开而不踩他。转丢掉荒林中，又刚好被林中的人发现而送回来。之后丢在结冰的河面上，谁知会有鸟群用翅膀覆盖着他。姜嫄以为这些都是上天的旨意，终于把他抱回养起来，取名为弃。弃长大后，果然做出一系列惊天动地的事，领导一个民族昌盛强大，使其后人最终获得天下。周统治者之所以要神化发生在其祖先身旁的这一连串怪事，其目的就是为了说明他们这一支是受上天青睐保佑的。

到了汉代，司马迁又是这样介绍汉高祖刘邦的诞生。刘邦的父亲叫刘太公，母亲叫刘媪。当初，刘媪在湖畔休息，梦中与天神遇合，那时天昏地黑，雷电交加，刘太公前往探看，只见蛟龙盘踞在那儿。不久，刘媪怀孕，生下刘邦。刘邦的相貌有点像龙，头长鼻子高，身上有七十二颗黑痣。据说这七十二颗黑痣就是赤帝（象征火德）七十二日征兆。司马迁不但写刘邦诞生奇异，相貌奇特，而且登基也是早有先兆。一次，刘邦押送数十名罚做苦工的囚徒，半途中刘邦把他们都放了，自己也准备流亡他乡。结果还是有十几人愿意跟着刘邦一起走。于是大伙儿喝了不少酒，赶夜路，并派一人在前边问路。不久，走在前边的折回说，路上有一条大蛇，走不通了。这时刘邦趁着酒劲，鼓勇上前，拔剑斩蛇为二，率领大伙儿走了。后来有人走过斩蛇的地方，见到一个老妇人半夜里哭。有人就问她为何哭？老妇人说，有人杀了我的儿子，所以要哭。有人又问她，你儿子又是什么原因被杀呢？老妇人说：我儿是天上白帝之子，化为蛇卧在路中，现在被赤帝子杀了。听的人以为老妇人在讲谎话，正要打她，而她突然消失了。以上故事出自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司马迁生活在西汉武帝时期，距高祖刘邦约一世纪。生前蒙武帝宫刑的奇耻大辱，对汉王室不存厚爱，不寄幻想。他作为我国封建社会中杰出的史学家，采录史料还是比较严肃的，尽管这样，他还是接受了天人感应说的影响，以刘媪遇龙产子和刘邦斩白蛇的离奇故事来宣传刘邦是真命天子。从司马迁的笔下我们感受到了天人感应说深厚的社会基础，这也正是古代很多历史学家共同的悲剧性之所在。

东汉光武帝刘秀的诞生也充满了神奇色彩。刘秀是汉高祖刘邦九世孙，他的父亲名钦，曾任济阳令。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钦妻于济阳官署生下刘秀。临产时，红光笼罩室内，刘钦感到异乎寻常，就请卜者王长。王长占

卜后，马上叫左右的人避开，对刘钦说：“此兆大大吉，但现在还不宜说出来。”就在这一年，济阳县内出现祥瑞，有的稻一株长出九穗。过了很久，有一个擅长望气的人叫苏伯阿，他担任王莽的使者，来到南阳，当他远远地望着春陵城时，叹着气说：“那儿有一股昌盛的王者之气。”后来，天下群雄纷起，战火不绝，苏伯阿又回到春陵，远远地看到县衙南有一道明亮的火光，直冲天空，一会儿就消失了。另外，当时的道士西门君惠、李守等也都预言，刘秀将来要当天子。所以《后汉书》上这样说，每一个注定要当王的人必然会有某种符命，以象征天意，否则他们又怎能够乘时龙而御天呢？“时乘六龙以御天”是《周易》乾卦彖辞中的一句，在《后汉书》中是指登上王位。从秦汉到明清，围绕着君王像这样的故事举不胜举。

中国古代帝王除了编造有关自己的神话，还把触角伸向广垠的天空，面对着满天星星，他们按照自己的愿望，一一与人间事件相对应，从而把天人感应学说编织得更加完善。我国的天文学诞生得很早，《诗经·豳风·七月》（成作于西周初年）中就有“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句，大意是七月份（夏历）大火星向西偏斜，九月深秋，寒风初起，就要妇女们缝制冬衣。可见当时已把观察到的星象变化与季节联系在一起。古人最关心的是夜空中央的一颗明星，叫北极星，古时又称帝星。《史记·天官书》说：“中官天极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太一神，即太乙，又称上帝，其所在星区为紫微垣。古代帝王就说自己上应帝星，因而帝星的亮晦就成了下界君王命运的指示仪。《后汉书·严光传》有一个故事，说刘秀登基为皇时，他早年的朋友严光就开始躲着他。后来，地方上呈报严光隐居的地方，刘秀就命人请严光进京。两人叙旧，感情还是很融洽的，于是晚上共卧一床。半夜，严光的脚伸到了刘秀肚子上。第二天就有太史禀报：“昨夜，客星侵犯皇上的星座。”刘秀听后大笑，并说明这是与严光共寝所造成的。

与此同时，文武百官也纷纷在星象中找到了自己的归宿，甚至连平民百姓也彻底接受了天人感应说，长久以来在民间传说中，一直流传着北宋年间的包公是文曲星下凡，狄青是武曲星转世，即是明例。又如在《儒林外史》范进中举一节中，当胡屠户为了治好刚中举的女婿范进的失心疯，不得已而打了他一巴掌，之后马上想到举人老爷是天上文曲星下凡，是断断打不得的，想到这里，刚才那只打人的手就特别痛起来了。《儒林外史》作为文学小说是民风民俗的反映，自然暴露了当时的民众心态。我们可以说，迷信在各个时期都是世世承袭，直至解放初，还有不少老年人相信，天上一颗星陨落，意味着世上要少一个人。甚至到21世纪初还有不少青年喜欢把自己的生辰和星座相对应，以讨取某种吉利（见下表）。

出生时间	对应星座	特 征
12月23日—元月20日	山羊座	严格认真，一丝不苟
1月21日—2月18日	宝瓶座	有才干，工作能力高
2月19日—3月20日	双鱼座	天分特别深厚，才华出众
3月21日—4月20日	白羊座	十分善良，使人容易接近
4月21日—5月21日	金牛座	很有吸引力，光芒四射
5月22日—6月22日	双子座	小事糊涂，大事精明，可有成就
6月23日—7月23日	巨蟹座	有时太老实，受人欺骗，没有责任感
7月24日—8月23日	狮子座	才艺纵横，不可一世
8月24日—9月23日	处女座	永远有足够的金钱，不为金钱烦恼
9月24日—10月24日	天秤座	十分愚蠢，只会受人利用
10月25日—11月23日	天蝎座	有小聪明，会耍些小诡计
11月24日—12月23日	人马座	爱提问题，做事十分谨慎

以上例子说明，民众中浓重的迷信习俗，正是天人感应说得以生存的深厚土壤，这也是历代统治者借此以达到政治目的的本源和有利条件，也是我们文化中的历史和现状。

董仲舒曾说：“为人君者，取象于天。”^①在我国历史上，统治者还把各大政区与天上二十八宿相对应，这一点在世界天文史上恐怕也是独一无二的。初唐文学家王勃《滕王阁序》中写道：“南昌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其中翼和轸，都是二十八宿中的星宿名，这两组星宿和下界的楚地对应。以上四句古文是说，南昌于汉代属豫章郡，在唐代又改辖于洪州府，其地上应翼轸二星的分野，同时与衡山和庐山相邻。我国古代诗文中，时时出现以星宿代地域的，这一点是我们在阅读古籍时必须注意的。

除此之外，古代帝王在考虑国都的格局上亦模拟星象。如公元前11世纪，西方周民族首领武王击败东方强大的殷部族，统一中原，建立周朝。为了加强对新占领区的统治，需要重建国都。周武王以为选择城址的原则应该

^① 董仲舒：《春秋繁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是“定天保，依天室”^①，定天保就是要肯定获得上天对自己的保佑，依天室就是依照上天星象排列的模式。这个模式也就是以帝星（北极星）为中心的紫微垣的模式。于是他“南望过于三涂，北望过于有岳，丕愿瞻过于河宛。瞻于伊洛，无远天室”^②。也就是说，他在伊水和洛水流域找到了理想中的城址，认为那一带处于天下八方之中央。于是兴工建新都，一直到成王时期，新都告竣，它就是今天洛阳的前身。

其实，帝王无论是把自己上应帝星，还是按天体模式建都，或对应下界政区，都是在追求天人之间的和谐，用功利眼光去看，其政治目的是很明显的。而且他们应用的范围是很广泛的。他们不仅把一代君王的崛起归功于天，亦把一代君王的覆灭归因于天。如周幽王二年，泾、渭、洛三川堤岸崩塌，堵塞河道，周太史伯阳甫就预言，周将要灭亡了。他以为天地万物都有一定的秩序，秩序乱就意味着民变。现在三川堵塞，是阳（山）失去其正常的位置，而填在阴（河）上，表示阴阳之序乱，这样国家一定灭亡。从前伊水、洛水枯竭，造成夏朝灭亡；黄河水枯竭，而商朝灭亡。今天周天子的政德像夏桀殷纣一样，一个国家所依靠的是山川，山崩川竭，亡国的征兆。周的灭亡就在这十年左右的时间。《诗经·小雅·十月之交》亦记述了这一历史性的灾难，并抒发了诗人对时政的忧虑。诗中写道：“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国无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则维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惩。”诗意说：日月告人灾凶，因为不按它的轨道运行。四方诸国没有善政，不用它的善良之臣。那月光蚀了，就是它的常道。这日光蚀了，奈何这样不好。闪闪发光的大雷电，还有地震，这是天下不安、政治不善之征。百川如沸水腾涌，山顶忽破碎下崩，高岸下陷变为深谷，深谷突起变为丘陵。可怜如今之人，怎么曾不自警。

同样是周幽王时期的自然灾害，西汉刘向用易理作出另一种解释。他说泾渭洛三川枯竭，岐山崩是阳失在阴的反映。阳指火，火气上升，煎枯水，所以川枯竭。山水是连在一起的，下竭上崩，这是必然的。而幽王残暴，随意杀戮臣下，又迷上褒姒，废弃正后，这正是阳失在阴、下竭上崩的表现，因此王后的父亲申后就要联合犬戎，一起攻杀幽王。

以上我们可以看到，古人是很迷信的，往往把事物变化的结果归因于天象。这种思维在今天大多数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然而在古代却很普遍。正

① 《逸周书·度邑》，抱经堂刊本，1786年。

② 同上。

如列维·布留尔在《原始思维》中所说：“假如一个人在路上走着，看见一条蛇从树上掉到他面前，即使他明天或者在下星期才知道他的儿子在昆士兰死了，他也一定会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华夏古人也循着与此相同的思维规律，把历史大事一一与天象联系起来。《汉书·五行志》中就大量记载了这类故事。值得注意的是，汉易学中存在着一个重要流派象数派，其代表人物是孟喜和京房，他们用易理阴阳变化的观念，去观察分析事物的变化，同时与人事吉凶结合起来。象数易学就是天人感应说在易学范围的运用和衍生，上千年来它一直是易学中的重要流派，具有重大的社会影响。

古代统治者不仅仅是被动地把个人、政区、皇都乃至政治事件与天象联系在一起，还往往主动地借天象实现其政治目标。当他们看到一个政治集团失去民心时，把它说成有违天命，以作为改朝换代的借口。如公元前16世纪商部族首领汤（大乙）看到夏王桀暴虐无道，人民怨声不绝，于是决定攻打夏桀。临战前，他假借天意鼓舞士气，说：“格尔众庶，悉听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尔有众，汝曰：‘我后不恤众，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闻汝众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①这一段文字十分深奥难懂，翻译成白话文，其意是：来吧，你们众位都听我说。不是我小子敢犯上作乱！因为夏国犯下许多罪行，天帝命我消灭它。现在你们这群人说“我们的君王不怜悯我们，荒废我们的农事，为什么要去征伐夏国呢？”我虽然听到了你们的议论，但是夏氏有罪，我畏惧上帝，不敢不去征伐啊。由于汤用天命作号召，是正义之师，终于在鸣条（今山西运城安邑镇）之野战胜夏桀。《革》卦彖传也引用这一历史事件，说：“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这里“顺乎天”就是顺应天命。

又如公元206年，秦帝国处于崩溃前夕，反秦起义风起云涌。这时有项羽和刘邦分别率领部队分两路直插秦都咸阳。项羽的军队在巨鹿和秦军主力遭遇，经力战，秦军三主将相继投降，秦军主力损失殆尽。而刘邦却绕过主战场，轻易地直奔关中。十月，兵临咸阳城下，就在这时，天空中出现五星聚井的景象。《汉书·高帝纪》载：“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东井，沛公至霸上。”五星即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井，是井宿。其所在的天区是秦的分野。古人对五星聚在一起是十分忌讳的，认为它预示着与所在分野相应之国将要灭亡。《汉书·天文志》说：“凡月食五星，其国皆亡。”又说：“五星若合，是谓易行。有德受庆，改立王者，掩有四方，子孙蕃昌。亡

^① 孔颖达：《十三经注疏》，《尚书·汤誓》，中华书局，1979年。

(无)德受罚，离其国家，灭其宗庙，百姓离去，被满四方。”因此，五星聚井就意味着秦国将亡，刘氏兴起的天意。这一自然现象无异是鼓舞了刘邦将士的士气，也是一封迫使秦投降的哀的美敦书。于是“秦王子婴素车白马，系颈以组，封皇帝玺符节，降枳道旁”^①。

公元960年（显德七年）的又一次天象也促成了北宋帝国的建立。那年，北汉勾结辽国（契丹）侵犯后周。周恭帝柴宗训命执掌兵权的殿前都检点赵匡胤率兵抵抗，兵马驻扎在陈桥驿（今开封东北）。那天，天空中出现两个太阳，其周围有一圈黑光，而且两个太阳之间摩擦动荡了很久。这时赵普、石守信、苗训等人见机行事，借天象宣传后周帝幼，不谙国事，应立新主。到半夜五鼓时分，他们煽动军士，拥立赵匡胤，黄袍加身。于是全军班师回京，迫周恭帝禅位。试问，倘若不借天象以称天意，怎能在不损一兵一卒的情况下实行国家权力的和平过渡。

《贲》卦彖传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从而指明了观天文以指导人文的原则。所以历代统治者“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②，其目的是“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③是为了治乱存亡，以达到德化天下。因此，他们经常借天象为由而颁布政令，减轻赋税徭役，缓和社会矛盾。如汉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十一月晦出现日蚀，十二月望又有日蚀。于是文帝说，上天创造了众生，并为他们设置君王而加以抚育。可是君王没有好的德性，颁布政令不能均顾到百姓，所以上天就降灾以惩戒他管理不善。现在连续出现日蚀，是没有比这更严重的灾祸了。我获得祖宗的福佑，以平凡之身而当万民之主，天下的安定危乱，皆系于我一人。今天我没有把天下治理好，以致日月星辰都失去光辉，我的过失是很大的。你们应该告诉我的过失和做得不够的地方，要举荐一批有才能而道德完备，而且是正直敢说的人才，以纠正我的过失。同时还应该少征徭役，节省费用，以减轻百姓负担。历史上的汉文帝正是如其本人所言，对民采取生养休息政策，从而创造出在我国历史上被称作“文景之治”的太平时代。

贞观八年（公元634年），陇右山崩，多次出现大蛇，而山东和江淮一带发大水。唐太宗就询问秘书监虞世南，虞回答说：春秋时晋国的梁山崩，晋景公曾询问大夫伯宗。伯宗说，山川好比一国之主，所以山崩川竭，国君就要撤去音乐，不穿华美的衣服，改坐最简朴的车辆，还要以币为礼祭山川

① 司马迁：《汉书·高帝纪》，中华书局，1972年。

② 孔颖达：《十三经注疏》，《周易·系辞下》，中华书局，1979年。

③ 同上。

之神，今天梁山就是晋国之主。晋景公照伯宗的话办，后来果然无害。再说汉文帝元年，齐楚一带三十九座山同一天崩塌，还发生洪水，文帝就下令所有诸侯国都免交贡品，所以天下人，无论远近都高兴，因而也就没有酿成灾害。后汉灵帝时期青蛇出现在御座旁；晋惠帝时齐地曾有一条三百步长的大蛇，从集市游进官府大堂。按理说蛇应在野外，然而它游到集市和官府大堂上，这就成怪了。现在陇右一带发现大蛇，那是出没于深山大泽，是自然现象，不足为怪。再说山东一带的雨，虽然按常规来看，不算过分，然而阴雨连绵是阴气弥盛的表现，恐怕有冤狱，对在押囚犯应多加省察，及时断决，这或许就是上天的旨意了。一般说来，妖异是不能胜过善德的，只要施德济人就可以消除灾变。唐太宗认为虞世南分析得很有理，于是就派人去救济灾民，清查案件，肃清吏治。众所周知，唐太宗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君主，贞观年间是封建社会中罕有的政治清明的时期之一。形成贞观之治的因素是复杂的，然而我们不能不看到，统治阶段为追求天人和谐而作出的政治改革也是其中一个因素。

当然，统治者不会全部借天灾以约束自己，往往用天灾作借口去消灭政治上的对手。在他们看来，这是一种难得而又光明正大的理由了。如晁错，他是西汉文景时期杰出的政治家，为巩固中央政权，想方设法削弱藩镇势力，由此得罪了不少诸侯国王。景帝二年八月，出现彗星。秋，衡山一带降大冰雹。荧惑（即火星）也一反平时运行轨道，出现在北极星（帝星）附近。月亮运行也经过北极星，而岁星则逆行到天庭（太微垣）。在古代星占术中，太微垣天区好比是上帝的屏藩，所以岁星犯天庭，就意味着有人威胁到君王的安危。于是吴王濞等七国诸侯就以上述天象为由，打着清君侧的旗号，表面上把矛头针对景帝身旁的御史大夫晁错，而其根本目的则要抢权夺位。不幸的是，为巩固国家安定统一的政治家晁错却成了这场争斗的牺牲品。

唐代杰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也差点遭受晁错的下场。《新唐书·方技传》说，初唐有两位著名的星相家，一个叫李淳风，另一个叫袁天纲。袁天纲曾给武则天一家相过面。说武则天龙瞳凤颈，有天子之相。就在当时，唐太宗得到一个秘谶，说唐朝将会衰弱，之后有姓武的女子当王。于是他拿这个谶语找李淳风商量对策。李说，这个预兆已经出现，而且这个女子早已在宫中，她要等到四十年后才能当皇，并杀戮王室子孙。唐太宗希望把她找出来杀掉。李说，这是天意，是无法铲除的。而且一旦处理不妥，隐患没有除掉，反而会滥杀无辜。再说这个女子是皇上所亲近的人，当她再过四十年也已老了，那时她自然会有一种仁慈之心，虽然她会在短期内改变国号，但最

终还是不会断送大唐江山。反过来，倘若我们今天把她杀了，四十年之后就会出现一个年轻的女篡位人，那时她逞起性子，还要杀更多的人。那样的话唐王室的子孙倒是真的要绝种了。于是唐太宗接受了李淳风的意见，终于使武则天躲过了一次死的威胁。这个故事听起来很神奇，却是史书上真正有记载的，而且在民间流传很广，甚至20世纪在80年代的电视连续剧《武则天》中都有被引用。

天人感应是伴随着人类诞生而形成的一种古老观念，从根本上说，在人类发展史上天人感应说的出现是人类没有能充分认识自己，也没有能充分认识自然界及其规律的结果，是科学和理性没有能完全战胜迷信的结果。然而，我们应该理解人不能超越历史背景和当时的认识条件而行动，天人感应说在一定的历史阶段，能加强一个民族内部的凝聚力，往往成为一个国家政治改进的催化剂，促进了一个民族的进步，我们不能不承认它对历史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在世界范围内，任何民族都自然地经历过这个过程，只是滞留的时间各有长短。从天人感应到科学民主这是人类认识上的一个飞跃，尽管从上古三代直至晚清，天人感应的影晌一直盘踞在华夏大地，甚至在今天，在某些阴暗的角落中它仍未被清除，但是对今天的大多数人来说，他们终究是普及了科学常识，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武器。

第二节 《周易》贯穿了哪些治国经验

自古以来学者们都称易学为经世之学，比如孔颖达在《周易正义·序》中说：“故《易》者，所以断天地，理人伦，而明王道也。”肯定了《周易》在经纶治国方面的巨大作用。今天管理科学已成为大至国家、小至企事业是否发达兴盛的关键，因此，积极探讨并利用《周易》中蕴含的治世经验就成为令人瞩目的课题。

（一）以民为本的进步政治观

《尚书·周官》上说：“论道经邦，燮理阴阳。”意思说：经营管理一国政之政，最重要的便是要不断协调理顺阴阳的关系。《周易》中阴阳有多重取象，如阳指君、父、夫、君子、刚实、壮大等，阴为臣、子、妻、小人、柔虚、弱小等，而其中主要的便是指人际关系。由于人的因素，《周易》中的阴阳不仅是对立关系，而且也同时有着交感关系，即共生又互相影响的关系。《周易》的作者深明此理，于是提出了以民为本的观念，这在上古社会是进步的政治观。其《革》卦彖传说：“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

时，大矣哉。”指出了成汤革夏桀，周武王革殷纣，不仅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划，更重要的是顺应百姓的愿望，吊民伐罪，所以它是正义之师，从而肯定了以民众利益为上的判断是非的准则。在《泰》、《否》两卦彖传中，再次指出《泰》“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否》则“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从而说明执政者倘若和百姓缺乏一种和谐关系（即上下不交），那就等于失去了国家。

为什么《周易》能关注到民众利益呢？这是由于以往的残酷统治激起了民众猛烈的反抗，《坤·文言》说：“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来者渐矣。”民众通过暴力给执政者留下了深刻教训，为自己争得了权利。我国从先秦至清，很多统治者从《周易》获得以民为本的治国道理，薄敛简役，省刑宽政，皆促进了社会一个时期的繁荣和文明，如汉文景之治、唐贞观之治、明洪武之治，以及清康熙盛世。而统治者反其道而行之，就一定导致身死国灭、丧权辱国。这个规律不仅适用于古代中国，也同样符合世界政治，在此我们不妨举加勒比海的海地和非洲津巴布韦两国的政局为例。

海地，根据印第安古语，意思是“多山的地方”，它是西印度群岛中的一个国。它自1804年独立以来，历届政府都专制腐败，占海地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民，绝大部分没有土地，文盲占全国人数百分之八十五，首都太子港，失业人数达全市人口的半数以上，使一个风光明媚，四季皆夏的美丽岛屿，到处流浪着乞丐，到处充满着悲惨和饥饿的呻吟，同时也造成了政局的动荡不安。至今联合国维和部队（其中有中国维和部队）仍在为维持社会秩序而努力。海地的贫困状况一直绵延至今，据2008年4月新闻报道，海地“部分饥民甚至以用土、植物油和盐做成的饼充饥，饥民围攻总统府，要求总统下台”^①。而当今非洲津巴布韦局势也如此，津巴布韦在班图语中是石头城的意思，它是南部非洲的一个古国，公元1199年前后形成中央集权国家，1890年沦为英国殖民地，称作罗德西亚。1980年穆加贝领导的民盟获胜，取得国家独立，定名为津巴布韦共和国。该国自然资源丰富，工农业基础较好，享有南部非洲“粮仓”的美誉。穆加贝总统也是民族独立运动领导人，建国伊始，就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并多次访华。但由于执政党任人唯亲，官僚贪污腐败，政策失误，致使通货膨胀达到100000%的高倍数，

^① 《海地“吃饭难，总统很麻烦”》，载《南方日报》，2008年4月10日国际版。

印出了高达 5000 万的世界最大面额钞票。^① 人民基本生活受到严重损害，一块面包卖到 10 万津元，失业率高达 60%，2008 年 2 月 14 日首都哈拉雷的妇女发起示威游行，要求充足的食物供给，国内出现了极其不稳的政治局面，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 2008 年 4 月 1 日发表声明：“对津巴布韦大选后局势表示密切关注。”^② 以上这些当代事例同样说明一个问题，民众利益（尤其是物质利益）高于一切。然而作为存在数千年前的《周易》早已明确指出这个道理，《剥》卦象传指出：“上以厚下安宅。”意思说，执政者应该有宽待百姓的心意，也要有安定百姓的行动。今天无论科技如何进步，生活资料如何变迁，但这条政治准则颠扑不破。今天中国就踏踏实实执行了这条治国方针，几年来，政府一贯把民生问题放在首位，不断出台关于减免农业税等一系列支农政策，以及让广大民众受惠的政策，从而确保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二）刚柔相济的安人之道

《孟子·公孙丑》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因此，一国的安定，三军之强大，一个公司的发达，其关键在于人际关系。《咸》卦象传说：“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这说明它意识到人心所向的巨大意义。但如何掌握人心，这是一门艺术，《周易》给了我们许多宝贵的经验。

（1）知人善任。《乾》卦用九爻：“见群龙无首，吉。”这里的“群龙无首”，不是说无管辖，而是说“群龙”（实指人）在一种充分自由的环境中舒展才能，所以是吉。这就要求领导人对其下属的控御不仅刚健有力、冷静、客观，而不是咄咄逼人，强人所为。这样上下才能和衷共济，自然就大吉大利。《水浒》中梁山泊英雄的故事就很能说明问题。梁山的第一任大首领本是落泊文人白衣秀士王伦，由于他心胸狭窄，时时提防别人来抢位夺权，因此容不下才能高强之士，结果在竞争中被人杀了。第二任大首领晁盖，不幸战死。只有继任者宋江凭借水泊梁山，带着一帮武艺非凡的英雄，做下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宋江本为刀笔小吏，论条件并不优于王伦，也远逊手下的任何一位首领，但却当上了第一号寨主，其原因就是他为人疏财好义，人称“及时雨”，而且又礼贤下士，能团结人，凝聚人心。历史上这种现象是很普遍的，如刘邦，他用兵不如韩信，勇不如樊哙，谋不及张良、

① 《5000 万！世界最大面额钞票》，载《南方日报》，2008 年 4 月国际版。

② 《联合国秘书长对津巴布韦大选后局势表示密切关注》，摘自中国新闻网 2008 年 4 月 2 日。

萧何，但是却能率汉军击溃楚霸王项羽，这又是什么原因呢？那就是韩信一针见血指出的，刘邦“善于将将”。

(2) 下观而化。就是说作为执政者应尽力作出表率，让百姓观摩，从而产生同化作用。其原文出自《观》卦象传：“盥而不荐，有孚颙若，下观而化也。”意思是说，国君祭神时，尽管只灌酒而不献牲，但是其心是诚的，态度是肃敬的，这就为百姓提供了一个观摩学习的榜样。我国历史上有很多君主深明此理，并贯彻在实际行动中。如史载：西汉文帝时期，有臣子上疏请求造一座露台（亦称凉台），文帝考虑到露台仅供赏景消闲，可有可无，而耗费巨大，于是下诏免建。当时皇家后宫内“躬服节俭，绋衣不弊，革鞜不穿。大厦不居，木器无文。于是后宫贱玳瑁而疏珠玕，却翡翠之饰，除雕琢之巧”^①。由于皇上以身作则，形成了整个社会的良好风气，带来了一代的安定和繁荣。又如清康熙年间，朝廷急需钱粮以应付庞大的军费，便下令各地官府清点所欠赋税的名册。当时江南巡抚朱治国一次举报苏州等四府共有13 517名文武缙绅欠赋。清廷下令一律褫夺功名，将其中3000人押送京城深查，其余的由地方上处理。在这一次被肃查的对象中有苏州昆山人叶方霭，是顺治己亥科探花，只欠赋折银一厘，也被革去功名。他颇感不平，上疏陈情说：“所欠一厘，准今制钱一文也。”竟也得不到宽免。由于清政府敢于向统治集团内部“挤脓疮”，这就给天下百姓作出广告，起到了令行禁止，闻风而动的良效。今天廉政建设已成为各国政府的重要施政措施，而领导带头则是根本。《渐》卦象传说：“君子以居贤德善俗。”其意思说：君子本身有好的品德，以此形成好的风俗。以上事例说明“下观而化”律将放射永恒的光芒。

(3) 明罚敕法。众所周知，法律是维护国家安定的武器。《噬嗑》卦象传提出“先王以明罚敕法”的主张，在《丰》卦象传再次提出，“君子以折狱致刑”。意思是说：君子应该在刑罚严明的原则下，判决讼狱，施行刑罚。表明在上古时期人们已经认识到法律安定人心、调动人的积极因素，或控制制裁不良行为的作用。历代统治者把这点作为治国的重要措施。如公元前684年的春天，齐国派大军进攻弱小的鲁国，鲁军被迫应战。这时鲁国有一位叫曹刿的谋士主动要求入伍抗敌。出发前他问鲁庄公：“你凭什么去战胜敌人呢？”庄公说：“我经常把吃的穿的施舍给百姓。”曹刿说：“小恩小惠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百姓也不会个个听你的。”庄公又说：“每次祭祀时，

^①（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杨雄：《长杨赋》，中华书局，1977年。

我都诚心诚意，祭品也是丰厚，决不以少报多。”曹刿说：“这也只是小小的信用，神不会相信，也不会保佑你。”最后庄公说：“我对大大小小的讼狱案件，一直都是很认真，很公正的。”这时曹刿才作了肯定，说：“这很好，凭这点就能动员士兵去作战。”后来果然凭着曹刿正确的战术和士卒高昂的斗志击溃了强大的齐军，这场战役也成为我国历史上弱军战胜强敌的著名战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司法公正是上下齐心的重要因素。一个社会的内部，因职务、经济、文化诸因素，人群中出现等差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人的心理可以承受的，但这种等差抹杀不了人在法律面前的平等权利，这就是俗语“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道理。一般来说，人不会甘心屈从枉法中的腐败，因此徇私舞弊必然会出现群情汹涌，酿成激变。《周易》针对这种社会现象，就提出了不徇私情的政见。其《随》卦初九爻：“官有渝，贞吉，出门交有功。”北宋程颐解释道：“官，主守也。既有所随，是其所主守有变易也，故曰官有渝。贞吉，所随得正则吉也，有渝而不得正，乃过动也。出门交有功，人心所从多所亲爱者也。常人之情，爱之则见其是，恶之则见其非，故妻孥之言，虽失而多从，所憎之言，虽然为恶也。苟以亲爱而随之，则是私情所与，岂合正理，故出门而交则有功也。出门谓非私匿，交不以私，故其随当而有功。”在这里程颐通过《周易》告诫执政者要办事公正，不可偏听偏信，增加透明度。这段话至今尚有深刻的教育意义，提醒人们建设一个现代化的文明国家，必须健全法制，严惩某些阶层的不法行为，这应是执政者首举之务。

(4) 注意政策的稳定性。众所周知，朝令夕改，反复无常，将使百姓无所适从，这乃是治国的又一大忌讳。在这点上《周易》又为后人提供了成功的政治经验。《恒》卦彖传说：“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其象传又说：“君子以立不易方。”这里“道”和“方”指的就是政策，我们可以从正反两方面来漫谈政策稳定的社会效应。战国时期商鞅（公孙氏、名鞅，卫国人，亦称卫鞅。后封于商，故名）准备在秦国掀起一场政治改革，为了取信于百姓，表示自己坚持改革的态度，就在官署外竖立一根木杆，出告示，宣布凡有人将此木移立至某处，即可获银若干。开始时，围观者以为是戏言，大多无动于衷。但后来还是有人相信，就按照规定搬移木杆，果真获得重赏。此时百姓方知商鞅令出如山，铁定不改。此后，商鞅两次实行变法，百姓都深信不疑而执行无误，获得巨大成功，使地处偏僻的秦国很快富强起来，为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相反，南宋时期著名的民族英雄岳飞却因朝廷的优柔寡断，战略的反复变化而痛失战机。公元1140年金国兀术大举南侵，岳飞奉旨抗击，在河南朱仙镇大败金军主力。当时两河百姓纷起响应，彻底

击溃金军，收复失地指日可待，然而当时的皇帝宋高宗心怀鬼胎，惧怕被金人掳去的北宋钦、徽二帝返朝争夺帝位，又怕将领和民众力量过于强大而胁迫朝廷，同时受内奸秦桧之挑拨，遂改变主意，召回岳飞，并以“莫须有”的罪名冤杀，这无疑自毁长城，使得南宋收复失地的希望毁于一旦，从此南宋只能偏安一隅，国力日趋衰亡，最后被蒙古人攻灭。从秦强而南宋亡的事例，深刻说明：坚定不移地执行正确政策，是与国家利益息息相关，这对今天来说，仍然没有失去意义。

（三）理财正辞，以经济为杠杆

《周易·系辞下》说：“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为义。”意思是：一个国家能够把人民团结起来而不涣散的，就要依靠经济实力。所以，治理经济，颁布和施行正确的经济制度是完全正当的。这是我国最早的关于经济问题的著名论断之一。我国历史上由于连年灾荒和战乱，导致国家经济崩溃，财政极端困难，经常出现饿殍遍地，百姓流离失所、社会动荡不定的现象。历史的教训使后世的执政者对《周易》的这一论述有深刻的体会，从而致力于经济发展，以求国家的长治久安。当然，《周易》并不是经济著作，它并没有提出理财的具体措施，而是在原则上指出了理财的方向。其主要观点如下：

（1）确保民众的基本生活需要。中国有一句成语叫铤而走险，是说人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必然被迫走上冒险的道路。因此保证民众有基本的生活资料就成为治国首要考虑的问题，在这方面《周易》提出“保民”的观念。《临》卦象传说：“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意思是：君子应该无穷无休地教化和思念百姓，应该无穷无边地接纳并抚育百姓。保民应达到什么程度？在此我们不妨引战国时期思想家孟子的一席话来作注。孟子说：“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①由此可见，保民最终落实在生产资料的分配上。这个观念与不顾民众死活，横征暴敛，竭泽而渔的酷政相比，终究是前进了一大步。

（2）实行宽松政策，给民众以较多的经济上的好处。《周易》中多次提出关心民众的意识，如《夬》卦象传说：“君子以施禄及下。”意思是：聪明睿智的人应该把利禄分一部分给民众。在《益》卦彖传中再次指出：“损

^① 孔颖达：《十三经注疏》，孟轲：《孟子·齐桓晋文之事章》，中华书局，1979年。

上益下，民说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意思是：把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分一部分给百姓，百姓就会感到无限高兴。只要统治者关注民众，它的前途就光明宽广。而《谦》卦象传则说：“君子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意思是：聪明睿智的人应该从财物多的人身上取出一部分给财物少和无财物的人，称量其财物的多少，以定其公平的施予。在这里我们不准备深入探索《周易》中为什么富含着这些蕴着哲理的论断，但不可否认，《周易》作者以远大的目光去看待和调整两个对立阶级的经济关系，其目的在于长治久安。随着《周易》作为儒家经典之首地位的确立，这一思想对后世执政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西汉文帝时期与民生养休息，实行三十税一的政策，这与其他时期的什一税相比是大大地低了，就是在今天来看，这也是不高的税率。又如历史上经常出现统治者为了鼓励百姓开拓边疆，垦殖荒田，往往在一个时期内免征赋徭，从而形成了民富国强的良性循环。相反，倘若只是把民众看作是征收对象，认为多征必然多得，于是不惜杀鸡取蛋，其结果反而是民贫国敝。因此执政者必须明白欲取之，必先予之。好比种庄稼，肥多方能丰收，《周易》就是清晰地指明了这个道理。

(3) 倡导节俭，并将其制度化。发展经济的原则就是开源节流，《周易》中多次谈到“节”的问题。如《否》卦象传：“君子以俭德避难，不可荣以禄。”意思是：执政者应崇尚俭朴，以避祸难，不可为利禄所诱惑。《颐》卦象传又说：“君子……节饮食。”告诫执政者不要大吃大喝。这些忠告出自数千年前我国最早的一部卜筮之书，以此对照当今光怪陆离的社会，更能使读者领悟到《周易》千古永恒的价值。在漫长的岁月中，有多少人醉生梦死，又有多少人深受易理的熏陶，以俭为美，洁身自好，无愧地走自己的人生道路。

《周易》谈俭，还注意从制度化去认识俭的效果。其《节》卦象传说：“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意思说：从社会效果考虑在财经管理上有制度，那么富贵者也就无法骄奢伤财，而百姓也不会遭横征暴敛的骚扰。这一论断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由于经济是国家机器的原动力，因此经济管理的好坏严重影响着国家的盛衰。而我国古代历朝赋税徭役大多名目繁杂，数量偏重。由于没有统一的规章制度，征收赋役时经常层层加码，带有随意性，这自然加重了百姓的负担。于是在唐建中年间采用“两税法”，即分夏秋两次征税，此法一直沿用到明中叶。明中叶又改成“一条鞭法”，即把赋役合并，均可用银两折税，这表明古代在税收（经济管理的一个方面）领域是在不断改进制度的。然而又要看到，由于封建社会的腐败，这些制度在执行时都打了很大的折扣，今天如何在制度上落实节俭，仍然是公众迫切关注的热

点。以往由于“一长拍板制”，又尚未完成严格的审计制度的监督，造成暂时的过失，这也是不允掩饰的，问题在于改正。正如《益》卦象传说所说：“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

《周易》虽然讲节俭，但也注意到不克扣必要的消费。《小过》象传：“小过，君子……用过乎俭。”它以为人节俭过了头就变成吝啬，这也是一种小的过失。从上我们再次发现《周易》观察思考问题充满了辩证法。

（四）设险守国，反对穷兵黩武

古代把用兵放在治国的最重要事项之一。《周易》是讲和平的，一方面它强调以德化人，提出“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①，认为“孚乃化邦”^②，即依靠诚信去治理改变国家，这不仅是对本国民众，也包括对周邻国家，如《比》卦象传说：“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就是提倡睦邻。而《观》卦象传又说：“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提出了国君应巡视邦国，观察民情，推行教化的方针。另一方面它主张以守为主，决不首开边衅。《坎》卦象传说：“天险，不可升也。地险，山川丘陵也。王公设险，以守其国。”这是告诫后世统治者应利用本国之有利地形作为防御工事，用以守卫国家。之后在《萃》卦象传又说：“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强调维修好军器装备，随时准备应付意外的来敌。《周易》的这些观念是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反映。我们的祖先生活在富饶的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流域，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早在五千年前就已迈进了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无需依靠刀剑去觅取生活资料。中华民族是一个温和、好礼的民族，虽然历史上我们也曾无数次用兵，《周易》师卦就是专门谈军事的，然其中六爻就有三爻都是凶。如初六爻“师出以律，否臧，凶”。意思是军队行动要注意纪律，纪律差了，就有凶险；又六三爻“师或舆尸，凶”。意思是打仗就会有伤亡，是一件凶险的事；又六五爻“长子帅师，弟子舆尸，贞，凶”。意思说，用人稍不当，也是凶。这表明古人认识到用兵终究不是大吉大利的事，是很危险的。从全书看，《周易》六十四卦的卦、爻辞中大约还有十七处提到征战，而有十二处指出征的结果是凶，竟占了百分之七十。那么对战争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夬》卦卦辞说：“有厉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意思是：边境上传来发生冲突危机的报告，发兵出征是不吉利的，但派人去协商妥善解决，则是吉利的。又如《渐》卦九三爻“夫征不复，凶，

① 孔颖达：《十三经注疏》，《周易·咸》（卦象传），中华书局，1979年。

② 《周易·中孚》（卦象传），见孔颖达：《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79年。

利御寇”，《蒙》卦上九爻“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这些都表明古人深刻地意识到：靠和平解决争端比诉诸武力好，设险守卫比出兵征伐好。这些都是深邃睿智的观念，它一直深深地影响着后世执政者。历史上我们始终把在国内推行王道教化，对少数民族和周邻国家则采取和平共处、睦邻友好作为主要的国策，这已经形成了一种民族精神。倘若追本溯源，这种精神与《周易》还有些缘分，我想每一个中国人不论其政治信仰如何，都不会感到意外吧。

《周易》中介绍的治政经验还有很多，如《讼》卦象传：“君子以作事谋始。”这是从工作方法上要求人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有一个良好的开端；《遁》卦象传：“君子以远小人。”这是告诫执政者要注意阿谀奉承之佞臣；《大畜》卦象传：“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这是告诫执政者要注意认清前朝政治之得失，以改进国政。以上可以看到，《周易》从宏观的、哲学的广阔视野看到了国家的根本利益，提出了长治久安的各种措施，它以其丰富的内涵，受到了后世政治家们高度的重视。

第五章

《周易》与人生

《周易》对我们的影响虽然尚不能说无时无刻不在，但也确实可以说是息息相关。正如孔子所说：“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① 因此我们在生活中时时感受到易的影响。

第一节 反映在国民性上的《周易》的光斑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周易》往往是我们的行为准则，其作用不亚于国外的《圣经》和《古兰经》。千百年来《周易》中的许多观念一直左右着民众的思想，从而使整个民族都形成了有别于其他民族的鲜明特性，这也是人们常津津乐道的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这些传统包括哪些方面？《周易》又如何为我们提供了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下面将简要地予以介绍。

（一）中庸精神

中庸精神是古代的一种道德标准，主张待人处事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它既是处世方法，又是一种哲学意识。从《周易》来说，认为刚柔相济、阴阳调和就是中，它通过三句格言反映了其中所蕴含的中庸思想。

（1）中行独复。这句格言出自《复》卦六四爻。中行，就是按中庸的精神办事。独复，可理解为排除干扰，独自追求真理。

（2）中以自考。这句格言出自《复》卦六五爻。宋代政治家王安石指

^① 孔颖达：《十三经注疏》《周易·系辞上》，中华书局，1979年。

出，这句的精髓在于用中庸的精神来成就自己，考察自己。

(3) 中吉终凶。这句格言出自《讼》卦卦辞。讼，轻为争吵，重即是今日之打官司。结合本卦，“中吉终凶”有什么深层的意义呢？唐代孔颖达说：不可轻率地与人争吵，一定要有事实。一旦在道理上亏输之后，要赶紧停下来，那么还是好的，倘若坚持下去，就必然获凶。到了宋代，程颐又告诫后人，与人争吵，一定要有正当的理由，否则就是诬妄，就会遇到凶。有争吵表明有矛盾而没有得到解决，在这种情形下，必须保持中（不偏激）的态度，那么就会吉，否则矛盾僵持下去得不到解决，就会出现凶。这句格言教导人们争吵必须适可而止，有息事宁人之义。

从上述看出，《周易》教导人们，应以中庸的精神来约束自己，这样就可以表现出一种雍容大度的气概。今天人们均处于一个激烈竞争的环境中，何以能不为外界迷惑而保持一种轻松愉快的心态呢，这大概需要汲取易学中所倡导的中庸精神了。

（二）修辞立其诚

修辞立其诚这句话出自《乾·文言》，意思是：无论说话，还是著书，都应该讲实话，而决不可违心。这句话千百年来一直成为我国知识分子的座右铭，从秉笔直书的良史董狐和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到明代敢于上疏弹劾奸相严嵩的铮铮铁汉杨继盛，我国历史上奉本句为至理名言的人举不胜举。下面我们继续以魏徵、包拯两位历史人物的事迹为例。

魏徵（公元580—643），字玄成，馆陶（今属河北）人，唐初政治家。唐太宗即位，擢为谏议大夫。他积极参与朝政，据实直谏，尽管有时唐太宗一时间难以接受，然魏徵以国家利益为重，不避风险，前后陈谏二百余事。其出于公心而从不苟同的正真品格得到了唐太宗的赞赏。《新唐书·魏徵传》说：“帝（唐太宗）后临朝，叹曰：‘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朕尝宝此三鉴，内防己过，今魏徵逝，一鉴亡矣！’”

包拯（公元999—1062），字希仁，北宋庐州合肥（今属安徽）人。他在开封府任上时，以廉洁著称，执法严峻，不畏权贵。当时称为“关节不到，由阎罗老包”。他的事迹长期流传民间，并成为小说、戏曲的题材。如著名的戏曲节目《秦香莲》，描述了包公为了替含冤抱屈的民妇秦香莲讨回公道，敢于逆太后懿旨，斩杀忘恩负义、嫌贫爱富的当朝驸马陈世美。

以上两人，前者以直谏闻名，这是对君皇负责；后者敢于面对强权，为民申冤，皆万古流芳。

（三）任劳任怨、谦虚宽容的精神

这可以说是《周易》重点阐述的问题中的一个。《谦》卦卦辞“谦，亨，君子有终”，意思是：谦虚，那么行事就亨通，君子就会得到好的结果。然后《谦》卦彖传进一步解释：天的规律，由于日月普照大地，风雨滋润大地，所以是光明的。大地的规律，由于它处于低位，所以能和天气相交，生成万物。天的规律是日中下降，月满渐亏。地的规律是丘高则损，地洼渐平。连鬼神也是损害盈满而保佑谦虚，人们更是厌恶自满而喜爱谦虚。因此一个人只要有谦虚的品德，那么当他处在尊贵的地位会更加光荣，即使是处在普通的位置上，也不会遭人凌辱。接着《谦》卦诸爻深入探讨了各种情况下谦虚所形成的社会效果。如：

初六：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吉。

意思是：谦而又谦，君子能持此品德，那么即使遇上像经历大川这样的险阻，也会获得吉。

六二：鸣谦，贞吉。

意思是：有了名望而仍然谦虚，那么前途一定是正常，不会碰上意外，而获得吉。

九三：劳谦，君子有终，吉。

意思是：有了功劳而依然谦虚，那么君子就会有好结果，而获得吉。

六四：无不利，撝谦。

意思是：把德惠施给他人，而自己仍然保持谦虚的品性，那么做事就会无所不利。

这就是二千多年前的《周易》留给后人的令人深思的一段话。从上可以看到，《谦》卦就是一篇精辟的合乎辩证思想的道德论。

除了《谦》卦之外，《损》与《益》这一组对立的卦之间的关系实质上也歌颂了一种谦虚宽容的美德。古人在研究《周易》时，往往超越了文字而深入其精髓，从中探索出一些待人接物、立身处世的道理。比如孔子就曾说过：“自损者益，自益者缺。”他以为《损》卦就是教导人们平时可吃点亏，而《益》卦则象征世上某些人为自己扩权增利。事实上社会规律表明：凡是谦逊宽厚者则得人心，也必将在身心和事业上都受益；相反日常斤斤计较，事事都想占人便宜者则处处惹人厌，到头来终究是要吃大亏的。孔子就是通过《损》与《益》二卦为世人点明了这一朴素的真理。

（四）提倡正直高尚的品德

这也是《周易》精神中很重要的一条。拿《坤》卦来说，彖传曰：“坤

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这就是教诲人们，要像大地一样有宽厚的胸怀，能包容万物，要有无限高尚的美德，把仁爱洒遍天下，那样就一切都顺利。历代的学者也都是从这个角度去阐述《坤》的精神。如南宋著名思想家、易学家朱熹在解释《坤》卦六二爻“直方大，不习无不利”这一句时说：人只要在品性上内直外方，具备很多优点，那么他就会无往而不利。到了清代，又一位易学家陈梦雷（曾任皇子胤祉侍读，著《周易浅述》）在解《坤》卦六三爻象传时说：“盖天下唯能含者乃能发，圭角浅露，不可有为矣。唯知光大者乃能含暗昧不明、妄自炫耀矣。大知光明者不事匿名晦迹，而骄矜不形。涵养深沉者不用见事风生，而事业自远。”^①他的意思是：天下只有蕴含深厚之德的人才能有远大前程。有些人像玉质的圭角一般，他的德仅仅是一些表象，那是不可能有所作为的。只有在思想境界上深远广大的人方能理解到世人那些蒙昧无知，妄自炫耀的陋习。只有智慧丰富、品德高尚的人才不去干那些躲躲闪闪而见不得人的事，才不会表现出那种骄傲自满的形象。而具有高度涵养的人也就不会一见鸡毛蒜皮的小事就风风火火、毛毛糙糙，而他的事业却自然而然地获得极大的发展。以上这些话在我们今天听来都是很顺耳的，真可谓金玉良言。

世上的人最鄙视那些看风使舵、有奶便是娘的势利的小人。孔子曾借《周易》痛斥这种卑劣行径。《吕氏春秋·慎行篇》记载：“孔子卜，得《贲》。孔子曰：‘不吉。’子贡曰：‘夫《贲》亦好矣，何不为吉乎？’孔子曰：‘夫白而白，黑而黑，夫《贲》又何好矣！’”这是一个饶有风趣而又耐人寻思的故事。贲，它的字义是饰。所以《周易·序卦》指出：“《贲》者，饰也。”从《周易》的文字表面来看，《贲》是吉卦，所以孔子的学生子贡说：“夫《贲》亦好矣。”然而孔子为什么却说它不吉呢？这就反映了孔子宁折不屈的刚直品性以及他所提倡的道德标准，他心目中是就是是，非就是非，而《贲》卦就好比是文过饰非，所以他就跳出了《周易》的传统框限，鲜明地表达了个人的观点。通过这件事，由孔子学易启发我们，应时时联系实际去探索易理。

（五）仁爱精神

宣扬人类之间仁爱的精神也是《周易》的核心思想之一，并把它作为完成个人修养，促进社会进步的动力。我们可以从好几个卦中找到这种精神。如《乾·文言》说：“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又说：“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辩

^① 陈梦雷：《周易浅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在《系辞下》曰：“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以上三句都指明君子的行为应该以仁为准则。

按儒家学说，仁的核心就是爱人。但如何启发人类的爱心呢？《周易》中虽然没有系统性的作答，然总观全书，可归纳出下面几个方面。

首先，发扬人与人之间相亲相爱精神。《系辞上》引用了孔子的一句话“三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它就颂扬了人际团结互助的精神。之外，《泰》初九爻说：“拔茅茹以其汇，征吉。”这一爻以田中连批地拔草作比喻，说明人类无论做什么事，都必须关注到周围的人。《周易》通过上面这两段话，阐述了仁爱的基础，即团结、互助。其次，执政者应该“以贵下贱”^①，就是说放下架子，多体察关心民众的疾苦。最后则是多做善事。《坤·文言》告诫世人：“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进而在《系辞下》又说：“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这两段话虽然带有因果宿命论的色彩，其实还是充分反映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律，尤其是清楚地指明世人不愿为善的思想根源，指明了世人从小患开始酿成灭身大祸的必然结果。这些话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人都教育意义。

在教导人如何立身处世方面，《周易》中蕴含着很多发人深省的哲理和格言。然而我们还必须看到，这部上古时代所流传下来的宏著自然是反映了古人的道德意识，但也因此《周易》留给我们的就不可能都是精华，不可避免地残留着某些糟粕，它自然会给我们带来某些副作用。

《周易》中最明显的负面是等级观念。它首先从政治地位上把人划分为贵贱两级。《系辞上》：“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它以天高地卑的形势比喻执政者与民众的等级，并由此进一步把人分为小人和君子，《周易》中小人指的是政治地位低贱的人，君子则是贵族诸侯。（后世从道德修养上将“小人与君子”作衍生）《周易》还从乾坤、阴阳的关系去解释人的等级，企图论证这种观念的合理性，并在很多卦爻辞中指明，君子与小人其所处的地位不同，其待遇等亦有差别，表现了对小人的极大蔑视和苛求，反映了当时社会小人和君子对立的客观现实。如：

“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师》卦上六爻）

“包承，小人吉，大人否。”（《否》卦六二爻）

^① 孔颖达：《十三经注疏》，《周易·屯》卦初九爻象辞，中华书局，1979年。

“休否，大人吉。”（《否》卦九五爻）

“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大有》卦九三爻）

“童观，小人无咎，君子吝。”（《观》卦初六爻）

“硕果不食，君子得舆，小人剥庐。”（《剥》卦上九爻）

“好遁，君子吉，小人否。”（《遁》卦九四爻）

以上七爻中，“小人”与“大君”、“大人”、“公”、“君子”对称，很明显他们的利益也完全相反。

之外，《周易》要求民众绝对服从。《坤·文言》指出：“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终。”这里“地道”、“妻道”、“臣道”都指的是百姓服从君王，认为臣民不可能有所成就，然而只要依靠君王，也会有好的前程。

我们说等级观念或许是高等生物的一种本能意识，人类自然也未能超脱。但是在人类历史上，僵死的等级制度是奴隶时代、封建时代的产物，它严重约束了社会主体——民众的活性。《周易》正是带着这种鲜明的时代性，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阻碍了我国社会的发展，我们不妨举例以说明这种观念在历史上所造成的流弊。

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自诞生以来，就存在某些差异。而人类飞跃起自16世纪，这时处于早期资本主义的欧洲平民阶层就通过资产阶级革命，从国王贵族、教会僧侣的黑暗中破茧而出，跻身社会主流，通过工业革命，掀起资本发展的大潮，向世界各个角落进军，从此人类走上了高速发展的轨道。而就是在这关键时刻中华民族落伍了。同期的明清时代，尽管我们不是没有资本主义的萌芽，然而它被以皇帝、官僚、地主的等级体制摧残了。官本位以及重农轻商的情结把资本与其持有人逼进了一个死胡同。

再说中庸观念，当然有其长处，但不妨说，它也是平均主义、委曲求全、消极避世等种种落后意识的宿因。《乾·文言》：“子曰：‘龙，德而隐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这就是儒家诠释《周易》时所介绍的消极避世思想，它长期左右着我国士大夫的言行。如《后汉书·向长传》曰：向长，字子平，“性尚中和，好通《老》、《易》，读《易》至《损》、《益》卦，喟然叹曰：吾已知富不如贫，贵不如贱，但未知死何如生耳。”这位向平正是从《周易》勘破人生，到了中年，待子女嫁娶之事毕，就不再努力世务，恣游五岳名山，最后不知死在何年何处。我国有不少成语，如“安步当车”、“淡泊名利”等，固然从某种角度看来有好的一面，然而从另一角度去想，似乎缺乏一种对人生的进取精神，这其中就有受易理影响的因素。《系

辞下》说：“往者屈也，来者信（伸）也。屈信（伸）相感，而利生焉。”这是在教人委曲求全。我们应正视《周易》对人心理上造成的某些消极因素。

《周易》的第三个重大缺陷便是其中所蕴涵的保守怀旧思想，这种思想常常被历史上的顽固保守势力用作思想武器，成为社会进步的阻力。《恒》卦上六爻：“振恒，凶。”明代易学家来知德就这样解释：“振恒者，振动其恒也。如宋时祖宗本有恒久之法度，王安石以祖宗不足法，乃纷改旧制，正所谓振恒也。凶者，不惟不能成事而反愤事也。”^①他认为：“振恒”就是改革，他不赞同。在我国历史上，像来知德一类的人队伍庞大，他们安于旧传统，吃祖宗饭，顽固不化，不愿意跳出旧圈子，多次严重阻碍了我国封建时代的改革。如公元11世纪（北宋时期），王安石领导变法，司马光与朝中守旧势力一起，阻挠破坏新法的推行。司马光也是一位易学家，著有《温公易说》，他在《蛊》卦初六爻注疏中就这样认为：“子者所以承父之事而成之，臣者所以成君之事而终之。臣子之心，非以高君父而自名也，欲以掩恶而全美，故曰意承考也。”^②这就是在宣扬一种世代相袭，万古不变的精神。

再如近代的“百日维新”，1898年6月11日清光绪帝采纳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主张，下诏定国是，接连发出数十道改革命令：如废八股，裁撤重叠机构，办学堂，设中国银行、矿务铁路总局，倡办各种实业，奖励新著作、新发明，广开言路，准许自由办报等。然而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势力利用了部分民众的守旧心理，在祖制不可更改的大纛下，对新法横加阻挠破坏，终于使中华民族首次对资本主义的尝试，仅出台103天，便宣告夭折。

第二节 《周易》对华人婚姻及家庭观念的影响

家庭是社会组织之细胞，由于社会文化的多元化，因而在家庭观念上各民族都具有自己的特色。华夏民族在男女操守以及子女教育等问题上与西方人往往有差异，而人们又常用保守和开放这两个名词来概括这种差异。时至今日，依然有一些华人一方面对自己的保守津津乐道，另一方面对别人的开放横挑鼻子竖挑眼地妄加评论，却没有深入地探索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实质和根源。因而在下文将探索这种文化差异的根源。

① 《易学精华》，见来知德：《周易集注》，齐鲁书社，1990年。

② 文渊阁：《四库全书》，司马光：《温公易说》，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对女性人格的审美偏离

爱美，这是人类的天性。考古中发现在原始社会时期人已懂得使用装饰品。如1983年11月在贵阳西南172公里的桃花洞发现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遗址中，就有蚌壳穿孔制成的装饰品。美具备着自我表现和吸引异性的双重功能，它存在着多种表现方式，然而总括起来，不外乎在视觉、听觉、嗅觉以及心理感觉上创造美的形象。如高跟鞋，有人说它起源满族妇女，以突出其修长的腿，但从今日来看，是突出胸和臀，在视觉上给人以形态的美；抹香水，从嗅觉上让人感到美；古人戴步摇，佩玉珮，或印度人戴脚铃，行走时都发出响声，是从听觉和视觉上让人感到美。今天妇女们涂口红、画眉、美发，都是装饰的美；至于佩带珠宝金饰等，看重的是于富丽之美；而露胸装、比基尼泳装等，喜好者认为具有人体美、性感美。美是花样翻新，层出不穷的。由于美是一种受客观与主观双重制约的意识形态，所以说美在标准上既有客观意义上的共性，亦有受不同文化影响而呈现出的差异。因而在《周易》等儒家典籍的长期熏陶下，东方男性社会对东方女性的标准是端庄、文雅、温柔、注重仪态的美等等。而以西方男性的标准，则认为东方女性（特别是非开放地区）都是不开朗，不性感，保守的。的确，传统观念压抑了一大批妇女，她们不能随其心意，自然地去追求各种形态的美，甚至形成自虐心理，去压制爱美的天性，这是历史留给东方女性的负担。

其实，华夏初民们最初在男女关系上还是很开放的，直到公元前11至前7世纪的《诗经》时代还依然如此。如《诗经·溱洧》就描写了男女自由交往的情形，诗中写道：

原文：

溱与洧，
方涣涣兮。
士与女，
方秉简兮。
女曰：“观乎。”
士曰：“既且。”
“且往观乎，
洧之外，
洵訏且乐。”
维士与女，
伊其相谑，
赠之以芍药。

译文：

溱水河啊洧水河，
春天里河水汹涌流。
小伙子啊大姑娘，
各自手捧着鲜花真是香。
姑娘说：“到那宽地看看。”
小伙说：“已去过不想看。”
（姑娘说）“还是再去看看，
那块空地离河远，
真让人消魂又快乐。”
于是小伙子跟着大姑娘，
两人又开玩笑又打闹，
送上一束芍药花示永好。

诗歌表现了男女的相悦和欢乐。至于《诗经·召南·野有死麕》则是描

写了赤裸裸的自由结合。

原文：

野有死麕，
白茅包之。
有女怀春，
吉士诱之。
林有朴樕，
野有死鹿。
白茅纯束，
有女如玉。
舒而脱脱兮，
无感我帨兮，
无使虮也吠。

译文：

野外有一只被射死的麕，
用白茅紧紧地捆在一旁。
有一个姑娘想着男人啊，
那打猎的男子就引诱她。
树林中长满了小灌木丛，
野外有一只被射死的鹿。
用茅搓成绳捆放在一旁，
姑娘白得像玉一般晶莹。
慢慢地来啊轻轻地摇动，
千万不要晃落我的佩巾，
也不要引得狗儿叫起来。

如此奔放而富于浪漫情调的诗歌只能出现在先秦时代。之后华夏女性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所约束，犹如遮纱一般，不再显出活泼的本性。而之所以造成这种氛围，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不可否认，《周易》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如《周易》坤卦对女性提出妻道的准则，并从乾阳坤阴、天尊地卑、阳刚阴柔的观点，要求女性对男性的绝对顺从。又如《家人》卦象传把“夫夫、妇妇”作为“家道正”、“天下定”的三大因素之一。在这种伦理观念下，《周易》一方面在人格上要求女子柔顺，另一方面在仪态上也对女性提出了一个“冶容诲淫”^①的审美标准，认为女性打扮得漂漂亮亮，是为了引诱男性来奸淫，会引起社会不安定，所以剥夺了女性追求美的权利。

其次，《周易》中多处反映了对妇女的蔑视和限制。如《遁》卦九三爻：“系遁，有疾厉，畜臣妾，吉。”爻辞中臣指奴隶，妾指妇女。文中把妇女和奴隶等同看待，是男主人豢养的私有财产。而对妇女又怎么养呢？清代李光地《周易折中》就上文解释道：“案，孔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然，然则不远不近之间，岂非不恶而严之义乎？”很显然这是古代易学家在附会《周易》，大肆宣扬封建道德。这类现象在汗牛充栋的易学著述中比比皆是，并对后世产生了无法估量的深刻影响。几千年来华人世界的很多男性对女性都没有正确的认识，没有给女性以由衷的尊敬，反而视之为“红颜祸水”，制造了无数清规戒律，给妇女带上了精神枷锁。如《蒙》卦六三爻：“勿用取女，见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① 孔颖达：《十三经注疏》，《周易·系辞下》，中华书局，1979年。

三国时代王弼说：六三（阴爻，象女）与上九（阳爻，象男）是正应，象征女主动求男。按照礼仪习俗，女子应在家等人上门求亲，现在反求男方，这种行为是反常的，这种女子要不得，所以这一爻是凶。到了北宋，程颐又从另一角度解释：从爻象爻位来看，《蒙》卦就意味着闇昧。六三爻又以阴柔处在不中不正的位置上，就好比是品行不端正而妄动的女子。按理六三与上九为正应，现在舍远（上九）就近（九二），这好比女子见别人钱多而主动接近上去，自然是不能保证自身的贞节了，也就没有什么好处。王弼和程颐都是古代最重要的易学大师，不难看出他们对《周易》卦爻辞的注释中，有着浓厚的封建色彩。

最后，《周易》保守的性观念。正如《孟子·告子上》所说：“食、色，性也。”但中国人却缄口不谈性，视之为禁区，称之为房事，更有妙者，雅称“敦伦”，意思是做爱能敦睦人伦。在性观念上《周易》要求女子在性面前是被动的，孱弱的。如《姤》卦卦辞“女壮，勿用取女”。意思是：女子太强壮了，不要娶这种女子。为什么呢？东汉易学家郑玄解释道：“姤，一女当五男（《姤》，䷫，五阳爻一阴爻，象征五男一女），非礼之正，故谓之《姤》，故不可取。”近代易学家尚秉和特别指出：“朱子（朱熹）喜用其说，便谓女德不贞。”^①这里古人把一阴爻与五阳爻的关系看成“一女当五男”已属离奇，而朱熹认为这种女子善淫，更是想象得太过分。

从上述可见，《周易》经数十代儒家学者的注释，字字行行已经浸渍着腐朽陈旧的道学，在这种精神的熏染下，男人们三妻四妾，而女人只能从一而终，连“圣人”朱熹都有逼人为妾的污垢，而文人墨客嫖娼狎妓更是普遍现象了。与这种精神与现象相适应的是男人们推重的是贞节贤顺的女人、欣赏的是细腰缠足的美人、病兮兮的弱不禁风的林黛玉式的美人。据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载：“福建漳州，女子皆小足，必倚杖而行。凡遇庆吊之事，女子偕往，每人皆持一杖。相聚成林。盖初时民俗淫奔者众，朱文公守漳时，立法命之缠足极小，使不良于行，藉革其浇俗，故成为今日之现象也。”从以上引文可看出，在封建社会中男性们不但从精神上，而且还从肉体上压制妇女追求自由的权利，如此惨不忍睹的现象就是被尊为“圣人”的朱熹一手造成的，道学对人性戕害之烈，于此可见一斑。古代中国给女性留下的只是一片狭窄的天地，而在今天，尽管已有很多女性勇敢地冲破了禁锢与樊笼，但她们的灵魂得到了真正的解放吗？还有许多处于弱势群体的妇女的命运又如何呢？

^① 尚秉和：《周易尚氏学》，中华书局，1980年。

（二）男尊女卑和溺杀女婴的陋习

“女儿生来一支花，灶前灶后铲锅巴。”

“男儿生得丑，五湖四海走。”

这是湖北汉水流域早年流传的两首民谣。直到今天，改变华人中重男轻女的观念仍然是我们亟待解决的一项工作。有人说重男轻女牵涉到传宗接代、财产继承、家庭劳动力及老年人赡养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其实这些义务和权利男女均可承担，而现在某些地区，特别是农村，依然认为这种权益仅限于男方，那是一种旧观念上的特殊理解。

在人类历史上曾有过母系社会时期，这是一个以女性为主导并掌管部落内大权的社会。今天我们仍能在国内的某些地方看到它的遗风，如在云南泸沽湖畔生活的纳西族支系摩梭人，他们在婚姻上仍保持着原始母系社会的习俗，称做“阿注”婚。“阿注”是朋友、伴侣的意思。这里的女子没有固定的丈夫，只要男女双方两情相悦，男子便会上女方家留宿，次日才回自己的家。这样夜宿朝离的方式，短则一夜，长可达十多年，其间女子也可随意结交新的性伙伴。据有关资料记载：“开坪乡戛拉村一名二十三岁的美女，已有男阿注一百零二人。”^①在这个地区，出生的孩子由女方抚养，男方没有任何责任，这是地地道道的女儿国。另据报道，世界上“女人部落”、“女儿国”倘有多处。当然这些都是并不正常的现象，我们之所以用此作例，只是想证明重男轻女不是天然的、合理的，而是历史的、人为的。

《周易》具有浓重的重男轻女思想，《系辞上》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说卦》又说：“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周易》以自然解释人事，复以人事契合自然，在天尊地卑的总体原则下，男尊女卑观念自然形成，这种观念和现象在《诗经》中也有所反映，《小雅·斯干》就描写当时的习俗：“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其泣啾啾，朱芾斯皇，室家君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褐，载弄之瓦。无非无仪，唯酒食是议，无父母诒罹。”译成今文则是：假如生了男孩子，给他一张小床睡，给他裹件大衣裳，让他玩耍白玉璋。男孩哭声真洪亮，红色蔽膝更漂亮，长大之后当王上。假如生个小姑娘，让她就睡在地上，用个小被包起来，丢个瓦锤让她玩。不许违抗不打扮，出嫁换进酒食品，别给爹娘添麻烦。可见在上古时期男尊女卑现象就已经出现，之

^① 乌丙安：《中国民俗学》，第十三章，见《婚姻的民俗传承（四）对偶婚》，辽宁大学出版社，1985年。

后逐步变本加厉。至西汉，董仲舒提出“三纲五常”，其中就包括夫为妻纲，从而在理论上确立了以男性为主，女性从属的社会模式。这个模式就是《周易》“天尊地卑”理论的翻版。几千年来，夫为妻纲理念弥漫了整个民族，成为广大妇女身上的枷锁。受这个理念的影响，历史上不断出现一些清规戒律，如东汉班昭的《女诫》，对女子的行为提出了很多规范化标准；古代还对女子提出“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苛刻要求，提出休妻的“七出条规”。造成男子可借“无子、不事舅姑”等藉口随意休妻的现象，致使妇女在家庭中处于被奴役的屈辱位置。这个流毒绵延至后世，为祸非浅。

比如，中国普遍都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而这个“后”，则必须是男孩，这是男尊女卑的又一种现象。旧时华人大都把结婚看得很重，认为生男儿上以承先祖，供祭祀，下以继后世。一旦没有生育男儿，就会宗系乏，祭祀废，这是一桩很严重的事，最常见的办法便是从兄弟或其他同宗堂弟兄中过继一男孩作继嗣。《焦氏易林》上记载：三国时期吴国的易学家虞翻给弟弟写信说：长子容，应该替他娶一个老婆，可以在远处找个小户人家，让她生个男儿就行了，老天爷降福于人，并不是一定在贵族中间。想来这位虞老先生在立嗣继宗上很重视，对门第观念倒是看得开。这在门阀风很盛的年代里是很难得的。

蒲松龄《聊斋》中有一则故事，说有一家的老婆很厉害，自己不能生育，也不许丈夫染指其他女性。后来丈夫偷偷摸摸与婢女搭上，使之怀孕。老婆得知后醋劲大发，赶走婢女。过了很久，丈夫死了。这时族中人都视她为外姓人，蜂拥上来争夺财产，把家中几乎搬个空。她呼天抢地，哭奠在丈夫灵前，但无人理睬。这时有一青年男子上门，称祭亡父之灵，经盘问，方知是先前婢女所生。于是她喜呼：“我家也有儿。”接着上诉官府，淋漓尽致地叙述无儿时遭族人欺凌的苦楚，连官老爷听了也深为同情，就判族中人归还财产。后来这个女子临死时告诫媳妇，一旦自己无法生育，要赶紧替丈夫娶妾生子。这个故事真实生动地反映了旧中国“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社会现实。数千年来，中国妇女因不生男孩而吃尽了苦头；而在今天，重男轻女的观念则成了计划生育的最大障碍，很多家庭为求男孩而不惜超生。由此可见，重男轻女的观念是如何顽固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而这种观念在中国文化的原典之一的《周易》中也多有反映。

倘若我们细心观察，会发现今天尚有很多女子取名招娣、伪娣、亚男、若男、赫男等，这些名字其实都表明了其父母渴望生男孩的心理。这种社会心理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当它发展到极端，便出现丢弃、溺杀女婴的残酷

现象，这是重男轻女观念带来的又一陋习。溺杀女婴在战国时期就已经流行了，据《韩非子·六反》记载：“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溺杀女婴的陋习既久且盛，广东中山名人郑观应曾述：“按溺女之风近世各直省所在多有，相习成风，恬不为怪。”还有著作记载：近代华北地区几乎找不到一个未曾溺杀过女婴的家庭。^①往事隔千年，然丢弃、贩卖女婴这种恶习仍没有绝迹，以下仅举数例：

例一，“一位40岁的农妇携带一个纸箱进了昆明火车站，准备乘车离开此间，上车前被拦截检查，竟发现纸箱中装有4个未满月的女婴和一只小狗。该农妇叫陈进仙，原是云南省泸西县人，后嫁往江苏省宿迁市，9月份她回泸西探亲，在永宁乡公路上捡到一个女婴。住旅社时，又有2名妇女白送了3个女婴给她。”^②

例二，“2007年7月1日怀铁公安处在K268次列车抓获拐卖婴儿团伙，当场解救刚出生未满月女婴两名（一个刚出生仅6天，另一个出生10余天）。经审查，这伙犯罪人无视法律，专门收购他人丢弃或低价卖出的女婴。”^③

例三，“童养媳现象在我国销声匿迹多年后，近年来在一些地区又有所抬头。童养媳的出现，给一些人贩子提供了‘市场’，拐卖女婴现象时有发生。据村干部说：六安来的一位50多岁的老妇女，先后抱了七八个女婴到此出售。同时，这也给逃避计划生育者找到了‘出路’，多生超生现象十分严重。如一农民接连生下的3个女孩都抱给了人家当童养媳，想腾‘名额’，达到生儿子的目的。”^④

由重男轻女而导致的种种现象将会造成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前人大副委员长陈慕华在一次接见《党建》记者时宣布：“目前全国男女比例失调，男性占51.1%，女性占48.9%。这个比例意味着将有几千万娶不上妻子的男光棍。究其性比失调的原因，主要是国民中重男轻女，‘无儿断香火’的封建思想作怪。还有一条不可忽视的客观原因，就是鉴别性别的方法科学化、现代化了。据内情人透露，目前不少地区通过B超或羊水化验鉴别胎儿

① 王宏雄：《为何溺杀女婴的陋习在中国社会沿袭上千年》，载《南方日报》，2005年1月。

② 《四女婴绝境逢真情》，载《文摘周报》，1989年12月8日第2版。

③ 《婴儿病重母亲却不急 火车上可疑母子引出拐卖案》，据央视国际www. CCTV. com，2007年7月13日。

④ 《童养媳现象又有抬头》，载《文摘周报》，1989年10月6日第2版。

性别，如发现是女婴便流产，是男孩就千方百计地保护，这在农村尤甚。”^①

近期这个问题被再次提出，据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张维庆在央视“新闻会客厅”与主持人的谈话中反映：因为受儒家重男轻女、男尊女卑，以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观念影响，我国人口中男女比例出现116.9:100的不正常现象（正常比例为103至107:100），有些省份竟达到135:100的严重失调。到2020年，适婚男性比适婚女性将多出3000万~4000万人。^②

生儿育女不仅仅是人类的生理现象，而且是一个民族精神与文化要求的表征，也可以说是一个值得全社会深入讨论的哲学课题。面对这一问题，如何弘扬人道主义，尊重妇女的权益，抛弃落后的意识，是我们这一代的职责。

第三节 中医诊治康复与易理的运用

中国医药学是中华文化中最宝贵的一部分，是华夏民族长期以来与疾病作斗争过程中所积累的丰富经验的总结。它形成了自己一套独特的理论体系和治疗原则。易学家刘大钧先生曾说：“‘中医’不是‘中国之医’的简称。而是医、易结合的一个概念。以《易经》‘中’的原理治病，恢复阴阳平衡，即是‘中医’。”^③刘先生的话自然是对中医一词的新注释，然而却简明地从整体上揭示了中医与《周易》的关系。当然中医与《周易》的关系是极其复杂和深刻的，非一时一文所能说明。这里仅从诊断、治疗以及养生三个方面有选择地、概括地加以阐述。

中医学认为疾病的根源在于阴阳的不平衡，或是创伤、虫兽伤等。中医学认为自然是个大宇宙，人体则是个小宇宙，天人之间不仅一气相通，而且还存在着共通规律。中医学上的阴阳即是易理的广延，易学以阴阳为天地万物运动、变化的缘由，《系辞下》说：“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意思是天下的一切均分为阴阳，而且二者是互相影响、制约、配合的。中医学就是运用这一学说来阐明人体结构、生理和病理现象、药物性能及辩证论治等一系列对立统一的问题。

① 《男女比例失调的潜在危机》，载《文摘周报》，1990年1月5日第1版。

② 《中国人口男女比例失调之忧》，据CCTV“新闻会客厅”，2006年4月14日。

③ 载《中国医学报》，1990年12月7日。

在人体结构上，外部为阳，内部为阴，上部为阳，下部为阴，背部为阳，腹面为阴，腑为阳，脏为阴。

在生理上，从机能与物质相对来说，机能属阳，物质属阴，二者互相为用，互相资生，又互相制约。就机能方面来说，兴奋属阳，抑制属阴。在病理上，认为疾病是阴阳相对平衡失调，导致阴或阳的偏盛或不足，于是出现各种证状。如“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阳胜则热，阴胜则寒”。《黄帝内经》说：“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这表明早在上古时代人们已明了保持阴阳之平衡是人体健康的保证。

中医学的诊断称之为四诊八纲。四诊即望、闻、问、切。八纲是以阴阳作为其总纲，把各种疾病的复杂表现综合归纳为八种不同的证候，即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其中表、热、实属阳，里、寒、虚属阴，有人以为中医在诊断上不如西医科学，是原始的，主观随意性很大。其实这是误解。一位有丰富经验的中医师在诊断中，不论是望人的神态、肤色、形体、舌苔、眼、鼻、唇、咽喉、牙龈、指纹，听人的声音，嗅人的气味，问人的寒热、汗、头、身、二便、饮食情况，还是与人切脉，都会把所获证候与历史上的和个人的经验相对照，从而诊断出疾病。与西医相比，中医学在诊断上有其独到之处，它不仅重视各种疾病的普遍性症状，而且更重视人体在复杂的内外因素影响下表现出各种不相同的特异性。如感冒，西医认为是病毒感染，表现为发烧头疼，其处理方法也千篇一律，而中医则以为是受风寒病邪，不仅注意到一般性症状，而且还注意到在不同个体有表虚和表实两种证候，因此治疗方法也就出现差别。这种观察研究其证候，然后对症治疗的方法称之为辨证论治，中医的诊断是其独特医疗法的前提。

在治疗方面，中医药学运用易理，建立了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如：

经络学说。25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发现了人体的经络系统，并借鉴易学，分别取名为手三阴、足三阴、手三阳、足三阳，成十二经脉。今天经科学测定，在人体内部存在着十四条经脉线，其宽度仅一毫米，它与古典经络图相吻合。经络学说是我国针灸、推拿按摩、拔火罐、刮痧等独具风格的治疗方法的基础。

阴阳药性说。人们常说鳖鱼滋阴、公鸡壮阳、鸽子温中健肾等等，而西方人则在营养的角度上只注意到它的蛋白质、脂肪等的含量。这表明我们华人对物性的理解更深化。早在很久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在易理的启示下，认识到并分辨出可以充当药物的动、植物及无机物具有寒凉、温热、平和三种性能，把药性温热、气味甘辛、作用升浮的归属于阳；反之，寒凉

的、酸咸苦的、沉降收敛的属阴。

取象说。中医有句俗话：“吃什么，补什么。”这是把人和自然界万物看作平行体，它们之间有互通的特性，所以头疼脑胀的可吃猪脑，关节炎者可用猪脚熬汤喝，就连脱肛或子宫下垂，都看准了龟鳖之颈或蜗牛能伸缩的特性，以为其体内一定存在着使肌肉伸缩的特质，所以把它煨而存性，抹在患病部位。这些疗法都往往有一些特效。

天人感应说。从自然科学常识来看，一年四季二十四节气，是处于温带的华夏民族对地球围绕太阳旋转一圈所需时间的一种人为的划分而已，逢节气的日子与平常日子应该是毫无差别的。然而中医学则认为，节气与人的疾病具有内在联系，因此用药上也应有别。

四象说。明朝李济马根据《周易》“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的哲学思想，不仅解释了人与自然、社会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还根据人体脏腑阴阳盛衰变化，把人分为太阳、少阳、太阴、少阴四象的人，并由此确立医治的原则和方法。

从上述可以看到，中医学以易理为根本，建立了自己的理论，形成了其独特的治疗方法，不仅在一般性治疗上，而且在医治疑难杂症上常常取得令世人惊绝的疗效。下面举例谈谈。

邱天道，男，曾任军队某部瘫痪病专科医院院长。他出生在一个中医世家，在家庭的熏陶下，熟读《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匱要略》、《本草纲目》等中医学名著，汲取了父辈宝贵的临床经验和家传绝技。20岁从军后，又就学于著名疑难病专家鲁兆麟教授门下，之后深入钻研《周易》，根据“天人相应”的道理，将“子午流注针法”、“飞腾八法”等熔为一炉，创就了一套“一穴同时进多针，多根芒针同时透数穴”的针灸绝技，对治疗瘫痪病效果显著，被海内外誉为“神医”。新加坡有一位姓王的华人，曾因车祸导致腰椎断裂，医治无效，长期卧床。他的妻子偶然在报纸上看到有关邱的事迹，便急忙带丈夫到中国求治。经邱先生认真检查，精心用中草药和针灸治疗，40天后，王老板就行走自如。

王怀彦先生是山东省潍坊奥华中医院院长，他在运用中医理论辨证治疗中晚期恶性肿瘤方面闯出了一条新的成功的道路。^①运用易理治癌，并取得一定的疗效。

艾滋病是当今人类面临的一种灾难性疾病，据传这种病源于中非，在卢旺达和扎伊尔交界处的基伍湖岛屿上，有一种古老的性习俗，伊治威人为了

^① 载《光明日报》，1992年7月27日。

刺激男子和女子的性能力，把雄猴血和雌猴血分别注入男子或妇女的大腿、阴阜和背部。于是猴子的艾滋病就传染给人类。刚开始时，由于地区的封闭而没有传播开来，后来随着人口的流动，以及乱交成风，终于出现世界范围的大流行。1969年，美国密苏里州有一个叫罗伯特的15岁男孩，持续高烧，阴茎肿大，大量使用抗生素无效，经检查，发现他体内免疫机能丧失，不久就死了。但他的血液和部分组织被保存下来。直至1984年，艾滋病在美国蔓延，当年参加治疗罗伯特的医师才醒悟，想起了这个病例，他们把低温冰箱中的标本取出，送到著名的医学院化验，结果查出了艾滋病毒，这是世界上第一次由医师发现的艾滋病例。时至今日，世界上治疗艾滋病主要采用逆转录病毒高效联合疗法（HAART），又称「鸡尾酒疗法」，国际上抗艾滋病病毒药物已开发至四线，疗效也越来越好，但仍未找到彻底治疗这种疾病的有效方法，攻克艾滋病已成为全世界医学家关注的课题。早在20年前，我国就开展中医治疗艾滋病项目；之后，卫生部、中国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委托中华医学会、中国中医研究院于2005年制定《中医药治疗艾滋病临床技术方案》，运用中医辨证治疗观念对艾滋病感染者进行针对性治疗。目前通过对800多种中草药抗艾滋病体外试验，已发现80种左右的中药具有不同程度的抑制艾滋病病毒的作用。2006年，我国中医治疗艾滋病试点项目扩大到14个省，其中中国中医研究院曾将一些中药制剂用于河南，在对1792例艾滋病所引起的并发症的病人治疗中取得了满意的疗效。

又如在美国休斯顿火箭队参加NBA比赛的我国著名球星姚明因长期从事激烈运动而造成劳损，出现左脚舟骨约70%的骨裂，虽在美国接受了手术，但一个月后，左脚仍未消肿。姚明于2008年4月回国内接受中医辅助治疗，通过内服加外敷中药药物以及针灸、推拿、按摩等的治疗后，有效地达到消炎、活血的效果。据专家介绍，中医在治疗骨折、消除肿痛方面有着独特的疗效。在中西医结合治疗下，姚明的脚伤迅速得到了康复。

中医虽然有疗效，有神秘色彩，但在某些方面悬留下的一些病案有时也颇令人费解。如清代名医叶天士曾遇产妇，在开药方后，竟又开出一片梧桐落叶为药引。问其原委，就说：“时值秋季，一叶落而知天下秋，以此为药引，自然生矣。”可见这天人感应说对他的影响有多么深刻。鲁迅先生对中医是持批判态度的，这大概是因为他父亲的病。鲁迅的父亲大概是患肝病腹臃胀吧，中医竟取破鼓皮为丸，欲取破鼓之音以厌胜臃胀病，还交代药引须是“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对的”^①，这样的治疗使得鲁

^① 鲁迅：《〈呐喊〉自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

迅父亲的病日重一日，最后竟因此亡故。

中医虽然治愈了很多令西医束手无策的疑难怪病，不可否认其医理有科学的因素，然中医学如易学一般，令人扑朔迷离，大有探索的余地，亟待整理，以减少诊治过程中的盲目性。实践告诉我们，一切疾病尽管来源不一，而从八纲的角度去观察，它对人体免疫机能的侵袭所造成的反应，其症状都是呈规律性的，因此中医辨证施治，即是从根本上提高了人自身的免疫机能，增强了对疾病的防御。这与西医堵漏洞式的医疗原则是迥然不同，但疗效却是一致的。

在养生上，《周易》的许多卦爻辞从精神上、心理上给我们指示了防病、保健的哲理。如《豫》卦就是一个谈养生的卦。豫，就是快乐。其六五爻“贞疾，恒不死”。意思是：人只要持正平和，就没有精神负担，这样虽遇疾病，也能长寿而不夭折。这告诉人们，保持精神愉快是养生的重要方法。

《颐》卦也是讲养生。颐，保养的意思。其卦辞说：“《颐》，贞吉，观颐，自求口实。”意思是：养生的关键是正（贞），这个正包括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物质上不暴饮酒食，不贪恋美色；精神上不暴怒，不抑郁，这样就会吉祥如意。所以观察养生之道，要特别注意控制饮食及保持精神上的平和。这个经验对于今天很多人来说，仍具有现实意义。

《无妄》卦更是清楚地阐明了人应量力而行，不可妄动的养生原则。据载，某村有周姓兄弟，皆身强力壮，年青时，有一次兄曾挑350公斤，步行数里，弟亦能挑250公斤随后，以此闻名乡里。之后，大哥不改其逞强好能的秉性，终于五十多岁亡故，而弟则时时注意约束自己，不竭力而作，终于年逾百岁。这个例子证实了《无妄》卦辞所说的：“《无妄》，元亨，利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意思是：不随意妄为，就会大吉大利亨通，自然有利于身心健康。相反，倘若做事不持正，盲目瞎干，就会有灾，也不利于对目标的追求。《无妄》卦九五爻还说：“无妄之疾，勿药有喜。”意思是：平时不妄为，偶然有点小病，不吃药也会好。所以孔颖达在《周易正义》中解释：“若疾自己招，或寒暑饮食所致，当须治疗，若其自然之疾，疾当自损，勿须药疗而有喜也。”今天我们可以理解，《无妄》中所介绍的以调养为主对待疾病的方法实在是很高明的，它可以防止人产生对药物的依赖性以及用药过多而出现的抗药性。

《周易》是一本富含哲理的宝书，其中有许多妙语耐人咀嚼，把它移用于养生，对人大有启发。比如说当你心情烦闷、精神上有负担时，不妨想想《节》卦卦辞上说：“节，亨。苦节，不可贞。”它教导后人适当地约束个人过于外露的情感，当然是有好处的。但拼命压抑情感就会造成精神失常。因

此学习《节》卦，就能明白对人的心理咨询以及疏导排解心理障碍的重要意义。《周易》就是这样曲折隐晦地向我们介绍了养生的道理，它需要读者对易理细致入微地追索。

第六章

《周易》与民俗及日用

第一节 《周易》与民俗

民俗，古代叫民风，即民间的风俗。有的以为指民间传统。民俗是民族心理和民族风貌最集中最充分的反映，它具有很强的地方性，又有世代相习的继承性。民俗存在于一个民族的历史长河中，它不产生于一时，在各个历史阶段都存在产生的基础。它表现一地民众具有的某种心理信仰，同时也存在着某种约束力。中华民族人口众多，居住的地域广大，各地的风俗自然是千姿百态，蔚然大观。而本书所介绍的仅仅是与《周易》相关的习俗。

研究民俗的学问叫民俗学，在英文中叫做 Folklore，从民俗学的角度看，民俗表现在三个方面，即精神生活、社会生活、物质生活。

在精神生活上，最重要的表现在华夏民族的崇拜、信仰和祭俗方面。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民族都崇拜天和地、日和月，但华夏民族还是有自己的特色，这种特色主要表现在视八卦为宇宙本体说以及天地至上说。古人认为天地相交而生日、月、风、雷；日、月、风、雷相动挠薄速而生水、火、木、石，由水、火、木、石相杂糅燥润而生万物。《说卦》提出“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这反映了华夏初民对八卦的原始信仰，而我国古代的一些祭祀，延至近代的一些习俗都是这种信仰的产物。

我国古代祭祀天地日月山川的仪式是纷繁复杂的，可以从祭祀的对象、目的、地点、节令等多种因素来划分。比如说，同样是祭天、祭上帝，从地

点来分，有在郊外祭，也有在明堂祭。明堂是古代君王朝见臣子、颁布政令的地方。从目的来分，有祈求农作物丰收的，也有禳除干旱洪涝的；从对象来分，有祭日月、星辰、风雨云雷及山川的，在祭品、仪式上也有种种不同。所以《礼记·祭法》上说：“燔柴于泰坛，祭天也；瘞埋于泰折，祭地也；埋少牢于泰昭，祭时也；相近于坎坛，祭寒暑也；王宫，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坛，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周易》中也屡屡提及祭祀上天的仪式。如《豫》卦象传“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益》卦六二爻辞“王用享于帝，吉”。享，就是祭。《鼎》卦彖传又说：“圣人亨以享上帝。”祭天的内容多次在经传中出现，充分表明了《周易》时代祭天是一种频繁的活动。

我国古代最隆重的祭天地仪式大概要数封禅大典，这种典礼在所有实行君主制的国家中是独一无二的，它不同于君皇加冕登基的仪式，凡举行这种仪式的基础是在位君王的文治武功取得一定业绩，而君皇认为这一切都是天地所赐予，于是劳师动众，率百官前往泰山举行大典，以答谢天地之大恩。在客观效果上举行封禅也有巡视地方，察看政绩，了解民情的作用。在泰山上筑土坛祭天，报天之功，称做封，在泰山下的梁父山开辟祭地，报地之德，叫做禅。相传这种仪式在西汉初年之前就举行了七十二次，^①这说明该仪式历史悠久。

古代纷繁的祀典延伸下来，便形成各具特色的地方祭祀活动。其中固然包括不少道教佛教的祭礼，以及对祖宗、神鬼和历史英雄人物的祭祀，但其根本还是出于对天地的敬崇。举例说，旧时河北一带有接太阳的风俗，“每年至六月十八日晚，各村寺庙中锣鼓喧天，颇为热闹，村庄老年妇人集成一会，于是晚住在庙中，念经诵佛，直到天将明之时，排列供案，燃烛焚香，向东致祭，至太阳出来始止。若值天晴，清晨放出阳光，大家欢喜；倘是天阴，便云不吉，异常懊丧也。”^②很显然，这一风俗不仅受《周易》影响，也掺杂后世宗教的因素。

此外，我们还可以从日常生活中看到人们对天地的敬畏。如旧时私塾中凡新生进门都要跪拜，而所拜对象的次序则是天地君亲师。又如旧式结婚的

① 司马迁：《史记》，《封禅书》：“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中华书局，1972年。

② 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一（直隶·接太阳），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

仪式中，新婚夫妇在大庭广众面前也是少不了要跪拜天地。即使是那些不遵父母之命，私奔而暗中结合的，也往往要撮土为香，跪拜天地。人们认为这样做了，自己的婚姻就是天作合、地为媒，就具有某种合法性。从人的一生来说，结婚和求学都是极关键的时刻，从这个时候人们对天地的态度，可充分说明华夏民族自古就有着敬崇天地的风俗。

在精神生活方面另一个突出的是阴阳乾坤观念。《系辞上》说：“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这是认为乾坤阴阳不仅是世界结构的唯一模式，而且万物都归属于阴阳，凡有阳必要阴相合。几千年来这种观念也深深地积淀在民族心理上。首先表现在神的塑造上，凡男神，往往都有对称的女神。下面举数例：

东王公和西王母。在汉赵晔《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中有这么一段话：“立东郊以祭阳，名曰东皇公。立西郊以祭阴，名曰西王母。”可见东王公、西王母的神话是很早就流传了，它们只是东方和西方之神，至于为什么称“公”、“母”，那是从它们所居的地域来分的。从《周易》角度，东为阳、为公，西为阴、为母，而不是从性别来划分的。倘若从性别来称呼，或许正相反。丁山先生说：“我认为东王公宜是东王母传说的变相；甲骨文所谓东母，决是日神。《大荒南经》‘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①又据托名汉东方朔的《神异经·东荒经》介绍，“东荒山中有大石室，东王公居焉，长一丈，头发皓白，人形鸟面而虎尾，载一黑熊，左右顾望。”这时的东王公也只是半人半兽的人格化神。直至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诺皋记》方演化为地道的男性神，说：“东王公讳倪，字君明。从女九千。”而西王母也本指西方之神，主刑杀，一说是月神。在《山海经·大荒西经》中它亦是一位“人面、虎齿、豹尾”的半人半兽的人格化神，居于昆仑山，有三足鸟为它取食。在《穆天子传》就成为能唱歌谣的妇人，而在《汉武内传》中就演化成年约三十、容貌绝世的女神。到后世《神异经》，人们就从世俗的眼光；以男神东王公配女神西王母。

灶王爷和灶王奶奶。送灶的习俗一直延及至民国。鲁迅先生曾写有《庚子送灶记事》诗和《送灶日漫笔》散文，清晰地叙述了当时送灶的风情。20世纪50年代沪宁地区每年到腊月二十三，则见家家户户祭灶。而闽地直至60年代，一到腊月，商店专售一种糖果，称之为灶糖，这也是祭灶的余波。灶神传说起源于汉代，《后汉书·阴识传》上说：“阴子方于腊月晨炊时，见

^① 丁山：《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第73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年。

灶神现形。子方再拜受庆，家有黄羊（犬），因此祀之，自后累世繁昌暴富。”这阴子方是汉宣帝时人，因杀狗祭灶而蒙受灶神的福惠。然而古代祭灶的时间是未曾固定的，晋葛洪《抱朴子》说：“孟夏可以祀灶。”孟夏就是今天的农历四月，至于何时把祭灶固定在腊月，尚无确凿的材料可以说明。

古书中所说的最早的灶神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庄子·达生》篇上说：“灶有髻。”陆德明《释文》引“司马彪云：髻，灶神，著赤衣，状如美女”。《广雅·释虫》则云：“髻，蟬也。”这种蟬即蟑螂。我想，现在有谁能想到父祖与先辈们供了数千年的灶神的源头，竟是这种人格化的小虫呢？也有人说灶神就是钻木取火的燧人氏，或说是神农氏的火官。然而这又过于神圣，与后世品位低下的灶神形象似乎并不相称。

当时的灶神似乎是孤身一人，后人则按传统观念给他找了位太太，传说灶神太太是玉皇大帝的小女儿。由于灶神位卑，玉皇是大大地不乐意，而且也拗不过王母娘娘迁就小女的爱心和请求，于是便给灶神封了“九天东厨司命灶王府君”的头衔，不仅要他管人间的厨房火灶，并要在每年的腊月二十三、二十四两日，上天汇报各户一年中的善恶行为。因为有了这一身份，下方百姓害怕灶王向上天汇报自己的过失，便纷纷在祭灶日备下供品（一般是饴糖和面做成的糖瓜），算是买通人情的贿物，然后燃香，扎纸马，敬送灶王上天，到除夕夜又迎进门。据此，灶王奶奶的形象应该是诞生于玉皇大帝之后，而玉皇的神话则产生在道教诞生之后。

《事物异名录》上说：“《五经异义》：灶神姓苏，名吉利，夫人姓王，名搏颊。”更是说得有名有姓。

还有一种为公众不太熟悉的习俗是祭床神，旧时流行于吴中（今江苏南部）。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三江苏部分介绍“荐茶酒糕果于寝室，以祀床神，云祈终岁安寝，俗呼床神为床公床婆”。其下篇卷五安徽部分又说，寿春一带“婴孩三日后，必为之净洗，谓之洗三朝。置红鸡子床前，使产妇焚香祷告，谓之拜床公床母。若产妇有病，令洗婆代拜”。

其余的对偶神尚有城隍爷和城隍夫人、土地公和土地奶奶、龙王爷和龙母等。如广东旧时农历六月初六，俗传为龙母娘娘诞日，照惯例在西江畔的悦城要热闹地庆祝一番。

其次，凡事物都须成双配对的观念也深深地注入在民众的心理和日常生活中。古人很讲命运，并把命运不好称为数奇，奇就是单数，单数既然为不好的象征，反之偶数就代表着好，所以中国流行一句口头语，叫做“好事成双”。于是敬酒时往往敬上两杯。据《盛京通志》说：“今黑龙江一带，过

客到门，必留酒食，肴不过猪肉鸡卵，而以双上为礼。如鸡卵二盘，猪肉亦二盘也。”^① 古时以禾有双穗为国家兴盛的祥瑞，今日以并蒂莲、并蒂果为爱情的象征，婚俗中剪“喜”字，一个不行，非要一对相连的“喜”字方可大喜。商店的礼品中，如钢笔、戒指等，经常有以对偶为单位的品种，连北京街上的冰棒、雪糕，也有两支连在一起的。为什么大伙儿这么热衷搞对对双双呢？这就是一种民族心理和习惯。

第三，《周易·说卦》提出“分阴分阳，迭用柔刚”，这是说物有阴阳柔刚的分别，反映在生活习俗上则是男女有别的一些禁忌。以祭灶为例，胡朴安说：“先由家长跪拜，只限于男子，女子不许祭灶，男子不许祭月，殆为全国之通例。”^② 又说：“自元旦日至初五日五天，谓之破五，于此五日内，妇女不许往人家，谓之忌门，去则以为不祥。”为什么习俗中出现这一类禁忌呢？我们认为这不是简单的出于男尊女卑的观念，而是出自一种阴阳有异，男女有别的意义，如旧时湖北黄陂人称母曰二，就是以“天一地二，乾一坤二，父为乾，母为坤”^③。湖北人还迷信“男子耳热，次日天必晴；女子耳热，次日天必阴雨”^④。因此在祭祀上也会出现男女各司其事，各敬其主的现象。

在社会生活方面，《周易》对岁时风俗以及人生、礼仪等也有很大的影响。

首先要介绍的是关于龙的文化。龙的概念早在《周易》产生之前就已经形成。据新华社郑州1987年12月10日电讯报道，河南濮阳市兴修水利工程时，在西水坡发现仰韶文化遗址，在墓葬中发现用蚌壳砌塑的三条龙、两只虎和人物形象。龙长1.18米，高0.67米，昂首，曲颈，弓身，长尾，呈蛇形，足有明显的鸟类的爪，和现代画的龙相似。这幅画距今有5000年以上，被誉为华夏第一龙。另外在浙江余杭瑶山和反山良渚文化墓中，出土有饰以玉龙的玉镯、玉璜、玉牌，年代距今约5000年。在辽宁红山文化社祭遗址附近，发掘出5000年前的玉龙，此玉龙呈C字形。

① 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一（黑龙江风俗琐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

② 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一（京兆·三新年佳话），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

③ 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六（湖北·黄陂风俗志），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

④ 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六（湖南·湖南迷信之风信），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

之后，龙的概念被引入《周易》乾卦，出现了潜龙、见龙、飞龙、亢龙、群龙的形象。《周易》中龙的形象具有两种含义，一种是哲学上的龙，指阳气。一种是古人想象中自然界的生物，这个具有着双重意义的龙在华夏民族心目中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

龙的概念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呢？目前关于龙形象起源的说法已多达十余种，如唐兰先生在《文字学导论》一书中认为龙的形象源于蜥蜴。顾自力在《试探中国古代神话中龙的起源》一文中说“龙起源于水牛”。章太炎《说龙》以及《韩非子》所描绘的龙是鳄鱼，何新在《龙：神话与真相》一文认为：龙在中国古代乃是一种确实存在过的动物，龙的真相是一种名为湾鳄的食人巨鳄。^①更有学者从龙翔天空，能兴风雨的角度考虑，以为龙的形象乃是天空中虹的演生。其实，在古人心目中龙和蛇在远古时代是共为一体的，蛇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龙则是经思维而抽象化、艺术化的形象。在古代传说中，如《路史·后记》注引《宝筏记》说：天帝的女儿在华胥之渊游玩，感蛇而怀孕，经过十二年，生下了伏羲。而女娲是伏羲的妹妹。所以说华夏的祖先伏羲、女娲都是蛇的后裔。在出土的汉代石刻象和砖画中，就有人面蛇身的伏羲、女娲交尾象。从上可以推断，龙蛇是远古时代华夏民族大部落共同的图腾，因此华夏民族皆可称是龙的传人。在战国时代魏国人著的《竹书纪年》中就这样说：伏羲部落中分出长龙氏、潜龙氏、屠龙氏、降龙氏、上龙氏、水龙氏、青龙氏、赤龙氏、白龙氏等等，这些氏族都是伏羲的子孙，龙的子孙。《山海经》上也是这样说：黄帝轩辕国的子民个个“人面蛇身，尾交首上”。这种人面蛇身的形象在西汉王符的笔下出现了变化，描写成“角如牡鹿，头似骆驼，眼如妖怪，身似蛇”的形状。而闻一多先生在《伏羲考》中则进一步指出：成为中华象征的龙的形象，是以大蛇为图腾的族团兼并、吸收了许多别的形形色色的图腾族团，从而以蛇神为主体，“接受了兽类的四脚，马的毛，鬣狗的尾，鹿的角，狗的爪，鱼的鳞和须”^②。闻先生关于龙形象的描述完全是依据今天在绘画、雕塑、服饰等领域中所常见的龙的形象。

由图腾的龙演进为想象中具有无边法力的龙以及《周易》中富含深沉哲学趣味的龙，从而使龙的形象与天命、天意相联，这是华夏民族认识上的一个重要突破。它的效应产生在两大方面。一方面是表现在政权建设上，历代

① 何新：《龙：神话与真相》，载《民间文学论坛》，1987年第3期。

② 闻一多：《伏羲考》，《闻一多全集·神话与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王朝统治者都称自己是真命天子，是龙的化身。其起居处叫龙庭，宫殿中布满了雕绘的龙形象和龙饰的器具，座位叫龙位，仪仗中有龙旗，重要场合穿的礼服叫龙袍，子孙也称龙子龙孙。另一方面，龙的最大影响其实存在于人民中，因为它不仅浓缩着、积淀着原始初民的强烈的感情、思想、信仰和期望，而且经历了数千年传统的熏陶和衍化，已升华为一种民族精神，并融进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和语言词汇，我们常说的一些成语，如龙飞凤舞、龙蹠虎踞、龙跃凤鸣、龙腾虎跃、龙吟虎啸等都与龙有关，我们的很多传统节日，都有祭龙、玩龙、赛龙的活动。如：

正月十五元宵节，按传统风俗就要举行灯会，要龙灯，以欢庆一年的第一个月圆。

二月初二中和节，称为春龙节，也叫龙抬头，流行于北方地区。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上说：“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长能短，春分登天，秋分而潜渊。”古人从“春分登天”一句，就说这是春龙节的由来。其实，它的出现完全是出于北方农业的需要，俗话说“春雨贵如油”，农历二月初，正值惊蛰、春分时际，刚度过少雨的冬季，而迎来降雨量渐多的“雨水”节气，这本来是自然的规律，然民众心理上总希望冥冥中有神灵在掌握，于是就设立春龙节。春龙节就是春祀、祈龙、禳安，有民谚这样说：“二月二，龙抬头，大仓满，小仓流。”这反映了民俗心理。旧时北京地区“人家以石灰引白龙，入以小灰，引黑龙出。亦有以小扁食祀者”^①。而且这一天的吃也很有点名堂，吃水饺叫吃“龙耳”，吃春饼谓之吃“龙鳞”，吃面条称作吃“龙须”，现在北京还有一种面叫龙须面，即来源于此。

农历五月初五是端午节，举国都有赛龙舟活动，而且这项传统已流传至东南亚一带，当代更发展成为多国参加的地区性体育活动。现在通常把赛龙舟与纪念战国晚期著名的爱国诗人屈原联系在一起。据梁代吴均所著《续齐谐记》载：“楚大夫屈原遭谗不用，是日（农历五月初五）投汨罗江死，楚人哀之，乃以舟楫拯救，端阳竞渡，乃遗俗也。”《荆楚岁时记》一书也有类似的记载。

一说此风俗是缅怀春秋吴国大夫伍子胥。他亦是楚人，因父兄被楚王屈杀，不得已而投吴，并兴兵复了仇。他也是一位数千年来人口皆碑的忠臣，他以自己的品行而获后人的敬仰。相传农历五月五日伍死后，吴王把他的尸首装进皮袋丢入江中，皮袋竟随波逐流而不沉没，所以百姓都说这是伍子胥

^① 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上篇卷一（顺天），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

显灵。《史记》上说：“吴王杀子胥，投之于江，吴人立祠于江上。”这样看来，吴越地区的民众在每年五月初五泛舟逐浪，以悼念伍子胥，希望他显灵，那也是合情合理的。这种说法见于《吴越春秋》。

然而据《记纂渊海》所引《岁时纪》载：“越地传云竞渡起于越王勾践。”相传越王勾践为了灭吴复仇，必须操演水师，但又怕吴国觉察而有所防备，便借嬉水竞舟以练习水战。两汉的《越绝书》和《越地传》也记录了同样的说法。

其实，把端午节划龙舟的起因说成是纪念屈原或伍子胥，或者说是春秋时越国为了备战而训练水师，那都是一种附会，表现了后人对昔日忠臣和著名历史事件的怀念。据闻一多先生的《端午考》指出：端午节本是吴越民族举行图腾祭祀的节日，而赛龙舟便是祭祀中半宗教、半娱乐性节目。^① 这种活动大约出现在四五千年前。长江下游的吴越民族在一年一度的端午都举行盛大的图腾祭，人们划着刻着龙形的独木舟，通过竞赛表示对龙的敬畏。关于赛龙舟最早的文字见于《穆天子传》，那是记载西周穆王（公元前1000—前947年）时的事情，比伍子胥，屈原要早四五百年。

舞龙也是我国流行的群众文娱活动，如安徽绩溪于中秋节游火龙，“火龙系用稻藁扎成，身长约丈余，有头尾，有爪。游时十数人用竹竿撑之，游行各村，向各家讨香，插在火龙身上，龙后佐以锣鼓，喧哗闹天。游毕烧纸箔，放爆竹，送至河中始已。”^② 广东丰顺一带也有烧火龙的习俗，一般在春节和元宵举行。龙用纸扎成，长15~20米，周身扎满鞭炮，由赤膊健壮男子挥舞，在火光和鞭炮声中上下翻飞，很受群众的欢迎。

在湖南长沙则新春佳节要“扎一纸龙，沿街行走，鸣锣击鼓，甚为热闹，家家焚香顶礼，若迎接真神然。妇人多年不生育者，每于龙灯到家时，加送封仪，以龙身围绕妇人一次。又将龙身缩短，上骑一小孩。谓之麒麟送子。纸龙用麻作须，浅识者以多钱购剪服之，谓可治一切疾病。”^③

四川于“天旱时又有耍水龙者，折杨柳扎为龙形，并以柳圈戴于头上，

① 闻一多：《伏羲考》，《闻一多全集·神话与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② 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五（安徽·绩溪中秋风俗谈），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

③ 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六（湖南·长沙新年纪俗诗），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

裸其上身，执水龙沿街沿巷而舞，一人前行鸣锣，家家备水泼淋”^①。

广东潮州于农历二月十五日举行迎青龙，兼有年青美貌女子扮演剧中故事以助兴。

云南大理地区农历七月二十三日在西洱河滨有赛龙神之会。那一天百里之中大小游舰咸集，祷于洱海神祠，灯烛星列，椒兰雾横，尸祝既毕，容与波间，扬帆竞渡。不得舟者列坐水次，藉草酣歌。

佤佬族则舞草龙，旧时碰上天旱，扎草龙到河边焚烧，以祈祷降雨。到春节往往布龙和草龙并舞。一边舞，一边有人在草龙上插香火，使之燃烧。于是草龙化成火龙，也很吸引人。

以上是我国各地龙文化的缩影。从龙的图腾到经典《周易》，龙的形象一直萦绕着、熏陶着生活在中华大地的人们，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无论是生长在这块土地的或是远走他乡的，他们都是龙的子孙，龙的传人。

下面谈谈《周易》某些卦爻辞对我国上古时期婚俗的反映，这个反映不仅仅是父系社会现实生活的直录，也是《周易》乾刚坤柔、男强女弱意识的体现。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 抢婚。

“屯如遭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屯》卦六二爻）

译文：危难临头啊，有一伙男子乘着马在徘徊，他们不是抢劫财物强盗，而是为婚姻而来。

“乘马班如，泣血涟如。”（《屯》卦上六爻）

译文：女子被乘马的男子抢回去，她不愿意，大哭大喊，哭得非常悲惨。

《睽》、《贲》二卦也反映了类似的情形。

“睽孤，见豕负途，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婚媾。”

（《睽》卦上九爻）

译文：有人在路上看到一辆车上载着打扮得像鬼一样奇形怪状的人，还带着几条猪，他们先拿起弓，装出射人的姿势，后又放下弓。原来他们不是强盗，而是去订亲的队伍。

“贲如皤如，白马翰如，匪寇，婚媾。”（《贲》卦六四爻）

译文：太阳晒得像火烧，新郎和小伙子们骑着白马在飞跑，他们不是来抢劫，而是来娶亲。

^① 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六（四川·越雋求雨之风俗·耍水龙），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

李镜池先生说：“《屯》卦说的是求婚，《睽》卦说的是订婚，本卦（《贲》）说的是结婚，合起来约略看到对偶婚的图景。”^①对偶婚是人类进化史上继蒙昧时代的群婚制之后产生的，这是一种族外婚，处于对偶婚制的早期的阶段，往往出现以武力劫夺的现象。恩格斯说：“对偶婚制是与野蛮时代相适应的”，“随着对偶婚的发生，便开始出现抢劫和购买妇女的现象，这是发生了一个深刻得多的变化的普遍迹象。”^②《周易》中所反映的正是对偶婚制早期的情形。在《周易》编辑成书的时期，这种习俗已经有很大的变化，成为仅是摹拟抢夺的形式，今天我们尚能从某些地区及部分少数民族的风俗中看到这种婚俗。

如云南的景颇族就保留着古代掠夺婚的遗俗，他们称为“迷鲁”（抢婚）、“迷确”（拉婚）、“迷考”（偷婚），他们在征得女家同意的情况下，举行古老的占卜仪式，然后男女双方村寨各推选出主持抢婚的人，于是所谓抢婚就成了求婚的一种重要方式。

云南德宏州的傣族在求亲时，男方一帮人佩刀携铜钱，按女方约定的时间、地点去把姑娘带走，姑娘须假装呼救，其亲友便追出来，男方就一边抛出铜钱引对方捡，一边撤退，然后再讨价还价谈婚事，这时女方就拿出一块大石，作为彩礼要价标志，男方则用大锤击碎，表示还价。

台湾高山族鲁朗人新婚时，娘家人往往用三条麻绳把新娘绑起来藏在隐蔽处，新郎要找到新娘，割断麻绳，才可以把新娘带走。这实际上也是古代抢婚的一种变异形式。

瑶族的一种迎亲方式是晚上新郎和他的亲友举着火把，做出一种抢夺的姿态，而新娘及其亲友也必须手执火把，在半途上截住对方，男方把新娘抢到自己的行列，女方一方则做争夺的姿态，直至新娘新郎跑出队伍，于是双方歇战，饮酒欢宴。

其他如旧时满族的“叉车”、“抱轿”，那是在半路相迎截获新娘的方式；壮族中的“夜婚”；布依族的“戴假壳”（给不落夫家的成婚妇女，强行戴上用竹笋壳和黑布制定的假壳），造成女子落户夫家的社会舆论压力；云南苗族部分地区的抢亲等等，都是古代抢婚的残余。

在汉族中抢婚早已绝迹，但倘若研究某些地区婚礼中一些奇特的习俗的起因，也可能与古代的抢婚有关。如旧时江西吉安地区新娘出嫁，无论冬

^① 李镜池：《周易通义》，第47页，中华书局，1981年。

^②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71、4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夏，都要穿一件厚棉袄，即使是大热天，汗流浹背也不敢脱下，究其原委，是因为新娘一入男家门与新郎拜祖宗天地后，就由其长辈，如伯父、叔父之类抱着走，这期间周围的亲友邻居，无论大小，都可以用木棒击新娘的背和臂，因此新娘不得不穿上厚棉袄以用来抵挡。看来这种习俗跟古代的武力抢婚是一脉相承的。

(2) 媵妾制。陈鹏《中国婚姻史稿》上说：“侄娣即姊妹姑侄同嫁一夫，其制始见于《易》。”《归妹》卦初九爻：“归妹以娣。”同卦六二爻：“归妹以须，反归以娣。”同卦六五爻：“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归妹》卦就是反映了古代姊妹共夫的婚俗，这是群婚的遗迹。媵妾制在春秋时期颇为流行，诸侯、大夫都可以娶几个女子。《诗经·大雅·韩奕》：“韩侯取妻，汾王之甥，蹇父之子，韩侯迎止……诸娣从之，祁祁如云。”祁祁如云，说明随嫁的女子非常多。这种婚姻制度在国外也曾经历过。恩格斯说：“在北美的至少四十个部落中，同长姊妹结婚的男子有权把她的达到一定年龄的一切姊妹也娶为妻子——这是一整群姊妹共夫的遗风。”^①媵妾制是一夫多妻制最早的形式，随后出现男子娶多位不同姓氏的女子，这种习俗即使在后世盛行一夫一妻的时代也未能完全绝迹。

(3) 老夫少妻。不相称年龄的对偶婚在任何时代都是存在的。《大过》卦九二爻：“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同卦九五爻：“枯杨生花，老妇得其士夫。无咎无誉。”《大过》九二爻认为，老头子娶年轻姑娘是完全合理的，是吉事。相反，从九五爻看，老太婆嫁给小伙子，就没有人说好了。这表明上古时期人们不仅从生理上，而且在道德上肯定了老夫少妻。由于上千年来《周易》在经学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因此它给后世的婚姻也造成某些影响。

第三要介绍的是《周易》对我国葬俗的影响。生老病死是生命循环的自然现象，而对死者的安排则体现了一个民族文明。从暴尸野外，任由鸟兽啄食到作出安置体现了文明的诞生，也是世界观的反映。中华民族作为农耕民族，很早就产生了对天地的崇敬，这一点在《系辞下》有明确的表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槨，盖取诸《大过》。”这一段记述了上古时代葬俗的变迁，最早时只是把尸体用草包裹好，挖一个坑，埋掉就算完事，没有堆成坟墓，也没有种树留作纪念，人们也几乎没有什么服丧尽孝的意识。到了后世，人们从《周易·大

^①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5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过》卦中得到启迪，就开始按照死者的身份，分成各种等级，并用棺槨进行埋葬，于是出现了高大华丽的陵墓，也规定了丧礼、丧服及服丧的期限。这些都记载于十三经之一的《仪礼》之中，形成了我国特有的丧葬仪式。其实，“入土为安”的土葬意识是随着《周易》经典地位的确立而不断强化牢固。考古学的成果表明，从春秋战国的古墓、秦始皇阿房宫，到明十三陵、清东陵，统统都是以土葬为优。我国以土葬为主的丧葬与其他民族的火葬、水葬、天葬相比，是有其特色的。这种形式已绵延了数千年，至今仍深深地影响着海内外的华人世界，尽管我们今天在节约土地资源的前提下，不遗余力地宣传火葬，但要真正地清除从《周易》以来就盛行的土葬观念，尚需要时间。

除上所述，《周易》在社会生活中所造成的影响还有许多方面，如林林总总的占筮之风。占筮对社会的影响以负面为主，大到愚昧君王，扰乱朝政，倾败国家，小到唬弄百姓，骗取财帛。当然偶尔也有贤者借占筮为名，指人以金玉良言，如《史记·日者列传》所述：“从古以来贤者避世，有隐居卜筮间以全身者。夫司马季主者，楚贤大夫，游学长安。道《易经》，术黄帝、老子，博闻远见，观其对二大夫贵人之谈，言称引古明王圣人道，固非浅闻小数之能。”

此外，民间还有多种禁忌也都与《周易》八卦相关。如婚娶中不让新娘“见着天”，这是台湾娶亲时的禁忌。新娘上轿后，须悬挂彩色米筛一面，筛面画八卦及太极图，今则以雨伞代之，这是为着避免触怒天神地鬼，另一层含意是盖住新娘头上的气焰。又如旧时很多人家门户上贴着八卦图、太极图，特别是位于十字路口的房屋，迷信者认为有冲风水，往往在大门上钉一面镜子或画上八卦、太极图的甲鱼壳，来作为反射，以抵御或防免灾殃。

受《周易》影响的习俗还有一些。据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介绍，旧时广州人每至七月二十三夜，男女老少都拥进城内惠爱街城隍庙露宿一宵，称之为打地气，并认为凡经过打地气的，就会亨通顺利。为什么会形成这种习俗，胡朴安未能查明。倘若我们熟悉《坤·文言》“坤道其顺乎”，就会很容易理解民众的行为和心理了。又如缠足，这一世上最丑陋的习俗，为何只流行于中国，这应该和古人以《周易》的审美观去衡量并约束女性有关。如《杂卦》开篇便说：“乾刚坤柔”，当这种要求女子以柔顺为美的欲望达到疯狂地步时，便出现了摧残女性形体的缠足现象。相传此风气起自南唐李后主，一说始于南齐东昏侯，缠足给世代代的妇女带来了痛苦和侮辱，直到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缠足这一最野蛮丑陋的习俗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第二节 《周易》与日用

《周易》对房屋建筑及日常器具等方面也有较多影响。人类的住宿习俗可从纵向比较和横向比较两方面去考察。从纵向来看，从天然洞穴至半地穴式，再进入平地的木架建筑。西安半坡时期的华夏初民就经历了从半地穴式向地面木架建筑过渡的阶段。从横向看，与我国北方游牧民族的帐篷型居室、南方许多少数民族的干栏型居室（上层住人、下层养猪牛羊）以及海南黎族或台湾高山族的船型居室比较，汉族的上栋下宇型的居室可以说是代表中华民族住房习俗中的主体风格。这种建筑类型起源于夏商周，在《周易》中也有所反映。《系辞下》说：“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这一段把上栋下宇的建筑模式解释为是《大壮》卦形的象征，这当然是从根本上颠倒了象征物（客体）和被象征物（主体）之间的关系，这是《系辞传》中常出现的一种错误。上栋下宇房屋的特点是在地基上竖柱子，然后架梁脊檩，铺茅草或瓦，形成一面斜或“人”字形、或平顶的屋顶，周围以砖石为墙，木制门窗，为土木结构建筑。这里“栋”，指的是脊檩，“宇”指屋檐。

从我国建筑的风格可以明显地看到《周易》的深刻影响。《系辞下》说：“重门击柝，以待暴客。”这是一种优先考虑建筑物防御功能的理念，为此我们特地选择明显具有“八卦”特色的两个村落作分析。位于广东高要市回龙镇的黎槎村和蚬岗镇的蚬岗村，是两个典型的八卦状圆形村落。黎槎村始建于元明时期，距今有七百多年历史，当年为了防土匪山贼，村民为求自保，便将村落建成每家房门朝内的圆形，外圈约有90间屋，朝圆心每层递减，圆心呈三角形。蚬岗村也有六百多年历史，该村有八个出口，岗顶空地有六棵古榕，含八卦六爻之数，传说为诸葛亮的弟子设计建造，所以当地人自称为“诸葛八卦村”。

九宫形的建筑理念也来自《周易》。所谓九宫，就是离、艮、兑、乾、坤、坎、震、巽八卦之宫加上中央宫。古代的九宫形村落建筑至今留存的有贵州兴义市巴结镇南龙古寨。该寨子建于明初，当时明王朝为了驾驭西南，征调湖北、江西居民迁徙云贵，遂有一股江西人搬迁该地，依山筑舍。该村落以山顶为中心，围绕土山而建，中心有宗庙，往下呈蜘蛛网状向八方延伸，彼此屋檐相联，巷道相通，外人入内，往往不辨出口而迷路。现该村有218户，八百余人，为布依族。另有一个九宫八卦山庄位于浙江兰溪，相传该庄建于北宋明道至皇佑年间，由诸葛氏家族后裔所建。

我国建筑物的格局上也透现出《周易》的等级意识。《系辞上》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受此影响，在我国的传统建筑中以居中面南为尊，东西两厢为次，面北则最低。这种风格以北京的故宫最为典型，处在故宫中央从南到北同一轴线上的有天安门（皇城正南门）、午门（紫禁城正南门）、太和门、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乾清宫、交泰宫、坤宁宫、神武门（紫禁城北门）、地安门（皇城北门）。这些宫殿是皇上办公和生活的地方，门则是皇上与百官履行公务而出入宫与殿的入口，所以建造得格外庄严、崇高和富丽，显示了皇家的尊贵，因此自然地成为整个故宫的中心，而在中轴的主要宫殿建筑群外，另有一系列配套建筑群，为嫔妃、值宿的居所，其高低、形制、色彩、图案等规格，均低于主建筑。这种风格和它所蕴涵的意识与欧洲、中东等地伊斯兰的城堡追求纯自然美的情趣是大有不同的。

我们还发现在一些用品上也装饰八卦图案。1974年11月下旬，在浙江省衢州发现了一座南宋古墓，墓主是南宋易学家史绳祖，墓中出土了绘有八卦图形的文物两件。一为八角形银杯。现存杯已残，然仍可见内底部是两条首尾相接的鱼和水藻，鱼呈太极阴阳图像，水藻构成S形太极曲线（见图6-2-1A）。外周八边像八卦，每边的外沿绘八朵小花，共六十四朵，象征六十四卦（见图6-2-1B）。这些图案的全部意义是表示太极生八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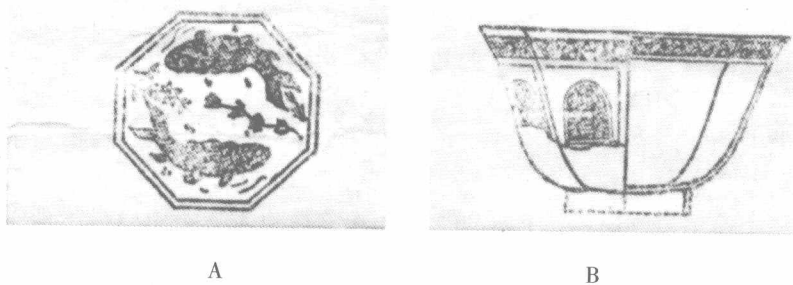


图6-2-1

二是太极先天图银杯。该杯为一只假圈足夹层杯，腹部凸弦纹二周，以凸出直纹分为八区，饰八卦纹。外层口沿刻方块纹一周，计六十四块，象征



图6-2-2

图6-2-3

六十四卦（见图6-2-2）。此杯的图像还显示了周敦颐太极图的涵义，如它的底部阴刻弦纹三圈，一直线将底部分为两半（见图6-2-3）。

在各圈的半面交叉相间针刻黑纹，以寓阴阳；假圈足为一空圆，象征无极，内部底层刻金、木、水、火、土五行图像，为五气朝元（见图6-2-4）。杯夹层为两个空圆套在一起，表示“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圈”和“万物化生圈”。这四部集中起来，即是“太极图”。



图6-2-4

这个杯形也象征邵雍的先天图，在此就省略不述了。

此外，一些钱币上也铸有八卦之图案（见图6-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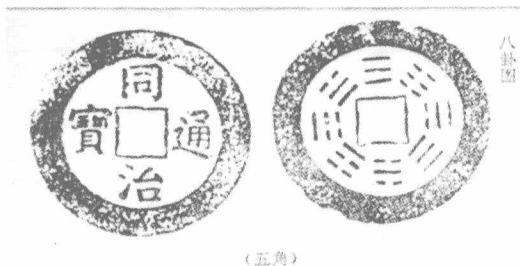


图6-2-5

如图是一枚清同治年间的厌胜钱。同治是清穆宗年号。据《中国古钱辞典》介绍，厌胜钱亦称压胜钱，是一种铸成钱币形式的吉利品或避邪品，供佩带玩赏，并不是通常的货币。它的形式通常是正面有钱币上的文字和各种吉祥语，如“千秋万岁”、“天下太平”等，背面有各式图案，如星斗，八卦、龙凤、双鱼、龟蛇等。

除上所述，即使在今天，我们仍时常看到广告上、服饰上以及种种器具上都有选用太极八卦的图案。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解释，说明人类对神秘的八卦的喜爱和崇敬之情。

第七章

《周易》与国术、兵略

中华武术扬名海内外，中国古代兵法也为世所推重，其实，这两者都深受易理影响。下面对这种影响略作介绍分析。

第一节 由太极拳、八卦掌谈易理对国术的推动和发展

中华武术享誉全球，相传其武功之刚者，一举手可以断铜铁而透坚石；其武功之柔者可以蜷身絮团，刀斫斧砍而不能伤其毫发；其武功之奇者，可以空手夺人刀剑；其武功之巧者，可以在一指点间使人颓然若废而失去抵抗能力。正如陆鸿吉先生在六十多年前所说：“吾国国技之高尚伟大，允为世界独步。”^①那么这一伟大的技艺究竟起于何时，盛于何代呢？

关于武术的起源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泛称，可一直追溯到原始社会，当时人们为了生活和自卫，在狩猎、觅食和抵抗毒蛇猛兽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徒手和使用简陋工具的格斗和扑杀技能，这一技能世代相传，在《诗经》中称作拳勇，春秋时代称武艺，战国称技击，汉称技巧，明清称技艺、技勇，现当代称国术、国技，泛称为武术。另一种说法是就某一门派，或某一拳种而言。一般认为少林拳起源于南朝梁，武帝时期的达摩禅师创十八罗汉手及《易筋经》十二式，这就是少林拳的开端。太极拳也几乎在此同时产生。相传梁武帝时，有一个叫程灵秀的，向韩拱月学习太极拳。但另一种更流行的说法是宋代武当道士张三丰创太极拳。长拳出自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形意

^① 陆鸿吉：《太极拳浅说·序》。

拳之祖是南宋抗金名将岳飞。这些说法都是武林中公认的。由此看来，作为科学化、系统化的搏击技巧应该出现在公元6世纪至10世纪之间，而它的鼎盛时期则在明清。明清两朝出现很多武学大师、专著和新拳种，关于武术的传奇广见于书籍，泛传于民众，民间习武比比皆是。特别是晚清至民国初，刘百川在香港以子母鸳鸯连环腿击败英国大力士，孙中山先生当时在场，亲书“尚武精神”横匾一额，嘉奖他为中华民族争气扬威。韩慕侠在天津六国饭店挫败俄国拳师康泰尔，霍元甲更是力挫俄国拳师奥比音和东洋武士。这些都显现了晚清时期中华武术的崇高声誉。

现今流传下来的武术门派很多，但从总体看可分为内外两家。外家宗达摩，以少林拳为主，其他如猴拳、罗汉拳、二郎拳、韦陀拳、六合拳、大小洪拳、查拳、潭腿、劈挂、花拳等，都是由少林拳衍生。内家拳亦称武当门，门派较少，今太极拳、八卦掌等均属内家范围。值得注意的是内家拳种的诞生与《周易》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据1921年许霭厚《太极拳势图解》介绍：“元之季世，有隐君子者曰张三丰先生，本儒家太极之理，融会各家之长，纳五行八卦于拳术、步法、方位之中，而以太极之阴阳刚柔动静喻其作用，提纲挈领，名为内家。”张三丰为什么会把易理和拳术联系起来呢？据传说，洪武二十七年（公元1394年），张三丰“入湖北武当山，与乡人论经书谈说不倦。一日在屋诵经，有喜雀在院，其鸣如争论。真人由窗视之，雀在柏树，如鹰下观，地上有一长蛇蟠结，仰视，二物相争。雀鸣声飞下展翅扇打，长蛇摇首微闪，躲过雀翅，雀自下随飞树上。少时性燥，又飞下翅打，长蛇又蜿蜒轻身闪过，仍作盘形，如是多次，并未打着。后真人出，雀飞蛇走。真人由此而悟，蟠如太极，以柔克刚之理，由按太极变化而粗成太极拳”^①。历史上曾经有不下十几个叫张三丰的，有宋代的，也有元末明初时，武术专著中常提到的内家拳祖师即是其中一位。张三丰把太极拳传王宗岳，宗岳传温州陈同，河南蒋发，从此太极拳分成南北两派。南派相继出现几位名师，如清代王征南、甘凤池，之后湮没无闻。北派由蒋传至河南怀庆府陈家沟的陈长兴，长兴下传其子侄及杨露禅、李伯魁。之后由陈式太极拳衍生杨式（杨露禅创），又有杨式衍生吴式（清末河北人吴鉴泉创）、武式（清末河北人武禹襄创）、孙式（清末河北定县人孙禄堂创）。今社会上皆把河南温县陈家沟当作太极拳的发源地，提出其创始人是一位叫陈王廷的明末武将，他以戚继光《拳经》为蓝本，融合长拳、十三式、炮捶等拳路，吸收王宗岳《太极拳论》的理论，创立太极拳。这种说法目前宣传得十

① 杨澄甫：《太极拳使用法》，原序，文光印务馆，1931年。

分广泛，但是在六十多年前的一些太极拳名家的著作中，如《太极拳浅说》、《太极拳势图解》、《太极拳术》、《太极拳使用法》等，都未提到这方面的资料。看来，似乎由陈王廷创太极拳的说法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

太极拳分文武二式，文可以养身修性，武可以防身克敌。太极门中有卓著武功的名家甚多，现仅举南派张松溪和北派杨露禅为例。张松溪约明嘉靖年间浙江宁波府人，平日谦谦如儒者。时倭寇作乱，官府招募七十多名少林僧兵击贼。少林僧闻松溪大名，一到宁波就希望相见，则巧在酒楼上相遇，当场双方约定比试武功，一僧跳起脚踢，被松溪闪过，借力一推，跌出楼外。于是众僧皆服。又有一次，他被一帮青年围住，在他们再三恳请下不得不露出绝技。当时他已七十多岁，用手辟开数百斤的圆石。这就是太极拳家所说的极柔软然后极坚刚。北派太极名家杨露禅，河北永年县人，学成后游京师，曾以艺会友。而当时号称武术之乡名家辈出的燕赵之地，竟没有一人可以超越他，这也可以看出太极拳的非同一般。相传当时京西有一个姓张的富翁，性爱武，家中请了三十多个镖师。当他听到杨露禅大名，就叫朋友去请，来后一看，是一个穿着布衣，一副老实相，不满五尺的瘦小的人，热情就凉了一大截，宴也不丰盛，礼也不恭敬。杨露禅也不在意。闲谈中，姓张的就问：“太极拳能打败人吗？”杨知道再谦虚下去无异自招其辱，就答：“太极拳可以打败所有的人，除非他是铜浇的、铁打的、木造的。”张又说：“我手下有一位姓刘的武师，能力举五百斤，可以玩一次吗？”杨答：“不妨试一试。”于是双方摆好架势，刘武师猛击一拳，拳风飕飕，杨露禅等临近，以右手引其落空，以左手拍之，刘武师顿时跌出三丈外。这时姓张富豪顿开眼界，惊叹：“真神技啊。”马上叫厨师换上满汉全席，恭敬如师。杨露禅还有一件轶事，也是饶有趣味，当时杨在京师，有僧前来拜访，请教武功。刚好有一只燕子飞过，杨迅速起手捉住，放在手掌上，任凭鸟飞。然燕子刚振翅欲飞，杨稍微将掌忽降忽开，燕不能飞去。因为无论何种雀鸟，必先足蹬劲才能飞。现掌忽降，燕足无着力处，所以说飞不走。僧十分惊讶地说：“技艺是何等神奇。”杨笑着说：“太极拳行功稍久，通体轻灵，一羽不能加，蝇虫不落，达到这种程度，就能如刚才的情形。”以上这些故事都说明了太极拳功能的伟大。

太极拳，顾名思义就是从易学的太极而悟生出来的。宋元明时期太极图、易理已经广泛流传在社会上，这给了一部分武术家某些启发，他们认为天地是一个大太极，人身是一个小太极，于是就吸收气功、导引、吐纳之术，运气于全身，就如《系辞下》所说的：“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以培养自身的内功。这种内功即我们今天所说的瞬间爆发

力。这种把人的全身视作一小太极，运气周身，意到气至的练功方法便是太极拳最基本的特征之一。

在拳法的发展变化上也充分运用易理。王宗岳《太极拳论》说：“太极者无极而生阴阳之母也。动之则分，静之则合，无遇不及，随曲就伸，人刚我柔谓之走，我顺人背谓之粘，动急则急应，动缓则缓随，虽变化万端，而理为一贯。”拳家把不动看为无极，已动就是太极，就会分出阴阳。临阵对敌时，让敌人围着自己转，让敌人先动手，这叫做敌在卦外行走，我占太极之中点，我主静稳也，敌主动燥也。燥火上升而不能忍，久必攻上来，我就占主动，这就是太极生两仪、四象八卦、定而不可移的基础理论，从而形成了太极拳以静制动，以柔克刚，避实就虚，借力发力的特点。相传当年太极名师杨露禅与八卦掌大师董海川在肃王府切磋武功，两人都习内家功，都擅长以静制动，于是谁也不敢先出手，拳拳相对，转圈子对峙了很久，才勉强由一方先出招。

练太极拳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叫做推手，以往也叫“搗手”、“打手”，是练习太极拳技击的重要步骤。它由两人合作，互相搭手缠绕。推手练得好，一举手，一投足，便能控制对方，有四两拨千斤的功效。而太极推手就是根据“太极生两仪，有柔有刚”的理论和仿效太极图的形象而创设的，太极名师杨澄甫 1931 年著《太极拳使用法》中有张三丰先师传拳谱及图（见图 7-1-1）。

太 极 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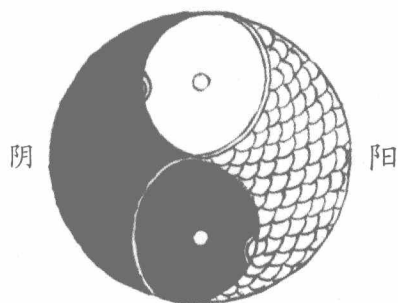


图 即 出 即 化 济 生 义 太
形 太 也 由 太 千 刚 阴 极
之 极 推 此 极 变 柔 阳 图
之 手 而 拳 万 相 相 之

图 7-1-1

从这幅双鱼形太极图，就可以看到两人练太极推手过程中阴阳虚实盈缩进退变化的规律。

从太极拳还衍生出太极枪、太极刀、太极剑，相传太极枪也是张三丰所传。传说他在西方接云山凌霄峰见金光万道，瑞气千条。寻至青溪洞口，突然窜出两条金蛇，击落，则觅得两根七尺五寸的长枪，并获书一卷。这就是太极枪和枪谱的来历。当然，传说归传说，事实归事实。太极枪又称太极粘枪，从杨澄甫《太极拳使用法》所介绍的太极枪来看，与太极拳一样，亦分十三式，它最大的长处是以意运气，用内功。杨露禅父子均能使太极枪。据介绍杨健侯当时在一个姓李的大官家中为宾客，彼此经常闲谈些武功。这时有一个叫王大力的关中大汉颇为不服。王大力平日能举五百斤，日行三百里，枪法刀法都出众，在关中一带授艺，门下有五百多弟子，也称得上一位豪杰。当时他对杨说：“先生的太极拳久闻大名了，不知先生的太极枪如何？”杨健侯笑一笑，随后两人一起拿枪到院中比试，王先用力刺杨胸前，杨侧身以枪架住而化其劲力，王用力向下按，仍好像按在空虚上而发不出力，急忙抽枪，杨趁势用铲枪式震激对方，使王的枪杆猛然回弹，击中自家门面，跌出六七步之外。这时王惊叹杨的神力，心服口服，诚心诚意地拜杨为师。

太极系列中的太极刀、太极剑也具备“柔中寓刚，绵里藏针、缠绵不断，滔滔不绝”的特点，同时还吸收了刀法、剑法中各自特点。

八卦掌，顾名思义也是深受《周易》影响而产生的一种拳术。这个拳种以掌代拳，以掌法变换和行步走转为其特点。其拳术初起时，拳师往往以卦注解拳注，以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八卦代表基本八掌（蛇形掌、单换掌、双换掌、顺势掌、扣掌、抱掌、回身掌、合掌），每掌又变为八式，共六十四掌，与八卦之重卦恰类似，所以取名为八卦掌。它的步法走转行圆，步伐灵活，身体要以腰为轴，拧转多变，所以又称游身八卦掌、八卦连环掌。拳谚说它：“形如游龙，视若猿守，坐如虎踞，转似鹰盘。”八卦掌也属内家拳，以静待动，运气发劲，其掌法变幻莫测，往往令敌手无从捉摸。八卦掌是清代盛兴的四大拳种（即形意、八卦、太极、迷踪）之一，相传是河北文安县董海川所传。董自幼爱好武术，精罗汉功，青年时期游历天下，遇山中道士毕澄霞，拜为师，学艺三年，归后，融合各家拳术，创八卦掌。后触刑律，受腐刑，供职于京师肃王府当拳师，八卦掌便由此传播开来。他曾收徒七十二人，据说他临死时，躺在棺中，徒弟们都抬不起。这时他回过头对弟子们说：“我真是对不起你们了，你们所学的都还不到我功夫中的十分之一。”说完，就咽了气，享年84岁。

中国拳术中其他深受《周易》影响的拳种有长寿拳，又叫九宫太极拳，它也是从易学原理变化而来，根据太极变两仪，两仪变四象，四象变八卦，这样排列组合，从一到九，千变万化而成为九宫，再由九宫演变为若干动作。它是我国古代的一种有效健身方法。还有一种叫两仪拳，又名太极快拳，其内容、基本要求类似太极拳，却又比太极拳的难度大，招式更宽阔开展和紧凑。又有一种叫四象拳，则是把太极、两仪、形意、八卦四种拳术的精髓融会贯通，加以提炼而编成的。

由于部分旧拳种的湮没，我们一时难以统计出一个明确的数字去说明受《周易》影响的拳种在整个拳术范围中占多大的分量。然据粗略估计，从数量上可占到5%~10%左右，而从知名度上那就占更重的地位。如太极拳以其迷人的魅力深受各国人民的喜爱，太极拳爱好者遍布世界各地。最后我们还是要说，《周易》终究不是拳书，没有《周易》武术依然存在。但是不可否认，《周易》对武术的推动和影响是毋庸置疑的，没有《周易》，就不可能出现一批以易理为理论和模式的拳种，就难以出现一批刚柔相济的内家拳。

第二节 独步世界的中华用兵术

在军事科学领域，中国古代军事理论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我国在先秦时代就诞生了一个完整的军事理论体系——孙子兵法，并已经应用于当时诸侯征战的军事斗争。这部杰出的军事著作传播久远广泛，至今仍具有巨大的影响。美国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约翰·柯林斯在他的《大战略》一书中说：“孙子是古代第一个形成战略思想的伟大人物，他于公元前400—前320年间写成了最早的名著《兵法》。孙子十三篇可与历代名著包括二千二百年后克劳塞维茨的著作媲美。”^①更重要的是，我们不仅有孙子兵法，从西周到晚清，我国尚有存世兵书达四五百种之多。孙子兵法只是我国众多兵学典籍中最出色、影响力最大的一本。这足以证明中华民族的智慧超群。这里想探讨的是，易学易理对兵学究竟有何影响呢？

古代军队中大多有军师（谋士）或术士，用兵时往往占卜算卦，以明吉凶。甚至还有一书叫《军占杂事》，专谈军情的占卜。这些固然也表现了《周易》在军事上的影响，但那是浅表性的，所以这里不准备多述。

《周易》作为一部上古典籍，是当时人们生活思想的反映，所以说军事

^① 陶汉章：《孙子兵法概论·简要说明》，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

自然也是《周易》所反映的一个方面。比如书内讲到战争的几种形式，据李镜池、胡朴安等学者研究结果，以为《师》卦讲军队的纪律、军队的组织、作战的地形；《同人》卦写战前的准备，讲如何进行伏击战；《离》卦写对敌的警戒、偷袭和反击；《晋》卦写战术战略。这些卦爻辞尽管表现了早期战争的规律，充满了朴素的军事辩证法，然而也只是揭示了一般的军事原则，所以我们仍然不对它作深入的剖析。

要介绍独步世界的中华用兵术必须切入《孙子兵法》。正如明代茅元仪《武备志·兵诀评》中说：“前孙子者，孙子不能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这是说孙子之前的兵法要点统统包括在孙子兵法中，而孙子之后的军事学著作统统是孙子兵法的延伸。而《孙子兵法》与《周易》哲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可以这样说，孙子兵法易理在军事学上的演绎和发挥，我们可以通过《孙子兵法》来阐述易理，方能明白《周易》对我国军事学建设的贡献。

《周易》学说的根本便是阴阳，《说卦》上说：“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曰阳，立地之道曰柔曰刚。”反映了天地中一切事物，也包括军事，都属于阴阳、柔刚的范畴。这种意识引进军事中便指刚柔、奇正、进退和攻守的变化。

在兵法中刚指用武力攻克，柔指用政治、外交手段解决。《孙子·谋攻篇》中有一段名言：“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此谋攻之法也。”这是说用兵不是一味恃武力攻伐杀掠，征服对方，能够以武力为后盾，通过非武装冲突的办法解决问题，这才是最好的。当然政治解决也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对方确有实力，而我凭智谋、道义，去使之折服；另一种是我有强大的实力，于是不使用武力而迫使对方就范。但无论处在哪一种情况，能不用兵则对国对民都是有益的。孙子的这个论断正是汲取了上古时代许多杰出政治家对战争的一种共同看法，代表了中华民族高尚的战争观和战略观，反映了中华民族崇尚和平、反对穷兵黩武的善愿。据《尚书·大禹谟》载：早在公元前五千年，黄河流域的华夏族与长江流域的苗族发生了冲突，舜就派禹去征讨苗民。禹率领众部落酋长，首先指明了苗的罪状，说：“诸位都听我说，苗傲慢昏庸而愚蠢，一点不讲道德，造成小人篡权，君子下台，百姓也受尽欺辱，现在上天降给它灾难，我们团结一心，去讨伐它，一定有功。”但攻了一个月，苗仍然不服。这时有一位叫益的部落首领来帮禹出谋划策，提出以德使敌人屈服的办。于是舜亲自向上天祷告，禹就班师回朝，他们通过歌舞来表示自己弃战和睦邻的诚心。这样过了两个多月，苗就主动地前来归附。这或许是一件被儒家美化了的历史事件，但它也可能是人类史上最

早的通过偃武修文而达到使敌方臣服的事件。以非武力手段去制止战争，这样的事例在历史上并不罕见。孔子曾说过：“不越樽俎之间，而折冲千里之外，晏子之谓也。”这是说能够在一次宴席上，通过饮酒这件小事，就挫败了敌人在千里之外所策划的战争预谋，这说的就是晏婴。晏婴是春秋时期齐国的大臣，当时晋国想进攻齐，就派大臣范昭出使齐，目的是侦察齐国的政治情况。在宴席上，范昭故意请求用齐国君的酒杯饮酒（臣用君物，这在古代是一种越礼的行为），齐君答应了。然到范昭饮完，晏婴就接过君王的杯子，另换上一个酒杯给范昭斟酒。过了一会儿，范昭又点周天子所用的乐曲，要乐师演奏（这在古代也是越礼行为），又为乐师拒绝。于是范昭便退席了。当时齐君十分担忧，以为使臣回国，在中间挑拨，将带来战祸。而事实刚好与齐君的判断相反，正是由于晏婴与乐师的机智和刚直，让敌方有所畏惧，从而打消了入侵齐国的念头。这件事得到了孔子的高度赞赏。通过政治活动，解决或暂时地度过眼前危机的事件还有“烛之武退秦师”、“墨子使楚”、“鸿门宴”等，都是历史上著名的故事。

在历史的进程中，尽管人类渴望和平，呼唤和平，然而战争的乌云依然没有消失。20世纪50年代抗美援朝与板门店谈判、南斯拉夫内战与欧安会的调停，都是以柔克刚，以政治手段调解武装冲突的一种手段。随着科技的进步，现代战争在地域上、兵力上、武器上已不再是往日规模，它的破坏力不仅危害一个战区，还波及四周。尤其是核武器的存在，甚至足以使这个星球消失。因此人们更迫切希望以非武力方式消除战争因素，所以“不战而屈人之兵”就成为各国战略家共同思考的热点。

20世纪60年代，英国著名战略家李德·哈特在《孙子兵法》英译本序言中说：“在导致人类自相残杀、灭绝人性的核武器研制成功后，就更需要重新而且更加完整地翻译《孙子》这本书了。”西方战略家在核武器时代对《孙子兵法》的重新认识和吸收表现在两个方面。①在20世纪50—60年代，美国凭借其核优势，采取了“大规模报复”的核威慑战略，即把目标对准对方的大城市。后来美国的战略研究中心斯坦福研究所主任福斯特发现，苏联的核弹头都对准美国的核设施和基地，站在孙子兵法的角度看，后者是“伐兵”思想，能达到一次性摧毁对方，从而取得胜利。前者则是“伐城”思想，只能削弱对方，却不能从根本上打垮对方，所以是一种拙劣的战略。于是福斯特提出按照孙子战略作修改的建议，采取“相互确保摧毁”的战略，促使美国总统卡特在1980年签署《总统第59号行政命令》，新战略将把打击苏联境内的军事目标放在首位。②促使星球大战计划的诞生。由于核威慑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效果，核军备竞赛逐级上升，美国终于在1983年提出了

“战略防御倡议”（即星球大战计划），从核威慑转向相互确保生存，其实质就是要发展一种攻防兼备的战略系统，以起到不战而胜的威慑作用。我们说核技术的进步是科学高度发展的标志，而核武器的大量制造又是人类有史以来遇到的自己亲手造成的最严重的一次危险，对此，有良心有识见的科学家们一开始就遇见了这样的情形。美国今天的核战略思维竟与反映了易理的孙子兵法思想相通，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真正的战争》一书中就援引了孙子兵法中的“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以阐明核战略的原则。这些都深刻地反映了我国古代的军事理论对今日世界的深刻影响。

《孙子兵法》以及其他军事著作中还引起国外军事家高度重视的便是机动灵活的战术，一个美国人曾这样比较中美军事人员在思维形式上的差别：“与中国不同，美国总是强调并依靠战略需要的物质方面，而不是心理方面。当美国军事计划人员认为可能有必要用兵时，他们更多地是注意敌方的能力，而很少考虑敌方的战略与意图。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在战略上倾向于强调直接路线而不是间接路线。”^① 这表明美国的军事家往往偏重于唯武器主义，而中国军事家则兼重于战斗人员的素质。另一个美国人则坦率地承认了美国军事上的失败。他说：“我真诚地相信，如果我们近代的军政领导人研究过这部天才的著作（《孙子兵法》），越南战争就不会是那种打法，我们就不会有朝鲜战争的失败。”^②

法国名将福煦元帅曾说过：“战争艺术与其他艺术一样，有其规律。否则，战争即不称其为艺术。”^③ 什么是中华民族的军事艺术呢？《孙子兵法·计篇》指出：“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这就是说，打仗要靠计谋。后人把孙子兵法归纳为三十六计，并著有《三十六计》一书。值得注意的是，其每计的解释辞都以《周易》的语辞为依据。或许这正反映了《周易》在军事学方面的影响。下面举两例作介绍：

① [美] 乔纳森·波拉克：《孙子与美国军事思想》。

② [美] 詹姆斯·克拉维尔：《在〈孙子兵法〉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的书面发言》。

③ 日本陆上自卫队干部学校修亲会：《作战理论入门·序论》，战士出版社，1982年。

(1) 瞒天过海计。《三十六计》说：“备周则意怠，常见则不疑。阴在阳之内，不在阳之对。太阳、太阴。”意思是，尽管戒备周密，也终有懈怠的时候，于是就会对一些常见的事物不再产生疑虑。从《周易》角度分析，就是阴（秘密）在阳（公开的事物）之中，而不是和公开的形式相对立的。在军事上一些最常见的公开的事物，其中往往就隐藏着最重要的机密。此计得名于我国唐初的一个战役，当时唐太宗李世民率兵征辽东，至海边，见茫茫大海，不知如何渡海，心有悔意，这时薛仁贵生一计，派人造大船，四周用锦缎围住，令人不疑为船。然后设法引太宗上船，等到太宗觉悟，船也已将到达目的地。

1973年10月的第四次中东战争是当代交战双方都运用瞒天过海计的一个重要战例。一开始埃及成功地运用此计将部队运抵前线并瞒过了对方。直到1973年10月6日（星期六）凌晨四点钟，以色列国防部长达扬才接到电话，通知他“根据刚收到的情报，就在今天日落之前，埃及和叙利亚将发动一次战争。”^①这时离战斗爆发尚有十个小时，以色列出于政治策略，没有运用空军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也没有动员起大量的直接防御所需要的预备役兵员。于是埃及军队迅速渡河，粉碎了以方苦心经营了多年的巴列夫防线。战斗进行到第八天，以色列军队亦以瞒天过海之计派出一队操阿拉伯语的士兵，穿埃军服装，用埃军装备，乘坦克从大苦湖正北的德维斯瓦，穿过埃及各部队，越过运河，向南朝苏伊士湾和向西推进，深入到埃军后方，控制了依斯梅利亚——阿塔卡山一线，从而切断并包围了埃军主力第三军，使战争出现了逆转。这一计策充满了神奇的色彩，正如已故埃及总统萨达特所说：“出现了缺口，即以以色列部队在各军的间隙中渗入到东岸，这是历史上的一个著名的军事错误。”^②“犹太人在我们部队之间制造的杂技性的缺口面前，埃及总参谋长的神经于十九日崩溃了。”^③

(2) 声东击西计。《孙子兵法·势篇》指出：“故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意思说：为了调动敌军，故意做出佯攻的势态，敌人必然会有所反应。在《三十六计》中用《周易》的术语加以阐述，指出“敌之乱萃，不虞，坤下兑上之象，利其不自主而取之”。乱萃，出自《萃》卦初六爻象

① [以色列] 摩西·达扬：《达扬自传》，第341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

② [埃及] 安瓦尔·萨达特：《萨达特回忆录》，第219页，人民出版社，1978年。

③ 同上书，第231页。

辞“乃乱乃萃，其志乱也”。谓像野草一般乱蓬蓬，形容制造假象，造成混乱，使敌军指挥员无法判断而不能做好准备。这种情况在卦象上叫做坤下兑上，即沼泊湖水（兑）在大地（坤）的上方，有溃决的危险，象征无远大目标和正确指挥，应利用敌方失去控制力的时机而消灭它。

1982年英国在与阿根廷进行的争夺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的圣·卡罗斯港登陆战就是运用声东击西计的典型战例。这场登陆战是击败阿根廷军队，夺取该岛首府的重要一环。英国舰队兵分两路，一路是佯攻，一路是登陆。佯攻部队由两艘航空母舰“赫尔蒙斯”号和“无敌”号带领，在数艘驱逐舰和护卫舰的护卫下，在20日晚往南行驶。向南部沿海阿军据点发炮，并派遣小分队登陆佯攻。数小时后，舰队即驶离到另一据点，如法炮制，造成阿军认为英军将在南部登陆的错觉。与此同时，由20艘兵舰组成的登陆部队向北部的圣·卡罗斯港出发，21日晚在先前偷偷登陆的小分队接应下，仅用4小时就完成了了一千人的登陆任务，建立了巩固的滩头阵地，为夺取马岛战斗胜利迈开了关键的一步。在这次战斗中，英军之所以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根据避实就虚的战略，选择了一个极好的登陆点，又采取了佯攻的战术，迷惑了阿军，使阿军一时找不到英军的主攻方向。

从以上两计中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在今天的战场上，易理仍体现在所有的战例中，我们仍然可以运用《周易》去观察、探索作战的技巧，这正是《周易》深奥而又如此吸引人的地方。

《周易》对我国古代军事学的另一个重大的贡献就是阵法。以阵对阵曾是古代打战的主要方法，阵法是古代战略理论极其重要的一个领域。它通过几何图形的布阵，使军队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战斗力，并有很大的凝聚力。通过战斗队形的变换而阵可以变动，它既用于演阵，也用于战斗。唐代李筌《太白阴经·阵图总序》上说：“黄帝设八阵之形，风后为演《握奇图》，云以正合、以奇胜，或合而为一，或离而为八，聚散之势，节制之度，复置虚实二垒，力牧以创营图。其后秦由余，蜀将诸葛亮等并有战图，以教人战。夫营垒教战有图，士卒知进止，识金鼓。”古人经常把很多事物的起源上溯到黄帝时代，事实上我们今天看到的阵图仅是《握奇经》、唐《太白阴经》、宋《武经总要》等书籍所载。下面就这些古籍介绍一些古阵法与《周易》相关的知识。

从《握奇经》的取名来看，握奇就是掌握机动兵力，掌握灵活的战术。《周易》中有阴阳奇偶的概念，阳为奇，为刚。表现在阵法上奇指阵形内部可以迅速变换为新阵的机动部队，同时它又是一种进攻力量，可以利用变换阵形，造成新态势实施突击。最早的阵图是方阵，分前后左右中，后来发展

为九阵，即前后左右四正兵，是保持阵脚稳定的基本部队，称阵脚兵。东北、西北、西南、东南为四部，是可以进行机动突击的四奇兵，也称做战队，或阵内战兵，加上大将居中掌握的机动部队中军，共九阵。一阵按12 500人算，50 人一队，总共250 队，其中阵脚兵175 队，奇兵75 队，这个方阵队形整齐，大阵包小阵，大队包小队（阵间容阵、队间容队），无论攻、防、进、退、都要求保持方阵的严整。无论敌人从哪个方向进攻，都能保持一定的兵力迎敌。《三国演义》中描写得神秘兮兮的八阵图，其实就是这个方阵的模式。

古代的阵图一般都从《周易》的角度去叙述。如《武经总要前集·制度八》上说：“圆阵图，黄帝五行之土阵，于卦属艮宫，于五音属宫，为勾陈则孙子之圆阵，吴起之车箱阵，诸葛亮之中黄阵，以其居中位者土也。”

古代的战阵有十阵说，1972 年4 月在山东临沂银雀山发现的西汉前期墓葬中，其出土的《佚书丛残》目录中列有十阵、方阵、圆阵、踈阵、数阵、锥行之阵、雁行之阵、钩行之阵、玄襄之阵、火阵、水阵。后有八阵之说，即裴绪命名的方、圆、牝、牡、冲方、罟罟、车轮、雁行八阵。八阵的阵形、兵力及其配备布置可参见《武经总要前集》。

古代虽有阵法，然打起仗来往往又不依阵图，正如唐李筌指出：“其应敌战阵不可预形，故其战胜不复而应形无穷，兵形象水火，因地而制形，兵因敌而战胜，能与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则其战阵无图明矣。”^① 其言固不无道理，然战阵在古代战争史上所起的作用、所居的地位是不容抹杀的。我国古代阵法也被运用在国外战场上。据日本陆上自卫队干部学校修亲会著的《作战理论入门》记载，1572 年12 月日本三方原会战中，武田信玄以鱼鳞队形向对方发动进攻，并取得胜利。鱼鳞队形即古阵法中的车轮阵，源于中国。孙子叫车轮阵，吴起取名冲阵，诸葛亮称握机阵，这是一种发挥纵深战斗力以制胜的战术。

我国明代的军事理论家赵本学是研究古代阵法的杰出将领，他撰写了《兵铃内外篇》，其内篇共四卷，把明代以前经过实战验证而又有一定影响的22 种步兵阵法绘成图，总结出规律法则，尤其重要的是他运用易理推演阵法。其外篇共三卷，则又把汉唐以来不懂兵法的文人俗儒们纯凭理性思维推导出来的十七种阵法列出，并加以批评，这一部书可以说是我国古代用《周易》研究阵法的重要著作。

① 李筌：《太白阴经·阵图总序》，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

第八章

《周易》与语言、文学、艺术

广大弥漫的易学气氛长久地笼罩着中华大地，这个民族的语言、文学、艺术都表现出它的风味特征，是势所必然。

第一节 《周易》与语言

语言学由语音、词汇、语法、修辞、文字组成。下面我们从语音、词汇、文字三方面分别介绍《周易》的影响。

首先，语音是一种人所特有的自然现象，语音学固然是对语音的一种客观描述，但语音学体系及其术语的创立却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思维与文化的特色。中国传统语音学称之为音韵学，该学问历来有“无字天书”之称。它创建于隋唐年间，受到当时舶来品梵文的启迪，之后出现了韵书、反切注音等新事物。根据汉语音有声调特点，音韵学中就引进易理阴阳意识，不仅出现了阴平、阳平、阴调、阳调等术语，并依据女声尖、男声低沉特点，把方言中发音稍高的音定为阴调，发音比阴调稍低的定为阳调。还把【m】、【n】、【ŋ】为韵尾的称为阳声，把韵尾是元音或没有韵尾的韵母称作阴声。音韵学的诞生，为中华民族诗、词、赋韵文以及说唱文学的发展与继承奠定了坚实的基石。

其次，词汇是构成语言的材料，它的来源非常广泛，而其中有一条重要的途径，即出自古代重要典籍。《周易》作为我国最古老的一部典籍，它的很多语词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历数千年仍焕发出珠玉般的璀璨；另一方面，后人在彻悟易理的同时又衍生出很多新词，以上二者，都成为现代汉语

的组成部分。下面不妨把部分词语罗列出来。

词语：

元亨
潜龙
文明
性情
纯粹
事业
屯遯
屯蹇
盘桓
反常
失常
高尚
消息
硕果
反复
反复
饮食
聪明
动静
朋友
讲习
制度
独立
和平
革命
交易
自强不息
夕惕若厉

词义：

大通、大吉
喻有才能隐居者
文采光明；明察，今转义，指文化水平高
人的禀性和气质
纯正不杂
功业、成就
难以前进
艰难，不顺利
徘徊、彷徨
违反常规
失其常道
道德品质崇高
增减、盛衰、今多指音信、信息
喻重大利益
重复，翻来覆去
往返
吃喝、食物
视听灵敏，今多指智商高
运动与静止，今又指情况、消息
彼此志同而关系亲密的人
互相讨论学习
法令、礼俗等规范
与众不同
没有战争
指改朝换代
以物换物，做买卖
自己不断努力向上
朝夕戒惧，如临危境

出处：

乾
乾
乾、明夷
乾
乾
坤
屯
屯、蹇
屯
屯
需
蛊
丰、剥
剥
乾
复
颐
鼎
艮
兑
兑
节
大过
咸
革
系辞下
乾
乾

云行雨施	形容云飘雨落	乾
云龙风虎	喻同类事物互相感应	乾·文言
群龙无首	喻无首领	乾
亢龙有悔	喻物极必反	乾
一朝一夕	指短时间	坤
任其自然	听其自然发展	坤六二爻
天造草昧	天地之初是混沌蒙昧	屯
泣血涟如	悲苦之泪不停地流	屯
不速之客	不请自来之客	需
夫妻反目	夫妻不和睦	小畜
革面洗心	自我忏悔，改变形象	革、系辞上
匪夷所思	不是通常所能想象的	涣
突如其来	突然来到	离
从一而终	自始至终紧随一人	恒
羝羊触藩	喻进退两难	大壮
乐天知命	谓安于命运之安排	系辞上
各得其所	各如其所愿	系辞下
先难后易	劳苦在先方便在后	系辞下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今指对待同一事物，其见解因人而异	系辞上
乐则行之，忧则违之	犹喜欢的就做，不喜欢的就避开它	乾
在上不骄，在下不忧	富贵不骄，贫贱不忧伤	乾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喻志趣相同者互相呼应	乾
二人同心，其利断金	喻团结一致力量大	系辞上
同心之言，其负如兰	谓促人友爱团结之语如兰草一般芬芳可亲	系辞上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犹善有善报	坤
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犹恶有恶报	坤

以上仅例举 54 个词、成语或短语，均富含哲理，至今仍经常运用。从这么多的数目不难看出《周易》深入民众的程度。除此之外，《周易》中还蕴有很多含义深远的词语，只要去精心研究它，掌握它，必将对增进个人的思维界域和丰富文学语言带来帮助。

从词源学角度看，现代汉语中的一些词语是源于易理。如我们经常说

“卖东西”，为什么不说“买南北”呢？据有关资料记载，有一天南宋著名的易学家朱熹在路上遇见朋友盛温如提篮子上街，就问：“干什么去？”对方回答：“买东西。”朱熹又问：“难道不能买南北？”盛答：“当然不能，案文王八卦方位，南为离，属火；北为坎，属水。篮子装不得水火，故不能买南北。而东为震，属木；西为兑，属金，而篮可装木金，故可买东西。”从此“东西”一词从方位衍生出代表物品、货物这项意义。又如，我们时常称突然改变主意或做法称为变卦，这又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易学名词。另外，中国人取名的学问中与《周易》亦有很深的渊源，如今人蒋介石先生，字中正，其名字即源于《豫》卦六二爻：“介于石，不终日，贞吉。象曰：不终日贞吉，以中正也。”大家都知道取名是表达了人的愿望，因此从《周易》经传的意思，取这个名字就希望他将来不仅“守志耿介似于石”^①，而且能“见几（犹如轧苗头）之速，不待终竟一日，去恶修善相守正”^②。当然在生活中愿望归愿望，行为往往会偏离，蒋先生的一生自有史家公论。又如清初苏州城里有一位剑侠叫白泰官，武艺高强，民间流传很多关于他的故事。而他为什么取名“泰官”呢？泰，取自泰卦，表示吉利亨通。而苏南一带取名又习惯带个“官”字，因此这个名字亦希冀祝愿他一生吉利发达。再如，民国初上海县杜行镇有一家著名的商店，店主屠秉钧，出身于清末秀才之家，稍通《易》，故其店取名“三泰”。三泰是成语“三阳开泰”的省称，易学中有把卦与季节、月份相联的流派，十月为坤卦（䷁），纯阴之象；十一月为复卦（䷗），一阳在下；十二月为临卦（䷒），二阳在下；正月为泰卦（䷊），三阳在下。所以三阳在下一方面反映了泰卦卦形的特点，另一方面标志着冬尽春来，象征春意盎然，对店家则意味着财运亨通。因此就很自然地取上这一预示吉祥的名称。呜呼！今秉钧公早已作古，“三泰”百年老店亦不复存在，唯余易之韵味回荡在浦江畔。除此之外，在取名上出自《周易》经传，发挥易理奥义之处的确实是不胜枚举。如北京紫禁城中有乾清宫、坤宁宫。乾，就是《周易》中卦名，卦象为君、为男；清，颂扬君王清明，洞察一切，所以乾清宫是皇帝办公、接见大臣的地方。坤，也是《周易》卦名，卦象为女；宁，颂扬皇后德性肃穆宁静，所以坤宁宫是皇后起居的地方。而今天我们把女式表、女式车统称之为坤表、坤车，其根由也出自《周易》。

最后谈谈文字。我们可以从文字结构中了解《周易》男尊女卑观念在古

① 孔颖达：《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中华书局，1979年。

② 同上。

代的影响。汉字中有90%以上属于形声字，即字结构中有一部分为声旁，决定了该字的读音；另一部分为形旁，与该字的字义相关。而古代有很多贬义词都取女旁，反映了当时社会对女性的歧视。如平时常见的字，有奴、奸（姦、姦，奸的异体字）、妄、嫉妒（妬）、妖、妨、婬、嫌，还有一些生僻字，如：姤，争论是非的意思；姤，狂妄的意思；婬，傲慢的意思；姤，淫乱的意思；媚，忌嫉的意思；嫫、嫫，是轻蔑、倨傲的意思；以上这些字的结构，就是受《周易》哲理中乾刚坤柔、男尊女卑意识的影响。

再者就是女书。又称女字，已存在有数百年，从目前收集资料看，主要流传于湖南潇水流域的江永地区，大约有近千个文字符号，其中常用字将近七百多个。字符呈菱形斜体。女书的形成反映了当时妇女群体受到压抑而与社会沟通缺乏平等，所以在该群体内部自然出现一种新的文字交流工具。女书是一种非正常现象，反映了《周易》男尊女卑思想对旧时代妇女的影响。

第二节 《周易》与文学

中华文学之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世界文学殿堂占有极为显著的地位。例如：早在公元前9至8世纪时期，当希腊盲诗人荷马创作著名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时，几乎与此同时，甚至更早，中华民族已经孕育着一部优秀的诗歌总集——《诗》（后尊称《诗经》）。早在公元13世纪，中华辽阔大地上诞生了一位才气超人的戏剧家关汉卿，他一生创作剧本达六十多种，他的优秀作品流传国外，至今仍常演不衰。而直至17世纪，远在英伦三岛的莎士比亚才以戏剧闻名于世。其他如诸子散文、历史传记、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以及明清戏曲、长篇小说等，皆是举世瞩目的成就。那么中华文学源自何处？又怎么会形成这么一个宏伟的气象呢？其实，中国文学之源在于上古时代的卜辞、卦爻辞，以及口耳相传的神话传说，卜卦爻辞既是古代生活的反映，也是作者个人素质与创作的结晶，后世的作品，包括诗歌、散文等，都是在卜卦爻辞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周易》作为一部古老的作品，在漫长的岁月中经无数贤人的锤炼，又进入了儒家经典的范畴，因而它对后世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首先反映在哲学意义上，《周易》对后世作家的影响体现在唯物和辩证两个方面。①从唯物方面看，占筮本身就是生活中由未知而寻找可知的行为，其目的是现实的、唯物的。而《周易》卦爻辞本身大都是一些叙事作品，是上古初民生活真实记录。如：《比》九五爻“显比，王用三驱，失前禽，邑人不诫”。这是叙述诸侯狩猎活动。又如：《屯》六二爻“屯如，遭

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这是描述迎亲活动。又如：《师》卦上六爻“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这是记录了当时的政令。但也有一些议论之辞，如：《泰》卦九三爻“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这是论述事物的发展规律。《周易》以其本身的创作方式与途径，为后人开创了一条从探索生活中去反映重大内容道路，培养了广大作者与读者的文化心理，把反映现实放在创作首位，让现实主义成为中国历代文学的主流和先驱，为先秦文学的繁荣起了一个良好的开端。②从辩证方面看，《周易》六十四卦都体现了辩证法对立统一、量变到质变、否定之否定三大规律，如《序卦》上说：“《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终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终否，故受之以《同人》。”这里泰和否既是一组对立的卦，也是一种对立的现象。同人意味着人际和谐，也是泰的一种表象。以上《序卦》中由《泰》到《否》、再到《同人》的这段话就体现了辩证法的三大规律。这个精神蕴藏在《周易》中就归结出两句话“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里从善到庆，从不善到祸殃，就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反映在文学作品中就是“好有好报，恶有恶报”。即好人虽历经磨难，最终都能申冤报仇，而坏人则逃脱不了历史的惩罚。如《水浒传》中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被陷害发配到沧洲草料场，他的冤家对头高俅特地派人放火烧草料场，欲置林冲于死地。不料一场大雪压塌草房，林冲早已出走。在整部小说中，以这场大雪为转机，首先是为林冲手刃卖友求荣的陆谦提供机会，从此亡命江湖，并作为先遣者走上梁山。其次也为日后晁盖、宋江的占据梁山，开创宏业奠定基础。因此“火烧草料场，大雪压塌茅屋”这个细节的安排是受天理昭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思想支配的，而且这种报应是体现在今生今世兑现，它既不同于佛教的轮回报应，也不同于基督教所宣扬的在世界末日的最后审判中作总的清算。我国历代许多作品都受到这一理念影响，形成了喜庆大团圆的统一格式。《序卦》中还有一段话，“剥者尽也。物不可以终尽，剥穷上反下，故受之以复。”这是说，事物发展到尽头，就会出现转折，呈现新的启点。这个精神体现在我国众多的话本与历史演义小说中，就成为“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小说结构模式，由此产生了许多以历史为题材的章回小说，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三国演义》。

从文学理论角度分析，《易传》中所蕴含的“仁”精神已经成为我国文艺评论的重要标准之一。其中主要的就有文本说，文气说。

(1) 文本说。所谓文之本，指的是文章以及文学创作的根柢，包括目的、主题、内容和社会效果。早在汉末魏初，魏文帝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就指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而这种能承担“经国大业”

的文章就是阐述、发挥“道”的作品。由于儒家学者在《易传》中反复传播了以“仁”为核心的思想，如《乾·文言》提出：“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乾·文言》中的这段话，把“仁、礼、义、贞”四德作为行为准则，因而后世广大作者在《周易》等儒家经典的熏陶下，深明作品应体现“仁”，文学评论中也把关心社会与民众的作品放在上品。如那些入选《诗经》中的《魏风·伐檀》、《魏风·硕鼠》、《豳风·七月》等，到唐代杜甫的《三吏三别》、白居易、元稹反映民众疾苦的新乐府诗等，都是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历代文学评论家对宫体诗、艳诗，不管其作家多么位高、写作技巧多么娴熟、辞藻多么华丽，但对这类作品的评论都是十分有限的。古代评论界非常重视“文以载道”，就是在引导作家作品应从爱的立场出发，去反映生活。

(2) 文气说。所谓文之气，指的是文章以及文学作学作品的格调、神韵。《系辞下》曰：“将叛者其辞慙；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者辞寡；躁人者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这是说，言辞（包括文章）体现了一个人的本质，评论者可以从文辞而观察人的内心。《系辞上》还有一段话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言不尽意”的意思是说透过文辞的表象，能让人感受到另外还有更深刻的内容，那就是“气韵”。这里“气”的概念又源于《系辞上》“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指的是一种生命的原初物质。之后“气”的概念启发了文艺评论家们，认为这种气万物皆具备，它不仅表现在外部形体，更体现在本质精神上，当它进入到后一层次时，让人感受到那种出神入化的微妙的美，就称之为韵，或称之为神。于是由言辞文章评判人与文之高下成为我国特有的文学评论标准。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就指出“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并以此为标准判定建安七子诗作之高低，称“应场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到了南朝梁，刘勰在《文心雕龙·风骨篇》中进一步提出“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初唐陈子昂则高举“汉魏风骨”的大旗，掀起了诗歌革新运动。这里“风骨”则专指神韵中刚直的一类。唐代，大文豪韩愈建立“文气说”，指出“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①。由此后世评论家以气之高下清浊作为评判诗文的标准，追求气韵风骨就成为中华民族文学的最大特征。而对文气的划分又往往吸取《周易》乾刚坤柔意识，这些观念往往被作

^① 韩愈：《答李翊书》，《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者不自觉地引入创作，于是形成了不同的风格。从诗歌来说，在悠长的封建社会中很多士大夫推崇一种温柔敦厚的风格，它怨而不怒，愤而不激，《诗经》中的《小雅》和部分《国风》作品便是此风的先导，到了东汉末年文人创作的《古诗十九首》则是典型。这类作品的内容尽管反映了诗人悲春伤秋，愤世疾俗的心意，然而在感情上却是委婉缠绵，这就是为封建礼教所束缚的所谓阴柔之美。绵延下来的便是南唐二主（李璟、李煜），他们的词多以哀怨缠绵为美，清黄景仁的诗则有一种凄凉清苦的韵度。后世还常常把描写妇女心理、生活情境的秦观、李清照等作家归为婉约派。当然，与此同时，我国士大夫也还是崇尚充满阳刚之气的作品，把气势昂扬的称作豪放派，如苏轼、文天祥、辛弃疾、陆游等人的诗词作品。在漫长的文学史卷中，浩气冲天，掷地有声的作品从未断绝。可以这么说，名家诗词，各具神韵。

《周易》不仅对主流文化的发展产生深刻影响，在某些独特的文化范畴，更是有其不一般的影响。如巫文化、青词文化等。

巫文化是中华文化中一个组成部分。所谓巫，在远古初民心目中就是传达神旨意，沟通和促进人神之间交往的使者。由于人类自我意识的束缚，巫成为古代社会中不可缺少的人物，因此文学艺术作品不反映他们，简直是不可想象的，没有他们就无法构筑中华民族的文学殿堂。而占筮问卜又为巫生涯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估量到《周易》在巫文化中的地位。

从内容来看，战国晚期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便是在楚地巫文化的熏陶和启示下创作出不朽的诗作，日本学者藤田岩友先生就把屈原的作品归于“巫系文学”^①，白川静先生也说：“屈原是王族之一，应该也就是率领巫祝的人，其作品即产生于这些巫祝之间。”^② 不仅《九歌》是一组颂神的诗作，《离骚》中也真实地反映了巫在生活中的重大作用。诗中写道：“索薜茅以茝簪兮，命灵氛为余占之。曰‘两美其必合兮，孰信脩而慕之？思九州之博大兮，岂唯是其有女？’曰：‘勉远逝而无狐疑兮，孰求美而释女？’……欲从灵氛之吉占兮，心犹豫而狐疑；巫咸将夕降兮，怀椒糈而要之。……灵氛即告余以吉占兮，历吉日乎吾将行。”以上这些诗句，就是《周易》占筮术具体运用的生动记载。由此可以看出，《离骚》这首我国古代第一次由文人创作、在文学史上占显著地位的长篇抒情诗，也是一首充满政治性和巫文化色

① [日] 藤田岩友：《增补巫系文学论》，大学书房，1968年。

② [日] 白川静：《中国的神话》，中央公论社，1980年。

彩的诗作。

秦朝是短暂的，它对文化，尤其是政治性、哲理性文化是极不重视，并予以扫荡，唯独对巫文化却网开一面。

到了两汉，在文化学术领域内占主导地位的是谶纬文化，朝廷大臣如经学大师董仲舒等都是这种文化的带领人。所谓谶纬文化，就是借易理，演阴阳，以预言吉凶灾祸的一种迷信文化。顾晓鸣先生说，“谶纬固然不完全等同于《易》和‘象’，但其思想方法是一致的，也可以说，谶纬是《易》和‘象’消极方面的继续和扩大。”^①《史记·儒林传》说，董仲舒“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谶纬文化当然不能真实地反映自然和社会生活，却客观地体现了当代人的精神面貌，反映了他们的心理和愿望，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人类进程中的一个纪录。历代关于谶纬文化的著作本来是不少的，称之为纬书，和儒家经书对称，现在纬书已大都失传，尚存的有名著《春秋繁露》和《白虎通义》。纬书常附会古代河图洛书等神话传说，把自然界的某些偶然现象神秘化，内容荒唐离奇，然而从文学艺术发展角度认识，则是古代浪漫主义文艺的滥觞。

谶纬文化的热潮绵延了上千年，直到今天仍有着很大的市场，倘若漫步书肆，就会看到那些印刷精美的宏论巨著和文学作品，其销路常不敌地摊上的印制粗劣，价格不菲的占卦算命、风水之类的小册子。究其原因，还是民众心理所向的问题。

再说青词文化，这是一种道教文化，为道教斋醮仪式上写给天神的奏章表文，一般用骈体文写成，用硃笔写在青藤纸上，故称青词，又称“绿章”。青词文化与太极八卦有很深的渊源，它始于唐宋，热于明代，多有文人为了邀宠而竞写这类词章，如明代臭名昭著的严嵩就是因为青词写得好而被皇上提擢，任武英殿大学士，入阁，专国政二十年，这也可以看出青词文化在当时的影响是多么大。当然，今天尚未有人去编撰一部谶纬文学史或青词文学史，因为它属于巫文化的范畴，从今天的目光看来是很不科学的。但是无法讳避的是，他们确实有过兴盛的时代，是古代文化的一个部分。文学史就有这样的现象，有的品类经历了初生、全盛，逐渐衰微；而有的品类却能永葆青春。但即使是衰亡的，也不能忘却它曾有过辉煌的岁月，就如谶纬文化和青词文化。

《周易》对文学的影响还表现在创作素材方面，这点我们以大众喜爱的

^① 顾晓鸣：《“象”，中国文化的一种基因》，载《复旦学报》，1986年第3期。

武侠文化与易文化紧密结合为例，几乎每位杰出的武侠作家的灵感中都有《周易》的因子在激荡，甚至达到无“易”难以下笔的程度。在此我们举“金大侠”为例。

“金大侠”（即查良镛先生）是年过“而立”后（1955年）在香港开始以“金庸”为笔名，在报刊上连载发表他的武侠小说，前后写了十七年，一共是十五篇作品。早期的代表作是《书剑恩仇录》；中期的代表作是《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晚期的代表作是《天龙八部》。

金庸小说深受欢迎，以至于就有人说过：“凡是有中国人的地方，都有人知道他的名字。”^① 金庸是一位认真对待武功描写的作家。他成功地驰骋想象，调动自己的生活经验和文化素养，使武功打斗学养化、艺术化，具有浓厚的文化色彩和学理气息。正如法国现代文学批评家蒂波岱所说：“真正的小说家用他自己生活可能性中无尽的方面去创造他的人物，冒牌的小说家只按他现实生活中唯一的途径去创造人物。小说家的天才不在使现实复活，而在于赋予可能性以生命。”^② 而金庸先生之所以能充分发挥个人想象力，能够在浪漫的空间自由驰骋，使其笔下这些不现实的武功的情景与作者所编撰出来感人的情节、动感的故事人物能如此深深地攥紧读者的心，固然有多方面原因，但不可忽视的是他充分运用了中国文化内蕴的一些深层精神与素材，其中就有来自《周易》。下面我们举几个例子。

第一，降龙十八掌。这是金庸《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天龙八部》中故事主角——丐帮首领的两大看家本领（另一为打狗棒法）之一。被描写得威力无比、神乎其神的降龙十八掌，是作者在熟读《周易》后虚构的产物，是一套子虚乌有的虚拟拳法。他以“十八”为数，只是对中国文化中“九”倍数运用的一种惯用手法。其实小说中真正提到与介绍的只有十六掌，其中有十二个取自《周易》。如：“亢龙有悔”（出自《乾》卦上九爻）、或跃在渊（出自《乾》卦九四爻）、利涉大川（出自《需》卦）、飞龙在天（出自《乾》卦九五爻）、潜龙勿用（出自《乾》卦初九爻）、见龙在田（出自《乾》卦九二爻）等。

作者在描述降龙十八掌招式的动作形态时，有时结合了对《周易》的理解，如“亢龙有悔”，作者根据《乾》卦象传“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句，指出“掌法的精要不在‘亢’字而在‘悔’字，因此有发必须有收，打出去的力道有十分，留在自身的力道却还有二十分”。在此，作者发

① 陈墨：《金庸小说赏析·引言》，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

② 严家炎：《金庸小说论稿》，第4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挥了对易理的体悟与丰富的想象力。

第二，凌波微步。这是《天龙八部》主人公段誉的主打武功——北冥神功的第二项内容，习北冥神功者首先要掌握凌波微步。金庸先生吸取了曹植《洛神赋》的精华，同时又依据《周易》要义及民间流传的八卦、太极诸拳种套路，构思了这么一个舞蹈性极强姿态优美的步伐。他构思的凌波微步从六十四卦方位中化将出来，自“明夷”起始，经“贲”、“既济”、“家人”，一共踏遍六十四卦，恰好走了一个大圈而至“无妄”。他在书中写道：在逍遥子留下的卷轴上，“帛卷尽处题着‘凌波微步’四字，其后绘的是无数足印，注明‘归妹’、‘无妄’等等字样，尽是易经中的方位”。

第三，八卦阵。在《射雕英雄传》与《神雕侠侣》中分别写到归云庄陆家、桃花岛主黄药师、神姑刘瑛都曾摆下八卦阵阻敌进入其屋，其中《神雕侠侣》第十四回还写到黄蓉在危急中运用易理，摆石头阵，有很长一段时间成功地阻隔金轮法王，挡住了他的进攻。八卦阵情节取材于《三国演义》诸葛亮巧设石头阵，智退东吴陆逊追兵的故事。这说明以八卦阵退敌的故事已经有悠久的历史，它体现了民间对抗击顽敌的良好愿望，也反映了民众对《周易》的神秘感。金庸先生这样处理情节，正反映其作品是扎根于民族文化与传统。

第四，武当剑法。《书剑恩仇录》中多处把六十四卦与武术中步法、手法结合在一起。如：清军将领张昭重为武当弟子，书中多处描写他运用武当剑法与反清侠士拼斗，书中第五回写道：“文泰来道：‘你瞧他脚下是不是在走八卦方位？’骆冰道：‘他从离宫踏进乾位，啊，现在是走坎宫，踏震位，不错，大哥，你怎么知道？’文泰来道：‘这人武功精强，我猜他不会真的连连倒退。听说武当派柔云剑术中，有一路剑法专讲守势，先消敌人凌厉攻势，才行反击，这路剑法脚下就要踏准八卦。’”第九回又写道：“张召重见他脚下踏着九宫八卦，知他是走坎宫奔离位，双掌挥动，抢进乾位。两人这般转了七八圈，点到即收，手掌不交。”这些精彩片段反映了易文化与侠文化纠结在一起所折射的奇异光华。这些别开生面的武技真是让读者耳目一新，也许你以为那是让你眼花缭乱的武功，或许那正是作者易学研究的心得。

另外，金庸先生在武侠小说中时时引用《周易》插科打诨。如《天龙八部》第二回中无量剑派东宗干光豪和西宗葛光珮师妹两人生恋情而背离宗门。第三回中写段誉见他俩已结成夫妻，自己却遭人追杀，于是自然就联想到《周易》，书中写道：“我这一卦是‘无妄卦’，‘六三，无妄之灾；或系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灾。’这位干老兄得了老婆，我段公子却又遇上了

灾难。”书中写段誉以《周易·无妄》自我解嘲，这种充满学术风味的写法是罕见的，不仅表现了《周易》卦爻辞贴近生活，也表现了作者的幽默。

金庸小说中运用《周易》辞句发挥易理之处还有很多。其实，只要细心地研究古代著名的长篇小说，就会发现没有一部能离开占筮的情节。以明代四大小说《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中的主要人物来说吧，离开了神机妙算的军师诸葛亮和吴用，又如何能组织材料、构架小说呢？《西游记》更不必说，美籍华裔刘达教授在《道与中国文化》一书，以八卦意识研究唐僧师徒四人性格以及在全书结构中所处的位置，把猴王孙悟空视为《离》卦的象征。离为阳卦，其象为火、为中女，这与孙悟空红脸（火）的形象和好动调皮（阳），不近女色（本为中女）的性格是一致的。不仅如此，连猴王的取名也大有意思，因为猴性调皮，是感情奔放的表现，所以只有向往虚空、宁静，方能成仙，于是为其取名悟空。

猪八戒是《坎》卦的象征。坎为阴卦，其象为黑、为水、为中男，这与猪八戒临敌时常作孱夫（阴），见女色则贪恋不舍（中男）的性格又完全一致。水，在人体指肾脏，在华人观念中肾决定人的性能力。因此猪八戒成功的关键在于控制个人性欲能力，所以取名为悟能。

沙和尚代表《坤》卦。坤，其象为黄、为土、为中，故其个性如大地之宽厚，处两位个性相反的师兄之间，常常起到居中调停的作用。

白马是天龙的化身，代表《乾》卦。乾，为阳卦，为西北之卦，其象为金、表示坚。所以白马驮唐僧向西，就象征取经的愿望和意志。

而唐僧作为领袖，他率领和依靠着这个彼此个性不同却又能相互制约的取经团体终于获得了成功。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当人们把佛教史上这一著名事件演绎成神话故事时，自然而然地按照易理进行构思和统筹。

最后想谈谈《周易》对后世写作体裁与技巧的影响。主要有两方面：一个是文学体裁之源的问题。《周易》中的卦爻辞从口头流传到定型一定是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它的历史比《诗经》更悠久，而今日《周易》的经文基本是散文，夹杂韵文和诗歌，它无异是多种文体的萌芽。如《明夷》初九爻“明夷（鸣雉）于飞，垂其翼。居子于行，三日不食”。及《中孚》九二爻“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这与《诗经·国风》中的作品十分类似。而《否》九五爻“其亡其亡，系于苞桑”二句，显然是韵文。至于《既济》九五爻“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二句，则是典型的散文长短句。值得注意的是，在散文的写作上运用了多种手法。如对偶句式：“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归妹》上六爻）。“无平不陂，无往不复。”（《泰》九三爻）叙述句式：“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既

济》九三爻)描写句式:“见舆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睽》六三爻),“得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中孚》六三爻)。议论句式:“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归妹》六五爻)。后世的散文句型大体上是上述句式的继承和衍生。由此看,《周易》在散文发展史上还是很有价值的。

另一方面是比兴。《周易》作为一本筮书,常用譬喻手法指示人事的吉凶。所以《系辞下》说,“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指出了卦爻辞以小喻大的特色,对此前人早已注意到,并有很明确的论述,清章学诚就说过“易象通于诗之比兴”^①。这样的例子在卦爻辞中是屡见不鲜。如:

起兴:“鸿渐于陆,夫征不复,妇孕不育。”(《渐》九三爻)以水鸟飞上陆地起兴,继叙述“夫征不复,妇孕不育”两种象征凶象的情形。

兴中有譬:“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大过》九二爻)以枯杨重生叶起兴,又譬喻老头娶少女,仿佛重返青春。

譬喻:“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湫,凶。”(《鼎》九四爻)以鼎足折断,鼎中食物翻泼,其状沾污,譬喻力不胜任,必致事败的道理。

以上例句和《诗经》中比兴同出一辙,而且对后世《离骚》的风格也有很大影响,以至于司马迁说,屈原的作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迥而见义远”^②。这一段评论完全模仿《易传》对经文的评述,从而更清楚地说明了《周易》在两方面(《易传》对《史记》,经文对《离骚》)对后世文学名著的深刻影响。

一部深奥的《周易》对我国文学的影响当然是远不止上文所述,而本节也只能如《易传》所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而矣。

第三节 《周易》与艺术

《易传》中浓郁的儒家精神很自然地渗透到艺术领域,由此形成的美学观念对我国的艺术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下面就以建筑、雕塑、书法、绘画、音乐、戏曲为例,从美学的角度,谈谈《周易》对中国艺术的境界、基本类型的影响。

从美学的角度看,一切艺术作品之美在于“和谐”,而“和”却正是《周易》的核心理念。《乾·彖传》提出“保合太和”,并把“和”的外延扩

^① 章学诚:《文史通义》,中华书局,1985年。

^② 司马迁:《屈原贾生列传》,见《史记》,中华书局,1972年。

大到天地自然，以及现实的人际与幻化的鬼神之际。而这个“和”的特色在于突出中心，这才是中国艺术的最高境界。我国的艺术往往是现实社会及其精神的再现，因而艺术上的和谐首先体现在作品的形式上。如建筑上的宫殿、陵墓、寺庙、园林，都先确定一个主建筑（或主景观），之后，再围绕该中心，依循地形，营造其余建筑物；在雕塑上，无论是霍去病墓前的马踏匈奴石像，还是唐太宗墓前的八骏石像，都是围绕英雄，在陪衬角度表现了主题的和谐；而云冈等石窟，以及各地的寺院雕塑，都是群体雕塑，但每一个石窟或寺庙，必有一个中心，这个中心之塑像，不仅是观赏者视点的中心，也是群体雕塑中体型最大、形象最庄严一尊，形成了整体格局上的和谐。其他如绘画中必须突出主要人物或山峰，从而决定次要人物或其余山峰的拱向，再选择用墨的浓淡；音乐中必须确定主音，最好是宫调，然后考虑八音克谐；戏曲乐器中则以鼓板为中心，由鼓板引导其余器乐的演奏。其次，也体现在作品的内在精神上。我们不仅用“气韵”这个标准评价文学，也同样用以评价艺术作品，把气韵生动作为中国艺术的最高标准。谢赫在绘画六法中把气韵生动列为第一。拿由我国艺术家设计的2008年奥运会标志和火炬为例，由传统篆刻印章艺术演绎的标志性图案与祥云火炬，不仅构图简洁，富于民族艺术特色，而且主题鲜明、形象活泼，完美地表现了气韵生动的艺术特征，它们获得了广大民众的喜爱。

纵观中国艺术，它可分为阳刚与阴柔两大基本类型。青铜器、京剧、秦腔、豫剧、锣鼓、军乐、门神画像、魏碑字体、宫廷建筑等都属于阳刚，宫廷艳舞、园林、行书、昆曲、宫廷画院与文人的山水花鸟画等都属于阴柔。阳刚阴柔观念的源头即来自《周易》，《乾·文言》说：“大哉乾乎，刚健中正”，《坤·文言》又说：“坤至柔而动也刚。”尽管艺术也受到《周易》影响，但在阳刚阴柔方面，彼此之间所表现的内容也存在差别，以人物画为例，儒家的信条是“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因而画达时之人物，往往表情显现刚毅之气，而穷时则表现蓑衣野钓的阴柔趣味。至于道家信奉的是旷世偷生，其作品自然是阴柔为主，拿道观音乐为例，大都是低沉缠绵，瞎子阿炳所拉的《二泉映月》即是此类。

我们对艺术的美的评判是从艺术形式和思想内容两方面着手。在艺术形式上《周易》提出了模仿的美学理论，即“观物取象”和“立象画意”两个命题。而《周易》中所提出的“象”具有现实和超现实两种特性。

（1）观物取象。《系辞下》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一段话旨在说明八卦是通过模仿

而产生的，但是它具有另一层意义，那就是我国艺术的现实主义萌芽。我国古代的艺术创作就非常重视对客观外物形、景、情的描拟，《乐府古题要解》有这样一则故事：

“伯牙学琴于成连，三年而成。至于精神寂寞、情之专一，未能得也。成连曰：‘吾之学不能移人之情，吾之师有方子春在东海中。’乃赍粮从之。至蓬莱山，留伯牙曰：‘吾将迎吾师。’划船而去，旬日不返。伯牙心悲，延颈四望。但闻海水汨没，山林杳冥，群鸟悲号。仰天叹曰：‘先生将移我情。’”

这个故事说明音乐的美源于对自然美的感受、融化。而清代著名画家原济（石涛）在绘书艺术上也有这样的体会，提出画山水应脱胎于山川。而我们的艺术院校开设写生课、到课外采风，要求从事艺术的人员深入生活等，都是观物取象理念的具体体现。

（2）立象画意。《系辞上》提出“圣人立象以尽意”。从文字角度看，这个“象”已超越了对大自然和社会生活的摹拟，它是一种灵感，一种丰富的联想，开拓了美感的时间和空间的领域，这是与“观物取象”截然不同的另一种创作精神和表现方法，也就是浪漫主义的表现形式。如《乾》卦诸爻分别以潜龙、见龙、飞龙、亢龙、群龙喻之，以虚拟的概念表现了事物发展过程中由隐至显而后盛极必衰的规律。这一种表现方式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后世《离骚》“酌奇而不失其贞（正）”的艺术风格。柏拉图就曾经说过：“凡是高明的诗人，无论在史诗或抒情方面，都不是凭技艺来做成他们优美的诗歌，而是因为他们得到灵感，有神力凭附着。”^① 这里所指的神力就是艺术作品中所体现的艺术家的想象力。而我们不论在《周易》的卦爻辞中，还是后世艺术家的作品中，都很容易看到这一类充满着丰富想象的罗曼蒂克情趣。如绘画，中国画注重空白的处理，要让观赏者在虚空中悟出一种新的境界。笪重光先生说：“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蒋和在《学画杂记》中说：“大抵实处之妙，皆因虚处而生。”又如京剧，剧中所表现的武打、行军骑马、进出门口等，都通过舞蹈做虚化的处理，正是这些完全艺术化的优美的表演，使艺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京剧表演艺术和中国绘画在突出气韵风骨方面，重神式而轻形似的程度乃为世界一绝。

在内容上，黑格尔曾有一句名言：“人的东西构成真正美和艺术的中心和内容。”^② 事实上，《周易》所反映的也正是与人相关的东西，它的美就在

① 柏拉图：《文艺对话集·伊安篇》，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

② 黑格尔：《美学》第二卷，第163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

于表现了人性和伦理。首先它表现了重教精神。如《坤·文言》中提出“阴虽有美，含之以从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这显然是在宣传等级制。要求地从天，臣从君，妻从夫，其宗旨则在维护阶级社会的和谐。这种把经传文辞与政治联系的倾向无异是开创了后世“诗言志”的先风，并延续到更后，便有借绘画志，借戏曲言志。然而更重要的一点是，很多艺术品就是在作者需要言志又敢于言志的创作冲动中酝酿出来的。如抗日战争期间，郭沫若的现代话剧《屈原》、聂耳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等。

其次，它提出了人格美。《乾·文言》提出“修辞立其诚”，这就要求艺术家的人格与作品美紧密结合。因此我国的文艺史上，凡是被敬崇的作品，无不扎根文艺家人品的土壤上，譬如梅兰芳，抗日战争时期拒绝为日酋登场效力，蓄须明志，日后就被尊为京剧艺术大师，其表演艺术也大为光扬。反之，如南宋秦桧，本也是颇有才的文士，只因为人卑鄙，残害忠良，卖国求荣，为人所不齿，故后世绝对没有人去吹捧他的文墨。从上面两人的一涨一落中，充分反映中华民族的审美观并不是纯艺术的，而是有着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

第九章

易学的前景

易学无疑是人类学术史上跨时最漫长、著述最宏富、研究队伍最庞大，而且是研究前途最光明的一门学问。我们这样说并不是故作大言耸听，而完全是客观的叙述。因为这部在世纪前就为人研究的著作迄今仍被人们视为博大深奥，神秘莫测，并引起了世界范围的注视，研究队伍日益壮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民间依然有数不清的爱好者在业余苦心钻研。二千多年来易学的著述超过了任何一门学问的研究成果，它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因此引导人们正确地认识易学，是我们撰写本书的最终目的，也是义不容辞的职责。

我想，谈易学的前景就是探讨《周易》在今后能发挥什么作用和怎么学两个问题。而对易学的研究应分为两条途径，以分别达到不同的目的。一种称之为学术的研究，包括易学史研究，易与哲学、历史学、宗教学、民族学、文学的交叉研究等。以往的学者在这些方面都曾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他们或用历史的眼光，或用分析文字结构及通假的手段去理解卦爻辞本意，或结合考古学的成果，把易的学术研究做得日趋深入。在纯学术研究上，尤其是对经传文辞的研究，我们既欢迎对旧观念学说的继承和弘扬，也欢迎新注释的不断崛起。

另一种是将易学如何致用的研究。这是众所关心的焦点。台湾“孔孟学会”理事长，已故陈立夫先生便有这样的高见，他曾以“易学应用之研究”为题，邀约海内外精擅易学者撰写文稿，致力于易学应用研究的深入。另外还有不少学者提出了“让周易步入民间”的口号，其中刘锡哲先生指出：“易的外貌艰深到无以复加，而其实质却是中学生都能了解的通俗读物。对

易中各项原则的运用，任何人都不会发生困难，易不应该永远放在象牙塔里，更不应仅用为修博士的工具。把易送到每一阶层，是现代研究易学者的责任。使店员、职员、教授和元首都能读易和用易，易才算发出真正的光辉。”^①

然而，当我们综观今日易学之致用，发现有两种潮流。第一是继承并扩大它的占筮功用。目前有一部分人仍然在利用《周易》以占筮，有些地方风水师还很吃香。其实，这并不奇怪，因为《周易》是旧文化，它的影响根深蒂固，所以当代有部分民众或知识水准低下，或心志迷茫自失，他们乞求神灵幽助乃属于个人自由行为，是可以理解而毋庸干涉的。

第二是把《周易》与现代社会的各个领域联系起来，从《周易》中寻找出解决现实问题方法。这当然是易学运用中的正确道路，《系辞上》说“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但是易理究竟怎么与天地之道挂钩而解决现实问题呢？目前社会上有两类人，一类把《周易》看得很神秘，如台湾著名学者南怀瑾先生说：“不要看了《周易》的各种解释，就只在《周易》上转圈子，我个人认为这样毫无用处。要真正有用，要有科学精神，而不是以现代的自然科学硬套上去，这是我个人到今天为止，很深切的体会的。易学是高深的，欲真的把它变成为有用的，必须如此。”^② 我们认为：认为《周易》超越了现代自然科学，而现代科学技术无法解释《周易》，这不是科学的认识，是一种伪唯物主义真唯心主义的表现形式。其实，如何看《周易》的关键在于破除对《周易》的神秘感。《周易》中的卦爻辞虽然反映了古代有关婚姻、家庭、战争、生产、祭祀等丰富的生活内容，而我们应把它们看作是一种比喻，这些例子的深层意义在于介绍了一种认识方法，揭示了一个哲学原则。它就这样以简明朴素然而又形象的语言叙述了一些基本的道理。今天无论是自然界还是社会，虽然在资源的稀缺与开发上、在科学技术上，与古代有了很大的差别，而基本矛盾仍没有变，所以《周易》中所揭示的认知的的方法依然有效，这些哲理性言辞不是对某一件事具体方法上的指导，而是对所有同类型的事都有启示作用，这就是一部《周易》能概括天下之道而无遗漏的根本，也是易学的致用价值。所以另一类人就懂得《周易》的本质，懂得运用易理这个认识工具，树立辩证意识，应用于现实生活。在这个意义上冯友兰先生把易学譬作“宇宙代数学”是完全正确的，这也就是我们颂扬《周易》，努力宣扬易理知识的原因。

① 刘锡哲：《大众实用周易》，中国卓越出版公司，1989年。

② 南怀瑾：《易经学说》，第297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

下面我们举两个热点问题，从易学角度给予分析讨论：

当代社会最关心的人类自身的生存问题。这个问题反映在物质与精神两方面。而这些问题我们都可以用易理作妥善处理。下面我们先谈谈如何用易理解决物质方面存在的困惑。

当今人类生存面临资源匮乏、环境污染与人口膨胀三大问题。而有人又说，资源匮乏、环境污染是由人口膨胀和科技进步造成的。这些问题的焦点还在于我们生存的这个星球。美国华裔科学家、美国工程院院士李耀滋先生说：“人类的前途不堪设想，地球是资源有限，人口在增长，人总归要受约束，过去对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看法，现在的看法是取之有尽，用之有竭。物资将尽，资源将竭的时候还没有到。”^① 20 世纪末，全球有 1575 名科学家（包括 99 名诺贝尔奖获得者）联合签署《世界科学家向人类的警告》，指出：在我们能够避开现在所面对的威胁及人类前景不可估量地消失的机会失去之前，我们剩下时间不会超过十年或几十年。^② 2008 年 7 月全球 8 个主要工业国和 5 大发展中国家首脑在日本北海道聚会，他们要探讨与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紧要问题，而这次峰会的主要议题就是环境与资源。我们不是悲观主义者，也不是反对人口衍殖和科技进步的复古主义者。但我们应该了解，人类为何走到这种举步维艰的境地。我们认为这个结果的出现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它有以下几个原因。①对资源的无厌掠夺。纵观历史，近代数百年来这个世界是沿着欧美列强推动的轨道前进。而率先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工业强国一是文化底蕴差，二是资源薄弱，它们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侵略性和掠夺性，以牺牲弱小民族资源来获取本国繁荣。当进入 20 世纪后期，这种侵略形式出现某些改变，转型为武装干涉加经济侵略，再次形成了富国对穷国的掠夺。②对资源进行无厌的消费。近 80 年来，世界经济主流是依照凯恩斯经济理论运作的。凯恩斯主义是一个对人类不负责任的短期行为理论，在消费引导生产的凯恩斯主义指导下，生产力迅速扩大，人类在不足一个世纪内，就把地球资源，特别是某些不可再生资源，消耗掉三分之二。③对科技力的无厌追逐。而且还误以为科技力无所不能而超越一切，包括解决新资源，营造新环境以拯救人类。其实，科技力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说明人类的无穷智慧而招引人类不断前进，它造福于人类，同时也破坏了大自然千百万年来所形成的生态平衡。

① 《李耀滋：邓小平让我传口信给蒋经国》，载《南方都市报·大家访谈》，2008 年 7 月 3 日。

② 《文摘周报》，1993 年 2 月 10 日第 4 版。

以上三个原因归结为一个根源，就是人类没有摆正自己在大自然中的位置，这固然有人类自身发展需要这个必需解决的深层次矛盾，但人类过高估计自己的能力，错误地认为人类是这个星球，乃至宇宙的主宰。由于缺乏科学思想指导，因而对自己的贪欲没有给予必要的制约，反而对地球资源采取暴取豪夺。正如海德格尔所说：“欧洲许多世纪以来，一直以人为中心，以人为主宰，把大自然看成征服和进攻的对象，无限制地通过近现代技术去对大自然进行掠夺和剥削，势必造成破坏人类的基本生存条件，危及人类生存。”^①虽然西方社会也存在旨在环保的绿色和平组织人士和行动，出现一些节约资源的产品和举措，但社会整体是能源高耗型的，西方经济学家只看到资源的稀缺性，却不谈资源的有限性。他们的思想境界中只有本国至上、及时行乐，并以邻为壑地嫁祸于人，至今仍没有面临深渊的危机感，这不能不说是西方哲学的一种缺陷。从这个意义上说，凯恩斯主义非圣贤之学，乃是唆使人类丧失理智，造成外强中干虚象的谬误理论。凯恩斯作为一名西方学者，竟然看不到个人学说的长期后果，这完全是资本主义唯利是图原则下急功好利的结果。相比之下，中华民族在久远的岁月中，就明白“天人合一”的道理，即重视人与自然和谐统一。这在《周易》中叙述得非常清楚。《系辞上》上说：《易》“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那么，怎样实行“天人合一”理念呢？《乾·文言》又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大人”，就是道德完备的圣贤。所谓与天地合其德，是说人应该与自然界要相互适应，相互协调。所谓“先天”，是指为天之前导，即在自然变化未发生前加以引导；所谓“后天，即指遵循自然规律”。这个“先天”、“后天”意识，就反映了中华民族圣贤明白，既要尊重客观规律，也注意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这是人类最早的理性思维。这个合理思维符合马克思主义精神。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一天天地学会更加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于自然界的惯常行程的干涉所引起的比较近或比较远的影响。……人们愈会重新地不仅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而那种把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

^① 宋祖良：《拯救地球与人类未来——海德格尔的后期思想》，第1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就愈不可能存在了。”^①今天中国共产党不仅坚持马克思主义，而且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提出“可持续发展论”，然后进一步明确提出“科学发展观”，同时不断在国际场合，表明为改善人类生存环境而希望与他国积极合作的态度，这都是审时度势后提出的正确的国策。

其次，谈谈人口与就业问题。人口跟就业、资源消耗相关。1900年世界人口将近16亿，到世纪末，人口超过60亿，人口急剧增长而粮食生产不能相应增加，某些地区与国家的社会形势像绷紧的弦。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保罗·肯尼迪在《为21世纪做好准备》一书中提出：人口爆炸将引发严重的社会冲突和种族对立。人口问题在发展中国家更显突出。就我国来说，尽管我国长期执行严格的节制生育政策，对控制人口盲目增长起到很大效果，但人口超过13.2亿，这么大的人口基数依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从世界范围来讲，仅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三国人口就超过26亿。而要提高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就要消耗大量资源，这对已经紧缺的资源问题更如雪上加霜。人口增长还带来一系列问题，如社会老龄化、住房、交通、卫生、教育等问题，其中最令人关心的是就业问题，更是困扰着各国领导人。要解决好这些问题，就应该从传统文化中，特别是《周易》中，汲取智慧。首先要掌握《乾·彖传》提出的“保合太和”精神，树立和谐意识，有社会稳定才有解决问题的环境和条件。其次，必须领悟《系辞上》提出的“安土敦乎仁，故能爱”理念，“安土”今天可以理解为安居，百姓有立身之处，安居乐业，就有解决问题的基础。然后还需理解易理所提出的变易与阴阳两个最重要的理念。《系辞下》说：“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维变所适。”这是说，理论也需要不断修正，不能在某一点上停滞不前，而变革的标准是与实际契合。《系辞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知。”这是说，阴阳转化是一种自然规律，能继承它就是好，能促成阴阳转化就是掌握了自然规律。仁者见到就会说此规律蕴涵仁慈，智者见了就说它充满了智慧。《周易》的阴阳概念包容了事物之间的三种关系，即互补关系、差异关系和对立关系。社会上最常见的是互补和差异关系，而非对立。掌握阴阳对转的关键就在于不要把互补、差异关系当作对立关系，在协调时注意分寸。因此，当我们具有变易与阴阳意识，那么处理社会问题，如计划生育、安置就业等，就会灵活而不会僵硬，就会富含人性而不会充满暴虐。从上述可以看出，《周易》只是在宏观上教给我们一种认识方法，之于工作中具体的做法还是要自己拿主意。在

^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第159页，人民出版社，1971年。

这个意义上，正如《系辞上》说：“夫《易》广矣大矣，以言乎远则不御，以言乎迩则静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周易》就是这样对所有工作都具有指导价值。

第三种潮流是借《周易》改善社会文明。今天人类所面对的不仅是资源将竭、环境严重污染等现实，还陷于物质第一、享乐至上的泥潭。我们平时所看到的保护野生动物、动植物保护区、保护江河湖泊、保护耕地草原等就是例证，还有如池田大作先生所说的：“今天的各种重要问题，仍然是精神的、伦理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是付出多大科学技术力量或采取何种经济手段都不可能解决的。”^①所以说，在解决人类困境时，精神文明整治比治污和节约资源更重要。在这点上，弘扬传统文化，其中包括《周易》，就显得更为迫切和重要。而《周易》在促进社会文明进步方面，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进行。

从宏观方面考虑，应该不遗余力地学习、宣传、掌握《周易》精义。它主要有四点：

(1) 天人合一。学会尊重自然，保护环境，树立众生平等意识，节约资源，以保障人类的永久生存。

(2) 以人为本。《序卦》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而在《说卦》中又说：“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在《系辞下》继续说：“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这表明《周易》很清楚，男女、夫妇、父子是社会结构的底层，君臣则是社会结构中的上层建筑。管理百姓需要仁爱 and 道义，需要增加百姓的财富。

(3) 贵和尚中。贵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西方文化强调分别和对抗。世界上小到个体间性格、脾气、爱好、口味的差异，大到各国、地区、民族文化以及政治体制、经济模式的多样性，彼此如何相处呢？《系辞下》提出“天下同归而殊途，百虑而一致”的思想，就是说应采取重和求同原则，这一点在当今政治格局中依然有深刻意义。尚中是中国传统文化另一大特色，它要求对待事物应该采取无过无不及态度，这对我们在国内保持和谐稳定，在国际关系中维护国家尊严和睦邻相交起到积极指导作用。

(4) 刚健有为。《乾·象》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乾·文言》又说：“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此外，《需·彖》、《大有·

^① 池田大作、奥锐里欧·贝恰：《21世纪的警钟》，第2页，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年。

彖》提到“刚健”，《履·彖》、《临·彖》提到“刚中”，说明《周易》强调刚健在人行行为中的重大意义。刚健有为精神对中华民族崛起，走上强国道路；对每一个人的成就事业都起到巨大的鼓舞作用，这是中华文化之精髓。

从微观上说，千百年来人们对《周易》研究的成果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在于阐明了伦理道德的大义，它包括了许多微细方面的指导，值得深入研习，会对个人修身、维护正常人际关系起到很大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周易》历代被推崇为诸经之首的原因。尽管历代易学大师在释义上会出现一些不同的认识，但是在把释义与社会现象，与教化相联系上都是不约而同的。今天我们学习《周易》，宣扬《周易》，就应该发扬其精华，放弃其糟粕，与时俱进，光大中华民族进步的道德观、伦理观，让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成为 21 世纪人类中最灿烂的精神之一，这才是《周易》所具有的，也是值得我们挖掘的价值。

后记

C o n t e n t s

在21世纪新旧交替之际，正值中华高等教育迈向大众化，于是始有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的诞生。而为了培养当今社会的人才，珠江学院始终把素质教育放在一个适当的位置上，这个素质教育就包括有国学，这就为本书的两校作者之间的合作提供了一个机遇。本人对《周易》素有兴趣，而唐韧学长亦有意加强两校合作，于是彼此就书稿定纲目，协商分工，第一至第四章由唐韧先生执笔，第五至末章由本人执笔，并邀仇仲谦先生审稿并作序。前后历经年余，现终于杀青。

本书是珠江学院与华农大在学术研究方面的首次合作，藉此谨向珠江学院董事会、梁深洪院长、华农大外国语学院以及广东教育出版社周伟励、吴曼华两位编审致以感谢。